炎黄春秋

99/3
总第84期

■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二十年前『政治生活准则』出台记

■『皇甫平』文章的背景与论争

■叶笃义：我亲历的一段国共和谈

■绥远起义中的董其武与傅作义

■吴有训博士为国『打工』

■我妈妈上官云珠最后的日子

1947年11月，叶笃义（右六）与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张澜等在一起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新春联谊会举行

2月6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新春联谊会，假文津俱乐部举行。出席联谊会的有在京顾问、名誉理事、理事、会员以及各界来宾共三百余人。

研究会会长费孝通出席并讲话，他简述既往一年的工作成绩后，向支持本会工作的单位和朋友表示感谢，祝全体与会者节日愉快，万事如意。

1 联谊会主会场
2 费孝通会长致词
3 4 5 6 7 会场一角
8 新春挥毫

炎黄春秋

2 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费孝通

5 20年前"政治生活准则"出台记……李之琏
8 "皇甫平"文章的背景与论争……周瑞金
12 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中的董其武与傅作义……张新吾
20 解放前夕南京科技界反搬迁斗争……李　扬

24 我亲身经历的一段国共和谈……叶笃义
31 鲁迅逝世十周年祭在上海……袁　鹰

35 回忆罗贵波对我的关怀……刘恪山

38 吴有训博士为国"打工"……聂　冷
44 人权卫士——中国将军——贺明十年笔耕著华章……魏亦胄

50 "作民主"与"民作主"源流考……丁守和
53 我在报上批评省委书记以后……李　宾

55 我妈妈上官云珠最后的日子……韦　然
58 有官职无官气的邵力子……金光群
60 勇于"造命"的女教授陈衡哲……吴继路

62 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知多少……赵友慈
70 云南历史上第一个"省长"赛典赤……张永杰

73 台湾人在北京……何　标

78 浮光掠影看新加坡的成功……王东哈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絜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徐　孔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法律顾问：程振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II－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I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84020891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4.80**元

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 费孝通

每一个人，都依赖他所受之于前人的文化取得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并生活在人和人组成的社会中。人类历史发展到最近几个世纪，发生了激速的变动。社会和世界日新月异。个人赖以生存和生活的文化也必须适应这些动态。当前世界上各个文化都面临改革的选择，事关存亡绝续，历经着和面临着不断的挑战。我们中华文化并非例外。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一个推陈出新、继续发展的迫切课题，是我们作为炎黄子孙，中华民族这一代的成员，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我们受之历代祖先的中华文化。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文化也不能没有实事求是的自觉意识。获得“文化自觉”能力的途径离不开中华文化全部历史及其世界背景的认识。在 20 世纪向 21 世纪过渡的关口提出这个课题，着重加深对我们亲身经历的这段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认识也许更具现实意义。

一

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是一以贯之的。但是，这种包容性并非在任何时代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事实上，它的充分体现总是与某些历史时期相联系。根据常识可以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盛唐时期，都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得以充分体现的辉煌时期。这可以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文化特色的发扬，离不开强盛的国力和文化宽容的环境。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中又将进入一个强盛和民主的时期，我们就应该意识到，生活在新世纪中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机遇的到来。

二

“地球越来越小了”——这是我一生经历中最深刻的感受。七八十年前，我心目中的外婆家相当

遥远，要在运河上坐一条手摇的小木船走上一整天。一早上船，船上用餐，到外婆家已近黄昏。实际距离多远呢？15 公里。现在通了公路，中间不阻塞，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距离的概念已经用时间来计算了。这是一个具体例子，说明现代化在人和人的关系上表现得最深刻的就是距离缩短了，接触加多了，范围扩大了，往来频繁了。全人类就这样被疏疏密密地编织在一起，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大社会。

再一个给我深刻感受的是经历了历史性的战争。20 世纪的前一半时间里，发生了两次被称为"世界大战"的重大事件。20 世纪之前，如此世界规模的战争是没有过的。进入 20 世纪之后，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们已经联系得休戚相关，如此密切，甚至可以在世界规模上用枪炮来对话了。战争固然出于对抗，对抗却也是一种难解难分的联系，并且也总是以加强联系为终结而终于导致联合。

联想到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我曾经把 20 世纪的人类比喻为世界范围的战国时期。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全球性的从分到合的运动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有人提出了 One World 的概念，不妨翻译成"世界一体"。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前出现的群雄争霸，导致了秦朝的大一统局面，形成了当前中国统一体的核心。从这一点上来看 20 世纪，我领会到，在世界大战中提出的"世界一体"绝非偶然，它也许是合乎逻辑地指出，群雄争霸的 20 世纪已为人类向全球性大社会的方向发展作出了开导，准备了条件。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充分注意、深入阐发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点将是富有建设性的题目，也可以作为我们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入口。一个充分体现出这一特点、富于时代色彩而又影响广泛的当前史实，是众所周知的邓小平倡导并实践着的"一国两制"。我认为，"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由于它本身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能不能相容相处的问题，所以它还有文化上的

作者费孝通

意义。这是 20 世纪末叶发生的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验，它为新世纪中人类对不同文化可持的明智态度做了重要提示。在很多情况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左右分明，互不相容，对峙几十年的冷战时代成了20世纪突出的历史事件。可是这种矛盾在中国，它们却可以并存。"一国两制"，也许是中国文化特点中的包容性的继续发展。窥斑而知豹，可以帮助人们建立信心，在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社会制度具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香港回归以来的这段中国历史又可以进一步证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仅能和平共处，而且在实践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互补性，具体地发挥了互相促进的作用。经过历史的考验，也可能逐步发展成持续繁荣发展的长期的制度。

三

上面所提到的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古代先哲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点有密切的关系。"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多

元互补”是中华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得以连绵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对待其他文化、其他民族的态度也有她的特点。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讲正道而远霸道，主张以理服人，反对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以德服人就是用仁爱之心来处理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心中有我，也有别人。在人际关系中“推己及人”，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觉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出发，方能在群体生活里，建立起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容忍、互相有利的合作关系，实现共同的发展。以德凝聚成的群体才是牢固的，所以说“以德服人者王”。我想，在人类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中华文化的这种历史经验，可以为世界形成新的和平秩序提供值得思考的启示。

我们对历史上传下来的世界上的各种文化是一视同仁的。孔子一向主张“有教无类”，感到自己在中原不能行其道，曾想乘桴浮于海，甚至表示愿意移居九夷之中，这些说明他没有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和态度。这一点，也是中华文化传下来的一个好传统。在今天提出并且实践“文化自觉”的迫切课题时，我们要发扬这个好传统，一视同仁地看待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世界上的各种文化。我们相信，人类传下来的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对人类的发展起积极作用的一面，同时也都有它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当在梳理和理解人类文化古今之变的过程中，对每一种文化都采取存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选择态度。我们主张对各个已有文化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应强调选择上的自主地位，但反对任何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和态度。为了使得各种文化在适应全球一体化的同时能发挥其选择上的自主性，我们认为首先各种文化应当有充分的自觉性，都应该有“自知之明”。所以我们提出，当前要提倡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合。各种文化都实现了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有条件在相互接触中自主地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前提的基本秩序，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

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我们有责任从认识自己的文化开始，在认真了解、理解、研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参加现代中华新文化的创造，为新世纪的文化建设积极准备条件。

1996 年 9 月为纪念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 60 周年，费孝通应邀再返吴江市。图为费孝通（右三）、钱伟长（左二），看开弦弓发展模型

切中时弊　痛下针砭
20年前"政治生活准则"出台记

● 李之琏

20年前出台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部极其重要的具有法典性的文件。她是在粉碎"四人帮"两年后,全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战略转变的历史关头,适应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需要而产生的。她是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处理党内关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汲取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惨痛教训的基础上写成的。她的发布,对于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流毒,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团结全党执行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周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恰好在中共中央纪委工作,我愿意就我所接触和了解的一些情况,谈谈《准则》的制订过程和她所发挥的积极影响,这对于关心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人们,我想是有意义的。

三中全会重建纪检机关
胡耀邦建议讨论《准则》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历史新篇章。经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批判,党已经在思想领域取得了拨乱反正的空前胜利,恢复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就需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从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党风建设,肃清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影响,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就成为当务之急。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使在"文革"中被砸烂取消、中断了十多年之久的纪检机关得以重新开始工作。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有委员100人,由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和从各方面挑选的优秀中青年干部组成,陈云同志任第一书记,邓颖超同志任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任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任常务书记,还有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袁任远、章蕴、郭述申、马国瑞、李一氓、魏文伯、张策等十一位副书记。这是加强党内建设的重要组织措施之一,反映了党中央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坚强决心。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后,立即以紧张的战斗姿态投入了工作。1979年新年伊始,1月4日至22日中央纪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纪委成立前,胡耀邦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就根据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筹划起草了一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草稿,中纪委成立后,他建议将此列为第一次全会的中心议程。他的建议得到了全体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大家一致认为,针对当前党内存在的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制定一个准则,对医治党的创伤,加强党的整体,整顿党的作风,恢复优良传统是很有必要的。邓颖超在全会上讲话,称赞这个十二条准则很好,是耀邦和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为

我们全会做了一项很好的准备工作，是我们今后进行工作的有力武器。全会分为五个小组，经过认真详实的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报送中央批准。1979年3月19日以中央文件印发至县团级党委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并要求于同年9月1日前将意见报告中央纪委进行汇集、整理、修改。中央纪委共收到各地报告148份，党员个人来信50件，提出修改意见达1800条。经过中央纪委各位书记多次讨论，十二次易稿，最后的正式报告稿由胡耀邦同志签字上报中央。这个文件原准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在讨论中，邓小平同志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文件，他建议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审查，用全会名义发表，使文件更具有权威性。这样，于1980年3月15日，经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后，由新华社播发，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布。

《准则》有强烈的针对性
《准则》体现了全党智慧

《准则》是集中了全党智慧写成的。在《准则》制订过程中，发动广大党员干部，一方面进行学习、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一方面回顾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罪行，充分贯彻了群众路线。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在抓好本身学习和讨论的同时，并对所属各级党组织的学习讨论和征询意见的工作，予以督促检查，最后将意见汇集报告中央纪委。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对《准则》学习讨论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认为《准则》总结了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的经验教训，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表达了他们迫切要求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强烈愿望。这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证明：

一，从《准则》十二条的题目，看《准则》内容针对性之强烈。先看原稿和曾用过的题目：

1. 一切重大问题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
   (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
2. 如实反映情况
   (要讲真话，不许讲假话)
3. 党内不允许搞宗派
   (要搞五湖四海，不许搞宗派)
4. 有话摆到桌面上，不搞阳奉阴违
   (坚持原则，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5. 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
6. 思想上理论上的不同意见，只能民主讨论，不能压服
   (思想上、理论上的不同意见不能压服)
7. 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
8. 保障党员的申诉权利
   (保障党员的权利和申诉权利)
9. 党内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10. 禁止无原则的的歌功颂德
11. 党员之间是同志关系，不能搞特殊
    (党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准搞特殊)
12. 党员必须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后来，经过全党讨论，中纪委根据各方面所提意见，将内容相似、相近的条文做合并处理，新增写了“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作为第一条；“维护党的统一，巩固党的纪律”作为第三条；“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作为第九条，“努力学习，作到又红又专”作为第十二条。

《准则》定稿仍为12条，但内容更为充实；有些题目的文字有变动，但其内容的针对性和鲜明性并无改变。

二，从起草、修改过程中的字斟句酌，看《准则》行文的严肃性。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其一，在十二条“原则”前面的一段序言性的文字中，谈到制订“准则”的必要性时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认真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加强改善党的领导，在全党全国范围内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又有统一意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很明显，这段文字中的三层“既有……又有……”的论述，是从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引来的。但是，却把毛泽东讲话中的集中与民主，纪律与自由，统一意志与个人心情舒畅、生动

活泼的前后顺序，作了颠倒。这是在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上有些委员针对多年来党内存在着的一味强调集中纪律，而对民主、自由有所忽视的倾向，提出建议把民主、自由、个人心情舒畅分别放在集中、纪律、统一意志之前，《准则》接受了这项建议，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表述。

其二，在原稿“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一条中，曾有“要实行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这句话。这一过去被视为行之有据且经常被引用的话，讨论中许多同志认为，根据多年的经验，“思想批判从严”，执行起来容易形成无限上纲，“组织处理从宽”，容易形成宽大无边。同时，思想批判从严以后，组织处理也往往不易从宽。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思想批判和组织处理都要实事求是。因此，在《准则》中删掉了这句话。

本文作者李之琏近影

陈云说党风问题要“永远搞”
胡耀邦说“三股潮流”挡不住

《准则》公布后，各级党组织普遍开办轮训班，组织党员认真学习；不少单位和部门制订了贯彻执行《准则》的具体措施；有的部门健全了党的组织生活，加强了集体领导；有的部门参照中央的规定，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制订了具体规定，等等。但也有的部门贯彻执行《准则》决心不大，行动迟缓；有的单位对一些重大是非问题旗帜不鲜明，不正之风未能有效地制止。

为推动进一步落实《准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 1980 年 9 月召开了有国家机关各部、委同志参加的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会讲话。这次会议提出，贯彻《准则》必须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要扫除封建意识。与会者谈到，很多不正之风都同封建意识有关，如干部制度上实际存在的终身制，个人迷信，任人唯亲，一言堂，阿谀奉承，搞特权，等等。这些封建意识不清除，党的优良作风难以恢复发扬，社会风气难以带好。与会者指出，贯彻《准则》，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

1980 年 11 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讨论如何进一步搞好党风问题。胡耀邦在会上传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的重要意见。

胡耀邦在讲话中谈到要深刻认识搞好党风的重大意义时，根据党的历史，他分析了党的路线、政策同党内生活、同党的作风的关系。他认为，从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教训得出结论：只满足于路线、政策的正确，而忽视党的生活的建设，忽视党的作风的建设，这是站不住脚的，是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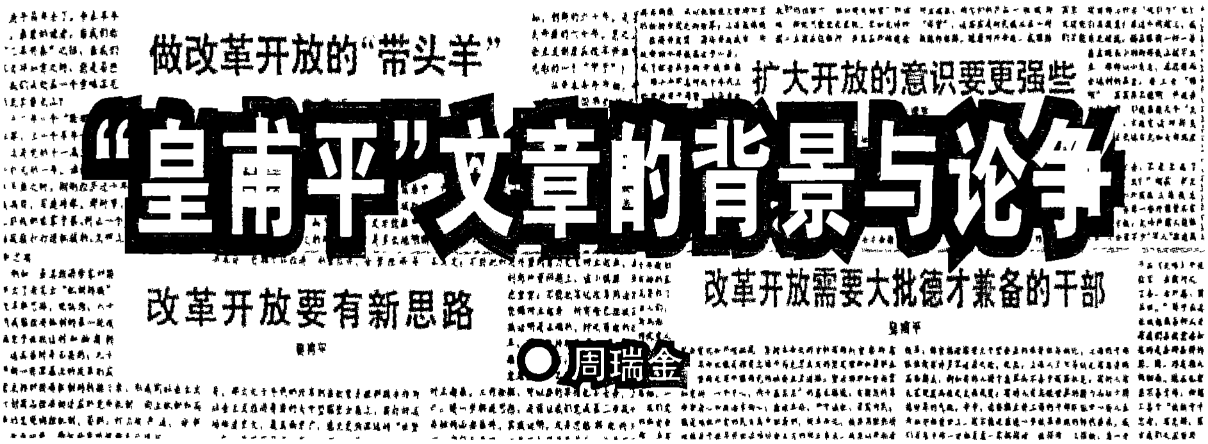
胡耀邦说，他同意“不正之风还相当严重”的估计，同意“不正之风是个腐蚀剂”的看法。但是他说，我的意见，不要悲观，不要无所作为。

他说，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当前，在今后的若干年，或者十几年，或者二十年，我说有三股潮流是阻挡不住的。第一股潮流是团结起来干四化；第二股潮流是健全民主和法制；第三股潮流是发扬党的好传统，要求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这三股潮流汇成一股总潮流，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的中国。

（作者曾任中宣部秘书长、中纪委常委、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　洛　松）

“皇甫平”文章的背景与论争

○周瑞金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新闻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舆论先导作用，这是20年来贯穿我国新闻工作的一根鲜明的红线。

从三个重大历史关头上看舆论先导

新闻工作，是时代的晴雨表，社会的风向标。它总是灵敏地反映着人心所向和时代发展趋势。20年前，“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发动和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具有深远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准备。这场大讨论和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讲话，成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宣言书。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面临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当时，广大干部群众都在深刻思考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对不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要不要继续深化、扩大？面对这种困惑，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作了两次重要讲话，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讲话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精神，上海《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半月谈》，根据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发表评论文章，倡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9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思路。由此引起一场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论争。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在党的十四大上，全党统一认识，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强调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成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历史新阶段的又一个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前，我们党又面临着新的、可以说是新时期第三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在年初去世，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考验摆在党和人民的面前。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处在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各种深层次矛盾需要妥善解决，新的思想理论疑惑需要加以澄清。江泽民总书记在这年5月29日到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出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决策，成为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宣言书。又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北京一些新闻媒体闻风而动，根据江泽民同志“五·二九讲话”精神，兴起新一轮思想解放的舆论宣传，

为十五大召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综观20年来我们党面临的三个重大历史关头，我们的新闻媒体都是敏锐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紧紧地同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高度一致，发挥了改革开放舆论先导的作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国广大新闻工作者甘冒风险和压力，作出了应有的重要贡献。

“皇甫平”文章的背景与论争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上海《解放日报》社工作，时任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主持报社的社务、党务和评论、理论、经济宣传等一部分编务工作。我亲身经历第二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的舆论宣传全过程。因此，本文将着重回顾这一段新闻工作的体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上海新闻工作者是如何为推动改革开放而发挥舆论先导作用的。

面对国际国内的政治风波，在一段时候，我们的宣传工作存在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有的甚至偏离了经济工作这个中心。同时，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在滑坡，国有企业的改革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特别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江泽民总书记根据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在七中全会开幕式上重申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提出要大胆利用一些外资进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强调“即使冒点风险，也一定要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

1991年初，邓小平同志按习惯来上海过春节。1月28日到2月28日，他在上海视察了好几家企业，仔细倾听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汇报，并就改革开放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他又一次阐明“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同志恳切“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鼓励上海干部群众“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凭自己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政治敏感，我觉得邓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很有针对性，他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的。他两次强调市场与计划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正是“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核心，是深化改革的新思路和主要方向。这不仅对上海工作，而且对全国都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不是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吗？当时我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深感有责任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加大改革开放的宣传力度。于是，我主动邀集两位同志一起讨论撰写四篇署名为“皇甫平”的文章，阐述邓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第一篇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放在“辛未羊年”春节(1991年2月15日)刊登，鲜明地提出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要增强改革开放的历史责任感，强调“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第二篇题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3月2日刊登)，强调“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

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特别提出“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两者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再次强调“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僵滞”。第三篇题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3 月 22 日刊登)，明确提出对改革开放中的新探索，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而坐失良机”，要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第四篇题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4 月 12 日刊登)，强调改革开放需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干部的选拔任用一定要是人民群众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作出实绩的人。

《解放日报》这四篇署名评论当时读者称为“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不少人来信来电询问文章作者“皇甫平”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受启发，有助于解放思想，打开思路。一些干部来信赞扬文章以加大改革开放分量为主旋律，“说到我们心里去了”。一些经济专家学者反映，文章对市场与计划关系的论述是“及时雨”，有助于推动理论研究，加强我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全国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驻上海办事处接到本省、区、市领导的指示，要求收集“皇甫平”全部文章，并向报社了解发表背景。一些外国驻沪的领事馆和记者也纷纷来电话询问文章背景，要求采访作者。

与此同时，国内也有一些人利用座谈会和少数报刊对“皇甫平”文章进行责难和批判。他们虚设论敌，无限上纲地指责什么“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它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妄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是“改革过程中的阶级斗争”。有人公然责问：“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更有甚者，有人公然认为“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商品经济是瓦解公有制的根源”，甚至说什么“80 年代改革开放造成新的阶级分化，新的剥削制度和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为社会主义造成前所未有的深刻危险”。有的文章还鼓吹揪党内走资派，说什么“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党内确实出现了极少数力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要警惕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他们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有的人明目张胆借批“庸俗生产力论”和“经济实用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小平同志。

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定冒风险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我们本想进行批驳，但上海市委领导出于维护大局，指示我们淡化处理，不搞争论。这样我们便顾全大局，不予置理，相信大多数干部群众会明辨是非，服膺真理。

大音稀声扫阴霾

针对这种情况，江泽民同志在 1991 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的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了一大段关于改革开放的话，而且把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进行了阐述。1991 年 9 月 1 日夜，他又下令将第二天刊出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接着，江泽民同志又在 9 月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批评了一家大报对他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作了断章取义，片面强调反和平演变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总书记对那些喜欢拿大帽子吓人，好作抽象争论的人的鲜明态度。

我们根据江泽民同志讲话精神，继续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例如苏联八月变局后一个星期，我们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评论，明确提出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阐述只有改革开放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10 月间，我执笔撰写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篇文章，着重论述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苏联的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作一个鲜明阐述，同时，也回答了当时有人把我国矛盾归结

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妄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矛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要求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矛盾”的错误论调。接着，在12月间，我们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两论《改革要有胆识》的评论，批评那种反对冒改革中的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

真是难忘的1991年！这一年由“皇甫平”文章引发的“姓社姓资”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论争，是要不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交锋，归根到底是要不要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斗争。

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尽管已经从一线退了下来，又已88岁高龄，仍以一个老党员老公民的历史责任感，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不辞劳苦，视察南方，发表发聋振聩的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尖锐指出“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和判断是非标准的“三个有利于”原则。他要求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注意培养人，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等等。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曾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具有多么巨大的震撼力量，是我们大家都亲身经历和感受到的。

舆论：改革开放的先导

又一个大年（壬申）初一（1992年2月4日），《解放日报》又一次在头版显著地位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这是全国新闻媒体中最早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接着，中央和全国报纸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宣传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3月下旬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深圳特区报》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通讯，栩栩如生地传播了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活动和谈话。一个宣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蓬勃的舆论环境，就此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解放日报》也以极大的热情，连续发表署名评论，深入阐述南方谈话精神。4月发表《论走向市场》，系统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6月初发表《论加速发展》，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抓住时机，发展经济，过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崭新经济思想，并对加速发展如何避免经济过热作了分析。接着，又发表《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就“姓社姓资”问题提出的根本标准，系统回答了1991年有些人就“姓社姓资”问题提出的责难。7月初，我们又发表《论“换脑筋”》一文，阐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必然要求人们在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等方面“换脑筋”，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

回顾从辛未羊年到壬申猴年这一年的宣传报道，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邓小平南方谈话像灯塔一样廓清了迷雾，扫除了阴霾，集中体现了党心民心军心之所向，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它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激起亿万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极大积极性，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皇甫平”文章，也因此获得了解放。曾被当作靶子围攻批判近一年的“皇甫平”，1992年6月在全国好新闻的评奖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

这表明，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经济是众望所归，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顺应这个历史潮流，新闻媒体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不断创新，在宣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前驱的作用。

（本文作者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洛　松）

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中的董其武与傅作义

● 张新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困居绥远省一隅的国民党部队，已处于既无险可守，又无路可走的地步。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用"绥远方式"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原国民党绥远省主席、绥远省保安司令兼"华北总部"驻绥部队指挥官董其武与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领全体军政人员于1949年9月19日起义。

董其武匆匆飞往北平，傅作义说："在这么忙乱的时候，你来干什么？"

1949年1月21日夜，归绥的千家万户都已入睡，为绥远前途安危而焦虑的董其武，在广播里听到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协议，宣布北平和平解放条文。董虽已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这一时刻到来时，他仍感到突然和不安。他当即向北平通了电话，要求第二天派飞机接他到北平去看看。

22日，董其武乘专机到达北平后，直接驱车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一见董就说："在这么忙乱的时候，你干什么来啦？"

董说："正是这会儿才要来看看您。"

傅说，你来了也好，我把北平的情况向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三个死下的决心。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了徐永昌、郑介民、蒋纬国，软硬兼施劝我率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了蒋的亲笔信，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等等，我都拒不接受。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先后飞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他保证美国海军全力支援我们。我当即给他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能办得好。"接着傅作义又加重语气说："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了。"

"走人民的道路"这句话，傅作义不止一次讲过，董其武此刻听来才真正理解了傅作义这句话的含意。

董其武急切地问："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

傅作义说:“绥远的问题等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后再说吧。”

董眼巴巴地看着傅说:“我多年跟您做事，对您是言听计从,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可是绥远的情况相当复杂,不可拖延,应尽早安排。”

傅作义在绥远主持军政多年,和绥远军民甘苦与共,自属情深。北平虽说解放了,但是在绥远还有他指挥过的旧军队,有他任命提拔的军政界高级干部,有他多年相处的人民群众,所以,当他拼着“三个死”圆满地实现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以后,绥远问题就成了他日日夜夜萦怀的大事了。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傅作义的这种思想了如指掌。关于绥远问题,毛泽东在西柏坡明确的对傅作义说过:“有了北平起义,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放嘛,等待他们起义。”

毛泽东对傅作义说:绥远问题可以采取“绥远方式”解决。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先划个和平线,让董其武先做好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处,把铁路接通了,便于人民通邮来往;把贸易搞起来,并逐步统一货币;加强宣传和文化交流。然后再看董其武什么时候觉得可以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

董其武听了傅作义传达毛泽东的话,决心走和平道路

董其武听了傅传达的毛泽东的话,非常感激,决心走和平道路。但他清醒地想到绥远情况复杂,欲达目的,必须谨慎从事。首先是南京方面,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必然对绥远部队不放心,会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干预,包括指使特务进行捣乱和破坏;至于绥远内部,各族人民群众和部队士兵是欢迎和平解放的,下级干部大多数也是反对内战、倾向和平的,但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封锁进步的声音,在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中层干部中存有对共产党的对立和恐惧的心理。而当权中的顽固分子,还会阻挠和破坏起义。董其武认为若无充分准备,贸然提出和平起义,反会偾事。董由北平回到绥远后,把掌握思想动态,安定部队情绪作为首要任务。他先后找军队师旅一级的干部、地方厅局长以上干部谈话,并与省议会会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和东四旗代表胡凤山、回民代表吴桐等分别谈话,传达他赴平与傅作义晤谈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下级军政干部的思想情况,董其武要求他们就当前形势进行讨论,如怎样看待北平起义,共产党军队能否渡过长江,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爆发,绥远应该怎么办等,诱导大家看清形势,丢掉幻想,不作无谓牺牲,走和平解放之路。

春节过后,董其武又巡视部队和地方,直接与一些军政干部和士兵接触谈话,稳定部队情绪。

1949 年 3 月间,平津前线司令部各首长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绥远方式”,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贺龙提出解放军参加绥远和平谈判的代表为李井泉、潘纪文;绥远方面则派阎又文、周北峰为代表。

双方努力,《绥远和平协议》在西交民巷签字

3 月 23 日,双方代表在北京饭店开始第一次商谈。经多次协商达成了关于绥远的协议草案。主要内容是: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旗下营至归绥一段立即通车;恢复两地区商业贸易往来;通电、通邮、文化交流,人民可以自由往来;双方货币可以互相通用兑换;原绥远省的军队和政府均保持现状,维持社会安定,通过宣传教育,促进社会进步,达到起义,达到和平统一。协议中还确定由华北局指派联络办事处驻归绥,协同执行协议上的各项条款和过渡的有关事宜。

此后,贺龙、李井泉离平去前方,中央确定绥远起义的工作由聂荣臻和华北局书记薄一波负责。华北局指定张友渔、李哲仁和潘纪文参加

一九四八年的傅作义将军

谈判。傅作义又增派王克俊为谈判代表。

4月下旬，傅作义派原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原傅的随从参谋）和刘庸笙携带双方拟定的和平协议草案和双方驻地临时分界图去绥远，让董其武审阅，并向董传达傅作义如下的一段话：

"体会毛主席留待绥远起义的宽大政策，团结一致，实行完整的起义，勿使部队分裂，使人民遭到损失。"

董其武及时召集军政要员和地方代表人物，传达了傅作文的意见，讨论协议的草案。讨论中大部分人赞成，有的人不表态，极个别的人怒气冲冲，几乎动武。

董其武遇事不惊，冷静对待。他说，分歧难免，走人民的道路和接受和平协议决不动摇。会后，董一方面做个别人的工作，一方面派原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代表他赴北平，向傅报告对草案修改的意见。

协商的最后条款经双方同意后，于6月8日在西交民巷银行俱乐部举行签字仪式。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蓝公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在协议上签字；康保安代表董其武履行签字手续（在协议上盖了董其武图章）。

《绥远和平协议》签定的当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傅作义，在座的有朱德、周恩来、聂荣臻、薄一波和陶铸，被接见的还有邓宝珊、周北峰和阎又文。

毛泽东说："你们协商的条款，我已看了，就按那些条款进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清楚，是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才能有这样的方式解决绥远问题。我们叫做'绥远方式'。傅作义先生做得很好。"

6月14日，傅作义派原华北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该处宣传科长李杰忠，携带《协议》文件去绥远协助董其武执行协议。当时，国民党方面的绥远驻军有八万余人。这些部队成分不一，政治态度各异，要使《绥远和平协议》最终实现，还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行前，傅作义对入绥工作人员作了详尽的指示，特别强调："入绥后，要以董为主，帮助其武做好内部统一认识的工作。"

傅作义所不放心的是刘万春的态度，因此提醒入绥人员特别警惕。刘原是徐永昌的旧部，先后曾任师参谋长、绥远游击司令和副军长、军长。至绥远解放前，刘还兼任绥、包两市警备司令，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傅作义对刘万春的情况做了中肯的分析。他说："刘掌握一部分兵权，又倚仗与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的老关系，再加上他是回族，与宁夏马鸿逵相识，自认为大权在握，进退有路，是不会甘心情愿听我们行动的。刘万春、鄂友三、乔汉魁等人最近在归绥瞒着董召开秘密会议就是例证。"傅告诫说："对刘万春必须严加防范，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他，削弱他对执行《协议》的干扰。"

赴绥人员抵绥后，董其武先于6月24日召集高级行政人员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各项决议；7月8日，又分别向各部队长宣布《协议》内容，并进行必要的说服工作。《绥远和平协议》正式签定后，董其武又借助傅和平通电的东风，同绥远各界有计划、有步骤

地开展各项革新活动。其中包括组织革新委员会;改组省级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成立革新学院;教育、使用东归干部(指张家口、新保安、北平解放后回到绥远的傅的干部);设立督训处;改进报纸宣传;召集军队高干会议等。

南京政府软硬兼施,董其武与其斗智斗勇

北平和平解放,绥远即开始酝酿和平。蒋介石南京政府为阻挠和平,3 月初命令董其武率绥远部队西撤。董既然决心走和平道路,当然决不听从南京的命令,便找两条理由回绝。一是绥远目前还算稳定,暂时不应西撤;二是驻绥远部队的下级官兵多为当地人,轻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南京政府看董不听调动,又派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绥远籍的祁子厚和董的同乡严子言二人乘飞机来绥远,要接董去南京与蒋介石见面,也被董不硬不软地托辞拒绝了。

南京政府两次碰壁后,便使出"撒手锏",停发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绥远本是一个贫瘠的省,这一招儿确实使绥远经济上立即陷入困境。董多次去电申请和派人交涉,南京政府不是不予理睬,便是故意推托,惟一的答复就是"让董主席来"。董当然知道这是南京设下的陷井。若董到了南京,个人安危且不必说,首先形成群龙无首局面,那些反对和平的恶势力,必然猖獗起来,使和平解放夭折。

为度难关,董其武号召军政各界节衣缩食。天热了,改冬装为夏装;军政官员和士兵、工勤人员等,每月仅发五块或两块现洋的生活费。

其间,南京政府的破坏活动不断。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晋北等地解放后,这些地方的特务麇集绥远。华北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由北平去绥远了解情况,布置任务。甚至有的特务头子带着电台潜入部队,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勾结一起。

一时谣言四起。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明年就要爆发"啦,"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就要率美军来中国参战"啦,"国民党在缅甸训练许多军队就要出来作战"啦,蛊惑人心。

国民党特务还伙同顽固分子,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包头游行示威,沿街散发传单,高喊"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的口号。

《奋斗日报》在革新运动中积极靠拢人民,宣扬绥远的和平革新行动,刊登解放战争胜利消息,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政治,被特务们视为眼中钉。7 月 8 日晚,二五八师政治部主任赵元德煽动士兵二十多人砸了报馆门窗、机器和家具,编辑、记者、工人多人被打伤。

在特务大搞破坏的同时,南京政府又使用了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的卑劣手段。7 月间南京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乘飞机抵达陕坝,事前通知董到陕坝会面。见面后,他们力劝董把军队西撤,董回答说:"北平问题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发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徐马上说:"这是误会。"董说:"我们部队西撤可以,但是几个月的欠饷都得如数补发。因为部队的下级官兵多半是当地人,总得安安家吧!"徐永昌立即回答说:"我们回去后研究给你们补发吧!但是你们的部队一定要向西撤。"

董其武为了应付徐、王,并能尽快得到补给,便命令忠诚可靠、实力较强和装备较好的张世珍的独七师向西开往河套。但董秘密命令他说:"我们的敌人已不在东边,而在西边。你师进驻河套后,坚守乌不浪口和西山嘴,没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窜者,一律予以阻击解决。"

董其武这样做,果然对南京起到了迷惑作用,补发了欠饷,拨来了黄金 1900 两,并且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行政副长官。董非常明白,这黄金是收买,这任命是"明升暗降"要架空他。董针锋相对地向南京政府发电报称:"请选派贤能来接替我的一切职务",给了南京政府又一个不硬不软的钉子碰。

过后，董其武将电拨黄金一事报告傅作义，傅转向毛泽东汇报。毛主席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收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困难呢?应该再设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

蒋介石派徐永昌、王叔铭去绥远，表面上是要绥远部队西撤，暗中是要使绥远部队分裂，以达破坏绥远起义的根本目的。徐、王二人了解到孙兰峰对起义持观望态度、刘万春反对起义，他们回到南京后，便建议实施离间计，为拉拢孙、刘，把矛头对准董其武，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副司令官。

尽管南京政府诡计多端，而董其武成竹在胸，自有一定之规。6 月 18 日下午，去北平参加《绥远和平协议》的绥方代表王克俊、李杰忠到达归绥市东郊南店村，刘万春早已在那里等候。一见面，刘万春就向王、李索要《协议》文件，并神情诡秘地说："绥远这里许多人不赞成和平解决，反对投降共产党，《协议》千万不能公布，不然要出乱子。"又假惺惺地说："咱们等天黑再进城，这样安全些。"其实，刘万春去南店村等候王、李，是董其武特意安排的，因为刘曾说对王、李去绥的安全他不负责，董让刘去接，就是有意把负安全的责任放在他的身上。

围绕联络处进驻归绥，同反动势力的斗争愈趋剧烈

围绕联络处进驻归绥的斗争更为激烈。华北人民政府依据在北平签订的《协议》，责成中共绥远省委抽调人员在丰镇组成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远联络处。其成员有：潘纪文、鲁志浩、李贵、何树声、张露、郎觉民、张光、曹文玉、李文超、于峰等二十余人，潘纪文任联络处处长、鲁志浩任联络处主任。联络处下设两个组，铁路工作组，组长由郎觉民担任、银行工作组组长由张光担任。

7 月 15 日，董其武派寿跃南、李杰忠前往

在绥远起义通电上签字的董其武

丰镇商谈联络处具体进驻日期，确定为 7 月 20 日。次日，李杰忠先行返回归绥。傍晚借王克俊前来向董其武汇报联络处将由潘、鲁率领进驻的机会，董让人打电话通知刘万春来听汇报，因为他负责治安工作。刘到后说："绥东来人，应把武器集中起来由我保管，不许随便上街，否则出了问题，我不负责。"又说："这些日子《奋斗日报》登载很多新华社的消息，简直成了共产党的报纸，有人要砸它，共产党员李健生(党的地下工作者，原来是傅部的一个连政工员)，又跳得不行啦，有人要收拾他。"

在座的人听了都愣了。董其武则说："人家是客人，又是来工作的，不能那样对待，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刘万春二话不说，扬长而去。刘走后，董其武等人继续研究接待问题，决定由康保安、张国林、王景泰、李竭忠、张鸿恩等人组成接待班子，负责与联络处的人联系，安排好食宿和保卫。

董其武决定把联络处安排在归绥新城西落凤街 6 号的一幢楼房里，银行工作组驻归绥银行，铁路工作组驻火车站，并调动了可靠部队加强保卫。

7 月 20 日，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进驻归绥，董其武举行了有军政首脑和地方绅士参加的欢迎宴会。双方在热烈的气氛中共祝绥远和平解放的早日到来。

联络处进驻后，积极开展工作，与董方有关人员研究了通车、通商、通邮及金融、文化、宣传等事宜，并与绥远军政上层和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宣传协议精神，讲解党的政策。自此，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身穿灰色制服的共产党干部，喜形于色的人们奔走相告："共产党来了！""解放的日子快到了！"与之相反，把联络处人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反动势力，更加紧了干扰和破坏。他们从漫骂、冲击直至升级到持枪行凶。7 月 24 日下午，联络处的工作组秘书王士鑫等四人途经归绥警备司令部门前，三个便衣歹徒上前挑衅、恫吓。王等当众严词斥责，特务们慑于众目睽睽，未敢动武。当王等人行至慈善院附近时，特务突然投掷手榴弹，将王士鑫炸伤，送往医院后，因伤势过重而牺牲，另一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查明率众行凶的是二五八师段锦堂团的李锡庆连长。李曾是刘万春的马弁。李发觉被追查，就伪称是奉命"剿匪"哄骗一部分人一同潜逃了。董其武严令军长刘万春、二五八师师长赵晓峰、独立第七师师长张世珍缉拿凶犯。段锦堂当即率三个连将彼等追回。这时这一伙士兵才知道是受了李的欺骗，而段立即将李就地枪决了。段听命于刘，为什么不把凶犯押解回来，不经审讯就迫不及待地将李枪决了呢，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但董其武考虑到绥远当时的局势，从大局出发，未加追究。

面对这种严峻局面，董其武对和平前途十分焦虑，当即电告傅作义转报中共中央。不几天薄一波通知周北峰说："毛主席、周副主席要接见傅作义先生，今天晚上就去。"也让周通知阎又文一同去。

在接见时，毛主席指示说："事情总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可电知董其武多加注意。"又说："傅先生可偕邓宝珊先生到绥远走一趟，绥远的解放用'绥远方式'是不变的。绥远省将不用军管，由傅先生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待起义通电发出后，即进行组织。"傅作义特感欣慰，立即将毛泽东的指示电告为和平正在焦虑的董其武。

傅作义受命赴绥推动起义

8 月下旬，绥远起义条件逐渐成熟，傅作义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后，毛主席委托傅作义和邓宝珊等人，赴绥远推动起义。不了解傅作义将军的人，当时曾对中央这一重大决策，提出异议，耽心将成"放虎归山"。毛泽东批评了这种疑虑，相信傅去绥远一定能进一步统一绥远各界认识，彻底粉碎南京政府的阴谋，加速起义的步伐。

为确保傅作义赴绥能安全执行任务，在毛泽东接见傅作义的第二天，薄一波通知周北峰和阎又文到华北局去，研究绥远各部队的政治态度，并分析了绥远当时形势。会议由薄一波主持，聂荣臻和张友渔、李哲仁均参加了会议。

会议认为，除前几天傅作义已派张濯清(绥远省保安副司令)、王克俊前往绥远外，还应该与董其武部的主力第七师直接联系。于是，当即秘密派冯梓假借到北山开矿，带了几个电务人员赴绥远。冯梓与第七师师长张世珍接上头，由第七师的电台与北平直接联系，周北峰等人根据这些情况安排傅作义到绥远的驻地问题。聂荣臻说："傅到绥远可驻在归绥和包头之间。"因为当时包头已被国民党华北的特务头子张庆恩闹得乱腾腾的；归绥情况，虽然张濯清暂时说服了刘万春，但对刘的部下鄂友三、乔汉魁两个旅长的情况还不十分了解。所以傅到了绥远，归绥、包头不宜驻留。会议研究决定傅回绥可驻到归绥与包头中间的一个风景优美、明朝末年土默特旗顺义王的王府所在地——美岱召，电令第七师开一个团迂回大

青山后，前往担任警卫。傅赴绥前，毛主席指示由国家银行拨现洋十万元，作傅到绥犒赏原部属之用。

8月28日，天气晴朗，傅作义到达归绥，董其武率军政首脑和各界知名人士到车站恭迎。傅在归绥停留三天，向董其武、刘万春等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对绥远的指示。又分别传见了军政干部及地方各族代表，接待了军政人员和地方绅士的来访；传见了部队营以上干部，广泛了解了他们的思想动态和部队的状况。傅又向董其武、刘万春说："我已向毛主席请示过，在原来绥远的部队里'奋斗基金社'的积蓄除大部分交给国家外，北平还有些现大洋，这次也带来10万元，准备连同人民银行拨给的10万元，一同发给部队。"傅随后便移驻美岱召，召集在归绥和包头两地的高级将领开了两天会。

傅作义在归绥时由董其武陪同检阅了归绥驻军，分发了慰问金。官兵们亲眼看到傅作义安然无恙，特务分子种种谣言不攻自破，达到了稳定军心的目的。敌对分子慑于傅作义的威望，未敢轻举妄动。

9月10日，董其武随傅作义进驻包头。

其间，南京国民党政府得悉傅作义离开北平去绥远，又软硬兼施导演了一幕幕"丑剧"。保密局毛人凤密电潜伏在绥远某部队的军统特务头子赵思武："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让出华北。近闻该逆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任务完成后，本局当有重赏。"可谓杀气腾腾。但知傅作义到包头后，蒋介石又佯作关心，打电报给傅说："你这次回绥，如同我当年西安事变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今日亡危之大错，你要接受我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希接电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前往迎接，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傅作义对此置之一笑。

9月15日，一架国民党专机在包头机场降落。空空荡荡的机场上寥寥数人，不安地等候着来"客"——这就是既为傅作义同乡，又为傅作义老朋友，时任国民党军令部长的徐永昌。

就在同年1月北平和谈时，徐曾到北平说项，碰壁后嗒然而归。这次他又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来包头游说傅邓，放弃初衷，随他去广州。傅对徐永昌说："我一向为

绥远军政委员会全体委员就职合影。前排左起：苏谦益、荣祥、董其武、乌兰夫、高克林、傅作义、孙兰峰、张钦、奎璧，张濯清；后排左起：袁庆荣、姚喆、于存灏、裴周玉、王克俊、杨志林、潘纪文、刘万春、阎又文、杨叶澎

国家独立、民族振兴而奋斗，谁能救国救民我就跟着谁走。蒋先生私心太重，全不顾国家民族。国民政府已丧尽人心、军心，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即使我到广州也无能为力。现在不只北平、绥远解放，全国也要很快解放了。这是 历史的必然。”

徐永昌眼看任务完不成，回去难以复命，便佯称肚子有病，想在医院住些时日，再寻找工作机会。此时，绥远起义的通电稿已经拟好，徐永昌不走，无疑会给起义造成麻烦，傅作义便与邓宝珊、李世杰反复计议，想了一条妙策：由邓宝珊去找徐永昌说：“宜生(傅作义字)已让董主席给你安排好医院，请你马上住院。……宜生还说，你能在包头住下来也好，请你领衔，参加绥远起义吧，不要回去啦！起义后我们一同去见毛主席。”

徐一听这话，愣住了，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成了问题，就连声说：“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我对共产党没有认识，明早就动身，不妨碍你们的事情。”邓越是挽留，徐越是不肯。结果于 19 日早晨飞离包头去了广州。但在上飞机时，仍不甘心地说：“三年后再见吧！”

傅作义在包头先召集军、师、旅级干部分别谈话，而后邀集绥远各族、各界和地方代表人物，着重说明全国形势的发展，绥远走和平道路，对国家好，对绥远地方好，对个人也好，并与大家共同商议绥远起义的有关问题。

傅作义推心置腹劝部将，董其武、孙兰峰为首 39 人联名通电起义

傅在绥远的说服工作中，最值得记述的，是他同部将时任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的三次谈话。孙随傅共事数十年，早在傅当团长的时候，孙兰峰就跟他当连长；北伐战争时，孙当团长，1936 年绥远抗战时，孙和董其武都是旅长、“七七”抗战后，孙、董又在傅的领导下历任师长、军长等职，最后孙当了兵团司令。数十年患难相处，生死与共，孙傅之间结成非同寻常的袍泽之谊。但此时，因孙受国民党华北地区特务头子张庆恩反动宣传的影响，对绥远起义的意义和前景认识不清，傅与他不厌其烦，阐述共产党的统战政策、起义政策和“绥远方式”，言切意诚，晓以大义。

特别是在第三次的谈话中，傅作义最后对孙兰峰规劝说：“起义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字，惟有你还没有签字。你是不是还有顾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意同大家一道起义，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走，你就带哪个部队走。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傅的话，激起孙思想上的剧烈斗争，最后终于拨开认识上的迷雾。孙激动地淌下眼泪，断然地说：“我和傅先生患难与共，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谊如师生，我怎能离开你单独行动呢?好吧，它就是火坑，我也跟你跳！听你的话，马上签名。”说罢便在通电上签了名。此刻，是 9 月 19 日的凌晨。

几个小时之后，绥远军民在塞北包头迎来了一个庄严隆重的时刻，以董其武、孙兰峰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以及邓宝珊驻绥远的第二十二军代表共 39 人在这里举行了光荣起义，庄严地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发出了起义通电。至此，绥远省毅然脱离国民党政府，投入人民怀抱，傅作义历时一月的绥远之行，也圆满完成了任务。

(责任编辑：洛　松)

本刊更正

今年本刊第 2 期第 2 页的照片说明，“李先念”应为“余秋里”。第 20 页《为厦门特区安上翅膀》作者“王盛”应为“王盛泽”特此更正，并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编辑部

解放前夕南京科技界反搬迁斗争

● 李 扬

解放前夕的南京科技界，是旧中国科学技术队伍的骨干部分，拥有国民党中央政府四个系统的 16 个研究所，近千名科学技术人员。

1948 年 1 月—1949 年 1 月期间，由于国民党军队败局已定，国民党政府当局决定国立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教育部长朱家骅负责策划南京、上海科技研究所搬迁台湾和沿海各省，这一决定不得人心，反而形成了南京科技界反搬迁的统一战线；以南京为主阵地，上海为辅助阵地，形成以中共地下党员为引线，进步的科研人员为骨干，要民主、要自由的广大科技人员积极参加的反搬迁队伍，参加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二条战线。

败局已定，国民党政府紧锣密鼓筹划搬迁

辽沈战役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发生动摇。1948 年 1 月 12 日—26 日，国立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教育部长朱家骅“视察台湾教育”时，确定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兼台湾大学校长，以便安排由大陆迁台的研究所和由北平撤往台湾的校长、教授等学人。

10 月，济南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决战前夕，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迁广州。当月 17 日—24 日，朱家骅代院长“因公去广州”，请示决定南京、上海各研究所的搬迁定点问题。

11 月初，决定国民党政府命运的淮海战役开始，国民党军队节节惨败，南京岌岌可危，国民党政府着手部署所属研究单位的搬迁工作。

11 月 30 日、12 月 4 日，中央研究院以“在京人员谈话会”的名义，先由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主持，继由代院长朱家骅出面，召集在南京的七个所的所长、代所长、副所长 10 人开会，作出的主要决议是：

九华山数理研究基地的建筑工程停止，木料移作木箱以应搬迁；

各所于当日或次日征询全体同人意见，可能出国者助其成行；

南京各所与外地大学或学术机关合作分别进行。

12 月 9 日，淮海战役前夕，在南京鸡鸣寺一

号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朱家骅主持召开临时院务会议，对搬迁问题进一步作出决策：

南京地区文物装箱东运(上海、台湾)，拨300万元作应变费；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图书、仪器、文卷先集中上海，余由安全小组封存；沪区各所应变费28.4万元(金元券)。

几乎同时，南京地区安全小组于12月7日、11日两次召开会议，对搬迁工作做具体部署，接洽宁沪火车运输车皮，明确装卸地点，指定装卸主持人，并指挥押运人员；准备木箱2337只，分配给南京地区：历史语言所、地质所、气象所、物理所、数学所、社会所；分配各所应变费3000—5000元不等。

民心难违，科技人员斗智斗勇反对搬迁

经过一个多月的政治、军事决战，“总统”蒋介石“引退”，“代总统”李宗仁上台，人民解放运动日益高涨。民心背向也反映在中央研究院宁沪各所的搬迁与反搬迁斗争中，其结果是：南京、上海8个所坚持原地护所，迎接解放。

在这场斗争中，各所的斗争艺术和成就，表现了不同特色。

社会学所所长陶孟和，在在京人员谈话会上，义正辞严地首先提出，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数人的意见为依规。到12月9日，朱家骅主持临时院务会议时，陶孟和所长汇报说，社会学所以“全所人员多一票”的结果决定不迁。这就触犯了代院长朱家骅的尊严和特权，朱借口“出席人员中包括助理研究员不符合规定”，否定陶孟和所长的意见。陶孟和针锋相对，批评朱家骅推翻社会所多数人不同意搬迁的决定，是置社会所多数人的意志和权利于不顾。专横独裁的朱家骅，强令陶孟和所长同意迁桂林，陶孟和所长置之不理，既不组织社会学所迁桂林，也不作迁上海的准备。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和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地位，亲去上海劝说迁上海的南京各所不再搬，和上海各所坚持原地护所。陶孟和所长的劝说，赢得了中央研究院反搬迁的各所领导和科技人员的尊敬，在中国科技界树立了无私无畏，可钦可敬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

中央研究院地质所俞建章，虽然以代所长和国民党部区部书记的双重身份，服从了代院长兼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关于地质所迁广州并与两广地质调查所合并的决定，但遭到了此时在英国讲学的李四光所长的反对。秘密共产党员、民盟盟员许杰研究员、赵金科研究员，在研究员张文佑住处密拟了反搬迁誓约，有组织地抵制搬迁。誓约中坚定地说：“同人等为尊重学术工作之独立与自由，兼顾今后之困难，现已意见一致，决定留住南京或上海，以此相约，立誓遵守。如有违约背誓者，应与众共弃之，永远不许在地质界立足。”在誓约上签字的有许杰、赵金科、斯行健、孙殿卿、张文佑、刘之远、吴磊伯、马振图、谷德振、陈庆宣、徐煜坚等11人。签字后，由许杰、赵金科专函所长李四光。

1949年1月9日，李四光复信许杰、赵金科，钦佩他们愿留南京的行动，并提出公开他的私资，作为本所研究工作和私人困难救济用。20天后，李四光复信许杰、赵金科，反对朱家骅强令地质所迁广州及与两广地质调查所合并。与此同时，李四光给代所长俞建章发来专电，反对搬迁。他认为“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地质所同人避乱似无多大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六年后的1955年7月19日，朱家骅在台北召开的院士会议上，提及地质所搬迁一事时说：“地质所李四光所长电复所内，以身在国外，无法照料，一切听从朱院长处理，是以纵有少数人意志不定，从无反对搬迁者”。这是偏听偏信了代所长俞建章的报告，与历史事实不符。

位于南京珠江路700号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成为反搬迁的另一个重点单位。这个全国各地都有它隶属单位的地质调查所，历史较久，规模较大，人才集中。所内成员虽然地质学专长和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在维护所的整体利益、促进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长远发展等重大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抗战后期，国民党为加强其反动统治，指令各级政府机关及中央研究机构设立中统特务组织。为了应付这一严重

事态，李善邦、李春昱、高振西三位老国民党党员，不顾自身安危与毁誉，秘密商量后，竟自行填表加入中统，组成地调所中统三人小组，用以抑制外派特务人员来所破坏。可见，他们应付形势的智谋和用心之良苦。

1949 年，中共地下党员施雅风在地调所和教育部所属中国地理研究所，发动青年科技人员成立《科学时代》南京分社，地调所的顾知微、李毓英等参加，随之著名古生物学家尹赞勋、土壤学者马溶之入会。顾知微曾受施雅风委托，冒生命危险，秘密晒制数十张南京地区大比例尺地形图，准备送给解放军渡江后用。

反搬迁斗争中，更表现了全所的团结一致，既反对迁台湾，也反对迁广州，对迁台院士的邀请书都予以拒绝。

国民党政府命令下达后，所长李春昱召开全所人员大会讨论，前任所长、古生物研究室主任尹赞勋发言，公开反对搬迁，全所同人一致响应，并决定：

找 10 个放置标本的空木箱，装一些野外用的铁锤等工具，箱外标明“精密仪器，轻拿轻放”，托运到南京下关火车站，作出正在搬迁的姿态；

把图书馆书库和标本库的窗户用砖砌好，以防战事发生损坏图书、标本；组织“应变会”，设立保卫组，轮流在所内巡逻，以防宵小破坏和散兵游勇抢劫。

1949 年 6 月，该所第三任所长、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黄汲清研究员，赴美国参加国际地质会议经香港返回时，接到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电邀主持台湾大学地质系工作，黄汲清院士置之不理，毅然回到重庆北碚西南地质调查所。

在反搬迁的领导干部中，还要提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主任谢家荣。1948 年底，胡适奉国民党政府当局命令，召开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谢家荣以中央研究院院士身份与会。胡适动员谢家荣率矿产测勘处同人迁台湾。谢家荣根本不听，反组织测勘处员工坚守岗位，保护设备和资料，并存粮贮菜，打井储水，值班巡夜，做好应变准备，迎接南京解放。

1949 年 2 月，国民党政府当局幻想隔江而治，既想和谈，又不愿意接受和谈条件，国民党政府陷于四分五裂状态。由南京迁上海的三个所（物理所、天文所、气象所）和上海的六个所的各所领导人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既鉴于抗战西迁所受艰难困苦记忆犹新，又听到迁台后的同人生活十分困难，迁台之心更加动摇。而国民党军队所能控制的船只，忙于抢运黄金白银，无力运输决定迁台的四个所的人员和物资。

很快，4 月 23 日南京解放，5 月 27 日上海

李四光

陈　垣

吴有训

解放，再迁台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影响深远，院士百分之七十四留在大陆

1949年8月底，天文、气象、物理三个所由上海返回南京，结束了半年来流落上海的搬迁生活。

回顾历时一年左右的搬迁与反搬迁斗争的结果，国立中央研究院系统14个单位，成建制迁台的是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国立中央研究院12个自然科学研究所全部和社会学所都留在大陆。

就迁台人员来说，历史语言所80人，总办事处50人，一共130人，占当时中央研究院总人数506人的25.6%，其余370人占74.4%留在大陆工作。

当时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不仅衡量着当时的人心向背，更直接影响着大陆与台湾科学事业的发展。按照中央研究院历次公布资料，1948年11月25日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有81位院士，1949年底随国民党政府机关去台湾者9人，占院士总数的11.9%；

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

留在大陆迎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74%。其中有：

数理学组的姜立夫、许宝騄、华罗庚、苏步青、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茅以升、萨本栋；生物学组的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鸿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李宗恩、张孝骞、汤佩松、冯德培、蔡翘、俞大绂、邓叔群、罗宗洛、秉志；人文组的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征、陈垣、陈寅恪、顾颉刚、梁思永、郭沫若、梁思成、周鲠生、钱端升、马寅初、陶孟和、陈达、萧公权。

（作者解放初期任南京《新华日报》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舒元璋）

周鲠生

童第周

梁思成

我亲身经历的一段国共和谈

● 叶笃义

我是1944年9月在重庆由张君劢和章伯钧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加紧发动内战,破坏广大人民刚刚获得的和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中心内容是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让人民过上和平民主的新生活。民盟等"第三方面"力量,也为争取和平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国民党始终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一方面对解放区大举进攻,一方面对民主党派大加迫害。我从1946年初调到民盟中央机关工作后,便亲身经历了国共及第三方面人士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到南京继续进行的和平谈判。和谈失败了,内战全面展开,代表"第三方面"的民盟也遭到解散。我们这些原来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中间人士,终于觉醒过来,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现在回忆这段历史,犹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我担任民盟政协代表团秘书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五个方面的代表共38人。另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和青年党各自派出人员组成秘书处。我和张君劢的秘书蒋匀田作为民盟代表团的秘书,参与了协助民盟代表团与各方面联系等工作。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历时20天,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和宪法草案五项决议。张君劢是宪法草案小组的召集人,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根据政治协商会议拟定的宪法原则拟出具体宪法草案来,交由宪草审议委员会通过后提交行将召开的国民大会采纳。张君劢拟了宪草初稿后,叫我把它译成英文,并代他起草了一封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将宪草译稿附去征求杜鲁门的意见。我把这两份材料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请他们寄给美国国务院去了。

政协会议虽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根本不想执行,而且在会后立即进行一系列破坏活动。2月10日,重庆各民众团体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胜利闭幕大会,到会群众近万人。会议刚开始,大批国民党特务突然冲击会场,大打出手,打伤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民主人士及数十名群众。周恩来、陈启天、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为此事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2月下旬,又

发生国民党特务组织暴徒捣毁《新华日报》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使报社工作人员多人受伤事件。这一连串暴行说明，国民党反动派违背民意，恣意践踏和破坏政协会议成果，使和平民主建设事业遭到严重挫折。

在南京下关惨案中被毒打

从1946年5月开始，国民党军大力部署全国性内战，调动百万大军进攻各解放区。面对这种形势，上海广大群众行动起来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爱国运动。6月23日组成了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要求面见各方呼吁和平。代表团的成员包括篑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阎宝航、雷洁琼等知名人士，胡子婴为代表团秘书长。临行之时，上海市到车站广场送行人士浩浩荡荡有五万多人。

这时民盟总部已由重庆迁回南京。我代表民主同盟到南京下关车站去欢迎和平请愿团，范长江代表中共前往。我们准时到达车站，而“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乘坐的火车到镇江时就遭到一批伪装为“苏北难民”的人上车纠缠，使火车耽搁了大约两个小时才开车。我们在下关车站也发现了大批伪装的“难民”站在车站附近等候。当上海来的火车到达南京下关，和平代表们一下车，就被埋伏在旁的大批特务围困在车站附近一个房间里并遭到毒打。被围困人中包括我和《新民报》的浦熙修，围困毒打从晚七时一直延续到深夜十二时，暴徒们为所欲为后才开始离散。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我被打得昏倒在地不省人事，罗隆基趋车赶赴现场，把我送到中央医院抢救始得脱险。当时周恩来正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他闻讯后即和董必武、李维汉、滕代远、邓颖超、王炳南等赶赴医院慰问受伤人员。当周恩来握着我的手慰问时，我非常感动地说：“谢谢，看起来和平民主道路还是很艰难的。“周恩来说：“道路艰难，我们有信心争取到民主和平。”王炳南赠送了我衣物，因为我随身穿的衣服都在暴徒们殴打当中被打破了。在医院治疗时，《文汇报》记者前来慰问，并要求我写一点感言。我写了“临难毋苟免”几个字给他。

我被打以后，当时刚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也派人携带他70岁生日的蛋糕前来慰问。我同司徒雷登认识于北平燕京大学，我于1930年－1934年在该校读书，那时他是校长，我是学生。他有时参加学校同乡会的社交活动，说他是生在杭州的，可以算一个杭州人。还说，他“爱美国也爱中国，他生于中国也愿死在中国”等等，使我对他产生了崇拜和感激的心情。我大学毕业后，在天津和北平的校友联欢会上同他见过几次面，还同他谈到过抗战的前途问题。这次我被国民党特务殴打致伤后，他又派人来慰问，我出院后就到他大使官邸致谢。他当时对我说，马歇尔推荐他做驻华大使，是因为他在中国办教育多年，学生遍中国。他说：“各党派都有我的学生，因此我在中国的纠纷中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中立者。”他还希望我在工作中常常和他联系合作。他并鼓励张君劢通过民盟把国共以外所有第三方面人士(民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团结起来，“一方面可向国民党施加压力，一方面可以孤立共产党”。他的这番鼓动，对第三方面某些人士起了程度不同的拉拢作用。

“第三方面”斡旋国共和谈遭到失败

1946年9、10、11月是第三方面参与国共和谈的高潮时期。从6、7月起，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发动大规模内战，政治协商及和谈活动均已停止。周恩来由南京移至上海居住。9月30日，周恩来分别致函蒋介石及美国特使马歇尔，说明国民党军队如不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就是和平的全面破裂。罗隆基和我见到司徒雷登时也请他转告马歇尔，说这绝不是中共

的空口恐吓，美方应认真对待。10 月 10 日我随民盟秘书长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我们 11 日夜车由上海返回南京，次日清晨返抵南京，刚下车就看到了当天报纸宣布蒋介石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梁漱溟惊叹地对包围他的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成为当时报纸上遍传的趣语。当天南京《中央日报》发出号外，宣布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

10 月 15 日，国民党和谈代表雷震、吴铁城和邵力子到达上海，敦促第三方面出面劝周恩来到南京继续和谈。当我们提到梁漱溟的"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的趣语时，青年党的李璜大发"死马当活马医"的议论。

经过第三方面人士的敦劝，10 月 21 日周恩来在第三方面人士的陪同下由上海乘飞机到南京。陈家康（中共上海发言人）发表继续和谈声明，其中说："国共之外，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精神为民主和平呼号奔走悲天悯人，可感可泣……中国共产党救濒于分裂之中国，如救垂危之慈母，如有一线生机，无不竭力以赴……中共愿追随各民主党派之代表及全国人民之后致努力争取。"中共声明中引用了"死马当活马医"的说法，给梁漱溟和李璜很大的鼓励。

蒋介石在 10 月 16 日发表声明提出和谈的八项条件。八项条件中，前七项提出中共无法接受的军事及制宪要求外，最后一项提出在中共接受那七项条件下，他就下令停战，并要求"在下令之同时，共产党应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其代表名单。"中共紧跟着在 10 月 17 日发表声明，提出针锋相对的两项反建议：一、军事恢复 1 月 13 日停战协定生效时的双方驻军地位。二、承认实行政协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

蒋介石的八项条件除公开发表外，还通过马歇尔递交给周恩来。中共第二天即发表公开声明，提出上述两项反建议。司徒雷登对我说，蒋介石的八项条件是马歇尔正式转交给中共的，而中共只发表了一个提出两项条件的声明作为答复，蒋介石认为中共这样作法不礼貌。司徒雷登也认为这是中共对美方作为调处人

1946 年 11 月 14 日周恩来宴请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左起：周恩来、邓颖超、罗隆基、李维汉、张申府、章伯钧、沈钧儒、董必武、黄炎培、张君劢、王炳南

的不信任，希望民盟将这个意见转达中共，由中共写一个正式的书面答复交美方转给蒋介石。我把这个意见转给周恩来。周即约请民盟转告司徒雷登，订于11月7日晚在赴苏联大使馆参加庆祝苏联国庆宴会后同到司徒雷登寓所商谈。当晚参加者美方为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司徒雷登私人"顾问")，中共为周恩来及王炳南，民盟为张君劢、罗隆基和我。当晚我们谈话完全使用中文。周恩来在反复详述了中共拒绝蒋介石的八项主张及中共提出的两点建议的理由之后，司徒雷登说希望周恩来写一封信给马歇尔，阐述中共的立场，然后由马歇尔把这封信转给蒋介石。周恩来在慎重考虑了美方的请求及维护中共的立场，于11月8日写了这样一个备忘录给马歇尔，全文是：

"马歇尔将军阁下：

我于10月9日致函阁下，并请阁下转达蒋主席的备忘录，迄未得复。

对于蒋主席10月16日的声明，我已将我方态度及意见于10月17日在上海面告政府代表吴铁城、邵力子及雷震先生。18日向第三方面亦做同样声明。同日又奉到阁下转来之蒋主席10月17日致阁下的备忘录。我于来南京后，当分别将我方态度及意见面告阁下及司徒博士，想邀洞鉴。

抵京后一切商谈均经第三方面人士。现经他们之斡旋，三人会议、政协综合小组、及宪草审议委员会或有开会的可能，我们亦为此努力。

特此函告，顺致敬意。

周恩来谨启

1946年11月8日"

周恩来10月9日致马歇尔备忘录中，详细陈述中共对实施政协的全面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无限期地停止进攻张家口，并将进攻部队撤至原防，才足以表示政府愿意重开谈判，避免破裂，否则一切严重后果应由政府方面负其全责。"

蒋介石既然不顾一切，于10月11日攻下张家口，则中共当然对蒋介石10月17日致马歇尔的备忘录拒绝直接答复。鉴于司徒雷登的请求，周恩来终于写了上述致马歇尔的备忘录。这充分体现了中共既坚持原则立场，在做法上又具有灵活性。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第三方面如何斡旋国共和谈。一方面是八条，另一方面是两条。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牌都摊出来了。如何能把这两方面的条件掺合起来，拿出一套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达成和平合作的结局，这是对第三方面智慧的考验。第三方面的代表们到达南京后，每天在交通银行(政协社会贤达代表钱新之管理的银行)一个会议室里碰头座谈。同时第三方面的代表又互相推定分成几批，每日分头去向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以及美国的马歇尔、司徒雷登方面，名为交换意见，实际上是去摸摸底子。我是跟张君劢、罗隆基去向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接头的人。这样跑了五六天，并没有跑出什么头绪来。仿佛不摸底倒好，愈摸愈认识到这八条和两条中间的距离愈大。

这次第三方面到南京进行和谈，由于民盟同中共过去一年来合作的关系，各方面希望民盟多负些责任，事实上民盟成了重心。梁漱溟当时是民盟的秘书长，因此在这次奔走和平中他负较多的责任。到了10月25、26日的时候，第三方面在交通银行碰头已经一个星期了，一切仍毫无头绪。蒋介石的军队在关内外继续进攻，在关外夺取长春后又攻占安东，在关内集中大军进攻烟台等城市。这就更加激怒了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他们大有拂袖而去的决心。民盟梁漱溟、黄炎培对中共代表团极力劝留，并表示民盟今后将加强同共产党合作，第三方面今后有任何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必事前同共产党协商并征求同意。这总算是民盟向共产党方面一种诚意的表示和道义上的谅解。

在这种形势下，梁漱溟急于求得一折衷方案以争取问题早日得到解决。国民党提出八条，共产党提出两条，内容相距那么远，任何一方都坚决不肯让步。梁漱溟说："第三方面只有把两方的意见都不算，而拿出自己的折衷方案来。到了现在我们只有用第三方面的力量来压服不肯接受折衷方案的任何一方。我们第三方面的作用就在这里。要不然，我们就只好撒手不干。"他说话的时候，动了感情，并且以掌拍

桌，态度十分坚决。

梁漱溟的方案共三条。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关于军事，规定"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第二条关于地方政权，规定"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之国民政府委员会根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这跟中共提出的第一条"军事要恢复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时的双方驻军地位"距离太远了。因为1月13日到10月底这段时期，蒋介石违反停战协定在关内关外进攻占领的地区实在太多了。因此蒋介石的八条就提出"就地停战"的条件。除此而外，第三方面还推黄炎培、莫德惠二人帮助梁漱溟完成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详细规定。经过他们三人的商定，第一条就规定共产党在东北的驻军地点为齐齐哈尔、北安和佳木斯三地，第二条又规定蒋介石政府得派县长同警察接收共产党所在的铁路沿线的各县地方行政工作。这就是梁漱溟的折衷方案的全部内容。

根据民盟和中共已经达成的默契，双方有关 重要主张和行动应事先相互关照，但这一点民盟并未做到。民盟代表第三方面提出方案后，在上面签名的人是：莫德惠、梁漱溟、黄炎培、陈启天、张君劢、余家菊、缪嘉铭、罗隆基、李璜、章伯钧和左舜生。而且事先并未和中共通气、就把这个方案分别由参加签名的这几位分头送至国民党、中共和马歇尔。这个文件先送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后，马上遭到周恩来的严厉斥责，而且责问为什么不事先关照一下？梁漱溟想收回，但方案已经送到国民党孙科 那里去了。幸而在孙科看后，还未送给蒋介石之前，黄炎培、李璜、莫德惠和罗隆基立即赶到孙科寓所，以文件还漏写一条急需补写为名将文收回。罗隆基又赶到马歇尔寓所，这时候马歇尔因事外出尚未回来。罗隆基当即从马歇尔秘书那里索回尚未开封的原件回到梅园新村周恩来处。

第三方面的调解终于失败了。据梁漱溟事后对我说，他的这个方案能够收回去，青年党的李璜立了一功。本来已经第三方面代表签过名的文件；送出去了再收回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璜对梁漱溟说，他负责说服青年党不反对这件事，这才使文件得以顺利收回。对一个已经依附国民党的青年党人来说，不能不说是做了一件好事。

梁漱溟经过这个挫折，深深感到内疚，认为自己不适宜担任民盟秘书长了，于是退出和谈，离开南京，最后终于脱离了民盟。

民盟被迫解散的前前后后

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决心打内战，和谈失败，中共代表团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延安，民盟便成为国民党的主要迫害对象。1947年7月1日蒋介石发布《动员戡乱令》，国统区的宣传机构就动员起来向民盟进攻，漫骂民盟为"奸盟"，盟员为"奸匪"，"为中共操纵指使之工具"。孙科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民盟进行恫吓，说"反内战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按照处置共产党办法处置。"先后在几个月内封闭了民盟在重庆、西安、昆明等地的机关报纸和刊物。

1947年10月初，国民党捏造了一个"贩卖毒品"的罪名把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逮捕起来。民盟总部一直通过合法手续向蒋介石请求释放，但蒋介石置之不理。到10月7日蒋介石突然以"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勾结匪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等等莫须有的罪名把杜斌丞公开枪决。一年以前蒋介石杀害民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采取的是暗杀手段，事后还假装一下追查惩凶。这次对杜斌丞则以"通共匪"的罪名公开杀害。这件事给 民盟很大的震动。民盟当时仍然以合法手续向蒋介石提出书面的严重抗议，同时张澜以主席的名义在报上登了一个公开声明，"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蒋介石均置之不理。民盟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搞 到这样僵化的地步了，这时仍然沉溺于对美国的幻想。于是，派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和我到南京找司徒雷登，请他出面调解民盟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我记得司徒雷登对这次谈话看得非常郑重。平时他同民盟不会讲英语的领导人谈话的时候，他多半用中国话交谈。这次他完全说的是英语，旁边还坐一个名字叫拉登(Ludden)的美国参赞做记录。司徒雷登当时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辞，给民盟

碰了一个软钉子。

10月中旬以后，山雨欲来风满楼，国民党动员各地的御用团体开始在报上叫嚣要求解散民盟。陶希圣甚至辱骂民盟是“张邦昌，石敬塘，郑孝胥，赵欣伯”。10月20日，民盟南京梅园新村总部突然被包围，民盟人员的行动被跟踪监视，对罗隆基的监视尤其厉害。当时民盟领导人都住在上海，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代表民盟同各方交涉。他一连从南京打来几次电话到上海向张澜告急，请示办法。10月26日张澜在寓所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参加者为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我。在开会过程中，黄炎培写了一个小纸条给张澜，纸条上写的是“自动解散”四个字。当时大家不同意这个意见。最后决定推黄炎培和我即日由上海到南京，会同罗隆基找国民党和司徒雷登办交涉。

我当日夜车去南京。黄炎培迟了一天，27日夜车动身去南京。我28日到南京下关车站去接他。当天报上用特大标题登出“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消息。黄到达南京后立即同我到邵力子家中。邵力子平日待人接物一向是和颜悦色的，这次却表现得非常严肃。他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事情发展到现在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民盟不成仁便成义”(这是他当时具体的说法，他并没有加以引申解释。我们当时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非常严厉的：民盟或者牺牲，或者投降)。邵力子还责怪民盟对杜斌丞被杀害这件事，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又在报上发表声明“要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从邵力子的口气看来，国民党方面这个问题已没有交涉和谈判的余地了。

在罗隆基的提议下，罗、黄和我三人面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他从中调解民盟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司徒雷登的态度同国民党是一致的，他一方面推说这是中国的内政，他无法干涉，但同时却又直截了当地提出“民盟光荣解散”的建议。我们三人每天上午先碰头，下午去找国民党办交涉。

10月29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所谓《民盟参加叛乱的经过》的报道。国统区各地军警机关陆续公布取缔民盟活动的办法，限令民盟成员登记自首。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张群对我们说：同民盟办交涉的责任蒋介石已委托给陈立夫了。陈立夫表示只愿同黄炎培一人接头，而不接见罗隆基和我。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只好俯仰由人，没有一点独立自由的余地了。

黄炎培同陈立夫单独办交涉，每天上午我们三个人在国民参政会碰头，由黄炎培介绍交涉情况。交涉结果最后搞成一个书面文件，那就是1947年11月6日民盟在蒋管区各报上发表的解散公告。据黄炎培说，陈立夫向他表示，文件上的文字一个字也不许更动，发表的时候如有只字变动即全部作废。当时国民党对罗隆基的监视比其他人都更严。罗一出门，特务军警紧紧跟在后面盯梢。罗在讨论时希望在文件上提出免除对他的监视。黄炎培对这点未能办到，罗隆基对此一度非常愤怒，打长途电话给在上海的张澜表示反对黄炎培的做法。后来黄得到陈立夫的口头应许，答应罗隆基可以离开南京，到上海住进医院，费用由国民党包下来，可以免予监视。这样罗隆基才同意下来，我们三个人11月4日夜车由南京返回，5日早晨回到上海，我们立刻同到集益里张澜寓所开紧急会议。这时沈钧儒、史良已经等在那里。张云川恰巧在这个时候到达上海也参加了会议，陈新桂以张澜秘书的名义旁听。张澜的卧室在二楼，我们挤在那个小房间里开会。楼下客厅里挤满了军警和等候在那里准备发表新闻的各报社记者。集益里8号门前的小弄堂里挤满了军警特务的汽车。

民盟参加这次决定命运的会议的人是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张云川和我。首先由黄炎培报告交涉经过，随后宣读我们三个由南京带回的那份宣布解散的书面文件。会上沈钧儒、史良和张云川最初表示不同意，提出是不是还有讨论其它办法的余地。张澜最初也表示犹豫。最后经黄炎培陈说利害，罗隆基和我自然也加以附和。无论怎样说文件是由我们三个人共同负责的。当时集益里8号内外军警特务云集的气氛确实也证明了邵力

子"不成仁便成义"的说法。最后大家勉强同意下来。我含着眼泪下楼把这个痛心的文件交给等候在那里的大批记者。我当时的心情有如战败国的代表手捧着投降书递交给战胜国代表。第二天(1947年11月6日)全国见了报。

解散文件是张澜以主席的名义发表的。他感到非常沉痛,当晚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早他叫我根据他口述大意,替他拟了一个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的书面谈话。全文是这样的:"余迫不得已,忍痛于11月6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告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其目的。"我把这个谈话稿发至上海各个报社。张澜希望通过这个书面谈话,使全国盟员了解到他在头一天以民盟主席名义发布的解散公告在形势上是"迫不得已"的,在心情上是"忍痛"的。即使这样一个照顾到客观形势号召盟员"谨守法律范围"的书面谈话,除了当时苏联在上海所办的中文《时代日报》在11月7日全文发表以外,其余所有中文报纸都拒绝或不敢登载。张澜沉痛地对我说:"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照顾到全体盟员的安全。至于我的一切早已置之度外了。"

黄炎培11月15日在《国讯》(当时职教社的机关刊物)发表《我与民盟》的文章,概述民盟频年活动情况,终以被认为非法团体而遭解散。结语有这样一段文字:"一部大历史,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者不知凡几。民盟已矣,自我发之(任老是民盟创始人之一),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请大家公正检讨民盟从创始到结束,前前后后所有文件,曾有一字一句是以构成危害国家颠覆政府的罪行者否?"他为民盟做了有力的辩护。

(本文摘自作者《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该书即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摘编者:林耀)

民盟被国民党反动派宣布为"非法团体"后,民盟总部被迫解散。这是1947年11月民盟领导人在集益里张澜处拍摄的照片。右起:沈钧儒、陈叔通、罗隆基、陈新桂、张澜、叶笃义、张茂延

鲁迅逝世十周年祭在上海

● 袁鹰

我国近代伟大的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先生1936年10月19日病逝上海。十个月以后，“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热血沸腾的中华爱国儿女记住鲁迅先生“以牙还牙”、“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的遗训，发扬韧性战斗的精神，慷慨高歌走上民族解放战场。1937年11月，上海沦于日寇之手，安葬先生遗骨的万国公墓，从此在荒林枯草中度过八年冷清的岁月。在延安和大后方，甚至太平洋战争前的香港，每年10月都举行纪念活动，而在上海，除了“孤岛”时期的进步文艺刊物上发表纪念文章以外，文化界人士和读者只能将深沉的缅怀与崇敬埋藏在心底，人们分明地感到鲁迅的作品，鲁迅的精神仍然时时刻刻同爱国、正直、善良的人民在一起，鼓舞和激励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抗击那残暴邪恶势力。只有极少数有心人，曾经悄悄地通过敌军岗哨，沿虹桥路进入万国公墓，怀着一腔悲愤，在寂寞的墓碑前默哀凭吊。

漫长的夜气如磐的日子里，知心好友相互勉励，总爱抄几句鲁迅遗言：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长眠地下的伟人，仍在无声地教育着后代。人们默默地期待着：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公开地、自由地纪念鲁迅呢？

这样，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下一年，1946年10月，鲁迅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人们自然就渴望能有一次较大规模的公开纪念活动了。

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决定由全国文协总会等12个文艺团体联合发起，举行一次公开的隆重的纪念大会。那年夏秋两季里，尽管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紧张，国民党反动军队已经在中原、苏北和东北地区不断向解放区进攻，全面内战迫在眉睫，但是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尚未完全破裂，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长驻南京梅园新村，联合民主党派、“第三方面”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作最后的努力，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即使有一个短时期的和平局面也好。中国老百姓饱受八年战争之苦，渴望和平，渴望民主，渴望中国真正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五大强国之一”。蒋介石政府尽管内心念念不忘“剿共”，也不得不在南京、上海、北平、重庆、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做做“民主”的样子，装潢一点门面。这就使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活动得以如期顺利地举行。

纪念大会10月19日下午假座复兴中路原名辣斐大戏院（今名长城电影院）举行，会场并不大，大约也就是六七百座位吧，早早就坐满了。文化界以外，更多的是青年学生、教师、职工。这是鲁迅先生逝世十年来第一次正式地、隆重地举行纪念活动。年岁大一点的人，还记得十年前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的悼唁活动和起灵送去虹桥路万国公墓的长长队伍，也还记得队伍

周恩来出席上海各界纪念鲁迅逝世 10 周年大会

前面那幅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大旗。多数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并没有赶上那个悲壮的场面，这次能有机会参加纪念大会，是既感到幸运又感到兴奋的。

舞台后方悬挂了巨幅的鲁迅木刻像，最突出的是两道浓眉和炯炯有神的双眼。那是中华木刻协会的画家们主要由丁聪、沈同衡、麦杆等几位集体创作的。他们参考叶浅予前几年在香港进步文化界纪念鲁迅时画的一幅像，放大到一大幅白布上，日夜赶制，汗水和墨汁一起挥洒，在 19 日大会举行前完成，使每个到会的人，一进会场就迎来那道剑似的横眉，也会立即想起“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诗句。

可能出于保证纪念大会安全的考虑，请国民党内开明人士邵力子先生和德高望重的文化界前辈叶圣陶先生出面主持大会。几位作家、理论家按预定次序陆续上台发言，以自己的感受阐述鲁迅的伟大精神、崇高品德和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巨大功绩。他们讲得都比较平和、实在，没有激烈的言词。柳亚子、郭沫若、马叙伦、邓初民这几位那一时期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鼓动性演说的民主战士，那天并没有上台讲话。夏衍、冯乃超、于伶等地下党文艺战线负责人，虽然到场也只是以文艺界一员的身份出现。也许在他们看来，能够让纪念大会顺利开成，不给反动军警和特务分子找到借口从事破坏，就是胜利。像我这样天真幼稚的青年，虽然对几个演说感到不够劲，但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纪念会，也可以心满意足了。

突然，正当叶圣陶先生用他那苏州口音演说的时候，坐在台上的大会主持人邵力子先生站起身来，走向台口，伸手向剧场后边招呼。会场里的人顺着他的手回头望入场门，只见一位穿浅灰色西服的中年人正沿着场边过道快步走向台前。定睛一看，竟是当时正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这位意外的出席者，使会场顿时轰动起来，但是既不能鼓掌表示欢迎，更不能欢呼，只好屏住呼吸，看着他一步跨上舞台，同邵力子握握手，然后坐到舞台右侧一张椅子上。叶圣陶先生讲完，大会主席就宣布：

“现在请周恩来先生致词。”

周恩来迎着全场渴望的眼神走到舞台中央，浓眉下闪动炯炯的目光，平静地环顾全场，等掌声平息，他就开始讲话。他讲得并不长，一共不过十几分钟时间，字字句句都扣在人们心弦上。

他说：“鲁迅先生死了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中国是从内战进入抗战，现在又回到了内战。内战乃鲁迅先生所诅咒的，抗战才是鲁迅先生所希望、所称颂的。他希望的事在人民大众努力下实现了，而他诅咒的内战可仍还存在，这应

该是我们参加这会的每个人所难过的。人民希望民主、独立、团结、统一，而日本投降了一年多了，这一个愿望还没有达到。鲁迅先生逝世那年也在谈判，到今天足足谈了十年了，还不能够解决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的问题。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之像面前立下誓言：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

接着他就讲到鲁迅。他侧身指着台上那幅巨像，严肃地说：

"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之立场。在人民面前，鲁迅先生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千夫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

全场鸦雀无声，仔细地捕捉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周恩来神情沉着，态度安详。他好像不是来到敌人心脏城市一个毫无警戒的小电影院，而是在延安窑洞里跟同志们促膝谈心，或是在杨家岭大礼堂向干部们报告。他好像不介意肯定有反动特务便衣军警混迹在会场里，甚至腰里还别着手枪。讲着讲着，他挥动右臂，声调高昂：

"过去历史上有多少暴君、皇帝、独裁者，都一个个地倒下去了。但是历史上的多少奴隶，被压迫者、农民还是牢牢站住的，而且长大下去。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鲁迅和闻一多都是我们的榜样！"

跟随着讲话人有力的手势和铿锵的语调，会场上立刻爆发出有节奏的春雷般的掌声。真是如同春雷，一阵接一阵，完全是自发的来自肺腑深处的真挚感情。周恩来那时还没有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那是三年以后的事。他是以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一个鲁迅的崇拜者、一个共产党人身份来到上海公众面前的。人们用连续几分钟欲罢不能的掌声回报他的讲话，也并非

1946 年 10 月 20 日作者在鲁迅墓前

由于他是一位高级领导人，完全是由于他那颗对人民大众忠诚、坚贞的赤子之心。40 年代中，在国民党统治区，即使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读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知道他对鲁迅的高度评价，赞誉为"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人是并不多的。

这是周恩来解放前在上海唯一的一次公开向群众讲话，一个月以后，由于蒋介石军队悍然侵占华北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宣布召开伪国民大会，最后暴露了发动全面内战的狰狞面目，他就毅然离开南京飞返延安。后来我才听说，对这次纪念会，代表团不少同志都不赞成周恩来亲自参加，因为毫无警戒，太危险了，可以派一位同志代表中共代表团去表示纪念之忱。但是恩来同志以大智大勇说服了大家。他认为有机会同上海人民见面，公开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即使再大的危险，也是应该去的。他还认为，这样的

场合，肯定有上海地下党同志和进步人士在做工作，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果然，在他以后，还有几位人士讲话，会场一直保持安静而热烈的气氛，直到散会，人们还在兴奋地议论周恩来讲话的内容和风度。第二天上海进步报纸上，都详尽地报道纪念大会，也都突出叙述周恩来的讲话。有一家报纸还作了这样的标题：“周恩来像前起誓：俯首甘为孺子牛”。不用鲁迅诗句上联的“横眉冷对”字样而用下联的“俯首甘为”，很能表明编辑在国民党统治区处理这条消息时的缜密用心。

说到鲁迅这一联诗句，还有个小插曲。周恩来事先并没有准备好讲稿，引用时可能急切中记不真切，将“横眉冷对千夫指”误说成“横眉怒向千夫指”，也许是对鲁迅另一首诗中“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印象太深了。这两个词含意并无太大区别，但毕竟是一个小差错。两三天后，郭沫若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似为《“冷对”与“怒向”》，说周恩来讲话中这个小小的差错，在此时此地，倒是更加突出了鲁迅诗句的战斗精神，错得很有意思。（此处只是记的大意，手边无郭老原文，也没有去查阅50年前的报纸。如有谬误，望知情者匡正。）

第二天10月20日是星期日，沪西虹桥路上一清早就开始出现络绎不绝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万国公墓。他们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高校学生、职员和文化工作者。除了极少数以外，绝大部分都是闻讯自发而来的。上海的国民党军警当局，倒也没有什么阻栏，也未戒备森严，当然，便衣特务是少不了的。九时左右，墓地周围便站满了人。

墓后竖起昨天纪念大会台上的那幅巨像。墓碑前放着大大小小花篮和一束束鲜花。这时，一辆旧汽车开进公墓大门，停在墓地不远，从车里下来两三个人，抬了一棵小松树，还带着一把铁锹。来到墓后，挖开土，将小松树栽下，动作迅速利落，几分钟就栽好了。然后，同站在人群中的沈钧儒、郭沫若、许广平等几位先生握手招呼，说几句话，又匆匆登车而去。人们用耳语传开从知情人士处得到的信息：他们是思南路“周公馆”（中共代表驻上海办事处）的人员，那个戴礼帽的是华岗。他们栽下小松树，也栽下共产党人热爱鲁迅的心。

扫墓的仪式很简单。宣布仪式开始后，大家庄严地行三鞠躬礼，一位接着一位讲话。讲话的人比昨天纪念会多，也简短。沈钧儒、郭沫若、茅盾、冯雪峰、胡风、田汉、曹靖华，还有几位，记不清了。人们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却很少见到过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更未曾听到过他们讲话。茅盾、冯雪峰的浙江口音还好懂些，胡风的湖北口音，田汉的湖南口音和曹靖华的豫西口音就比较陌生了。不过大家还是静静地听着，从中更深切地接近鲁迅、认识鲁迅。许广平先生扶着海婴，默默地站在一旁流泪。整整十个年头了，她没有离开上海一步，却不能年年到墓地来祭扫，一度还曾身陷敌人宪兵队牢狱中。在场的人大都知道她这段坚贞的经历，因而都向她投去崇敬和赞佩的目光。许先生在墓地上没有发表讲话，但是人们似乎都听到她激动和欣慰的情怀。

（责任编辑：舒元璋）

剽窃行为必须受到谴责

我们收到千启明同志的来信，指出我刊1998年第10期《〈申报〉改革与史量才遇刺》，系剽窃孙却非同志的《〈申报〉与史量才被刺》（载《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收到信后，即进行调查了解。剽窃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行为，向原作者孙却非同志和本刊及本刊的广大读者深表歉意，并将稿酬全部退回，保证今后决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剽窃行为，是不劳而获，且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历来为人们深恶痛绝，为文人所不齿。今后若再发生此种问题，一定点名揭露，严肃处理，直至支持受害作者诉诸法律。

本刊编辑部

回忆罗贵波对我的关怀

● 刘恪山

罗贵波摄于 1979 年

临汾地区展览馆在山西省临汾市的城西南隅，馆中有一座唐代贞观年建造的铁佛寺，寺中有一个三十多米高的琉璃金顶宝塔，塔的第一层里有一个五米多高的如来佛祖的巨大铁头，面目慈祥而又威严，这里是临汾城里有名的景点，据说凡是来铁佛寺的人都要去摸一摸铁佛的鼻子，就会得到好运气、吉祥如意、四季平安。我曾在这里工作 16 年，也曾摸过佛祖头的鼻子尖，也想请佛祖赐给我好运气、减轻一些那顶沉重的"摘帽右派"的压力。

1979 年 3 月，严冬终于过去，一阵意外的春风竟然吹进铁佛寺里来了。三月的一天，临汾地委宣传部突然通知我："明天上午八时半，新来的罗贵波省长要来展览馆看看，指名要找你谈话，你准备一下。"这一意外的通知，使我惶悚不已。

自从 1958 年我被团中央错划为"右派"下放山西晋南工作已 20 年了，从来没有省长一级的大官和我谈过话。这位罗省长我从不相识，以前只知道他是长征老干部，驻越南大使，还当过外交部副部长。他为什么要来看我这个"老右"呢？第二天上午我准时在展览馆大门外恭候罗省长的到来。不一会开来四辆小吉普车，第二辆车里走下来一位戴眼镜的老干部，我想他就是罗贵波省长。地委领导把我介绍给他后，他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你就是刘恪山同志呀，你在临汾工作很有成绩，地委向我介绍了你的情况，你是个好画家。"他这几句略带有南方口音的话，有如一丝春风吹入我的心扉。我陪同他们走进宝塔下，向他们介绍了铁佛寺的历史和故事，还走进宝塔参观了大铁佛头和塔内记载康熙三十四年临汾大地震的碑记。随后罗省长到我的办公室要看看我的画，他仔细地看了我近年画的一些水彩写生画。当他看到我画的霍县明代建筑的鼓楼时，高兴地说："画得好，你把鼓楼上琉璃瓦画得闪闪发光，就像太阳照在上面似的，把中国古代建筑的美都表现出来了。"我又拿出那些年我在晋南各地收集的民间刺绣和我精心摹绘的一大册"晋南民间刺绣图案"请他看。他把我画的刺绣图案举起来迎着窗外的阳光细细地看了又看，不停地称赞。我又取出我收集的一幅明代大刺绣寿帐请他看，上面绣满了各种花卉、飞禽和人物等，绣工精细，色彩璀灿。罗省长和随行人员都看得惊讶不已，连连说太美了！太美了！我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怕红卫兵"破四旧"烧掉了，就冒险藏来藏去，临汾武斗时又藏在农民朋友家的天棚上，才把这幅珍贵的刺绣保存下来。罗省长说："你做了一件好事，保护了珍贵的文物。你画的这些民间刺绣图案很有价值，这是创造新的图案的依据，可以丰富和美化现代人民生活，它一定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喜爱的，同时这也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人民友谊的重要资料。"他的这番话给我很大的鼓励，也是我自 1962 年着手研究晋南民间刺绣以来，第一次遇到了知音。

罗省长平易近人，使我们之间的距离更亲近了，我又向他提出了一些临汾地区的名胜古迹急待抢救维护的建议。他都要随行人员一一记下。这是我第一次和罗贵波同志相识，他那和蔼可亲，尊重文化的风度，给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第二天早上，罗省长要我陪他去襄汾县“丁村文化遗址”看看。这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二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丁村人居住的地方，在“人类学”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在丁村文化遗址石碑前为大家拍了一张合影，又特地为罗省长拍了一张特写，他很喜欢这张照片，一直保留着。而后我们一行又步行到丁村参观明清两代建造的36座民居，这是相互联通而又各成体系的院落，各种雕刻十分精美。罗省长看得很仔细，高兴地说：“这些建筑上的石雕、木雕艺术品很好，几百年了，能保存到现在太珍贵了。”我马上指出房檐下老乡做饭的炉灶说：“可惜这些雕刻艺术品被烟薰黑了。”我们走过一个猪圈，是用石雕柱础砌成的，我指给罗省长看，他看到柱础上有九头雕刻精美的狮子，赞叹而又幽默地说：“这些猪真有福气，住在这么高级雕刻艺术的宫殿里，唉！太可惜了。”

于是我向罗贵波建议：“丁村的这些古代民居，艺术水平很高，土改时把房子分给农民了，作为日常生活用房，自然破坏严重，如果由政府出资在村外另盖新房，请农民搬出去住，再成立机构把这些古建筑保管起来，将是很好的旅游胜地。”他对我的建议表示赞同。

1983年后，在他的倡导下，将这里36座古代民居改为“丁村民俗博物馆”，现已成为临汾地区重要的一处人文景观，至今中外游人络绎不绝。

罗贵波省长一行结束了在临汾的视察工作要回太原了，地、县领导都来送行，要我为大家照像留念，照完后罗省长快步走到我面前说：“我马上要回太原了，请你尽快把这几天你和我谈的有关山西文物保护等问题写成文字材料，另外再写一份你个人的情况一并送给我，不要寄，要你亲自送到省委给我，再见！”罗省长走后，我也成了临汾城的新闻人物了。

一周后，我把材料写好，专程赴太原晋见罗省长，这也是我下放山西20年来，第一次迈进省政府的大门。罗省长亲切地接见我，接过了我写的材料。他说：“你在临汾和我谈的那些问题，对山西的文化建设和旅游事业的开展很有用处，我想调你来省里工作，先到省旅游局做宣传工作，山西的旅游事业刚起步，急需你这样的人才。”当时我感到省长如此器重我，很感激也很高兴。我说：“团中央要调我回北京原单位工作，可是我又舍不得山西，想在山西研究民间艺术，还没有下决心回北京。”

1979年春，团中央改正了我的“右派”冤案，又要调我回北京。11月，在团中央一再催促下，我终于告别临汾铁佛寺，走出娘子关，又回到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工作。此时百感交集，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诗中所写的：“种桃道士今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80年代后，罗贵波经常来北京开会，每次来北京总要给我来电话，有时我去看他，有时他来我家看我，尤其喜欢我的小孙子。他还要我推荐我了解的山西文化艺术界的人才名单，而后他都派人去和我推荐的人一一谈话，可见罗省长对人才的重视了。

1982年春，罗贵波省长又来北京开会，来到我家要我带他去看望中国书画大师董寿平老先生。董老是山西洪洞县人，又是山西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罗贵波对董老的书画艺术和品德十分敬重。这两位老先生一见如故，分外亲切。董老向罗贵波介绍了山西文化艺术的历史渊源，并提出保护的建议，还当场为罗老画了一张墨竹相赠，至今此画仍挂在罗贵波的家中。

翌年春，罗贵波又来北京开会，约我晚上陪他去看望董老，在回城的车上，我向罗老提出：“董寿平先生要我向您转达他的愿望，他想把他多年创作的书画精品二百幅，捐献给山西省，以表他对故乡热爱的一片拳拳赤子之心，可否在山西省博物馆安排一展室长期陈列。”罗贵波听到这一建议十分激动地说：“董老的这种高贵品德是应该表彰的，我回去和省委各领导同志研究一下，定下来后会派人去找你和董老商量的，谢谢他！”是年秋，罗省长派了太原市委宣传部长赵望进和晋祠文物管理处长郭旭来北京，并带来了“董寿平美术馆”的设计草图，听取董老的意见。1988年在太原风景名胜区晋祠内，一座新建的“董寿平美术馆”落成，这是

山西省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1990 年 10 月，"董寿平美术馆"在太原晋祠隆重开幕，长期陈列董寿平先生的书画精品，至今中外观众络绎不绝。1997 年 6 月乔石委员长专程去晋祠参观"董寿平美术馆"，对董老的艺术评价很高，欣然题词："寿平风骨，艺苑瑰宝"。

"董寿平美术馆"是在罗贵波省长倡导下建成的，仅此可以看到他对文化艺术事业的重视和支持了。

1984 年，在北京景山西街山西省驻京办事处，我和罗贵波谈到建议他写革命回忆录的事，我说："您老从 1927 年在江西赣南中央苏区参加革命以来，您经历了长征、抗日、建国，又任驻越南大使多年，现在又主政山西，您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应该把他写出来，以传后世。"

他说："我不愿写回忆录，我的一生都是党安排的，我个人没有什么好写的，只是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已。"我对罗贵波同志如此谦虚谨慎的作风，深为敬佩。

我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由千百万党员共同写出来的，您是革命老前辈，经历的事情多，您不写谁知道啊。"他终于同意我的看法。

1989 年，罗贵波同志离休了，一家从太原搬回北京，定居在万寿路一号公寓里，我经常去看望他，他也来白家庄北里我的新居看我的画。他以惊人的毅力开始撰写革命回忆录的工作，他已八十多岁了，视力日益减弱，写小字看不见，他就写成大字，

罗贵波 85 寿辰时，刘恪山与董庆华前往祝贺

以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停地写。直到 1995 年患重病住进北京医院后，还坐在病床上坚持写下去。

他以极大的毅力写出了近五十万字的两本书稿，一是《革命回忆录》二十多万字；一是《出使越南八年》二十多万字。

1995 年春，我得知罗贵波同志患重病住进北京医院，立即去医院看望他，他还能和我谈笑风生，最关心的是他写的书稿出版的事，我劝他安心养病为主，不要着急出书的事。而后我多次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但他的病况日益严重了。

初冬，我再去看他，他已十分虚弱，坐不起来，他还挥动着手臂和我交谈，他的声音很微弱，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他拍了几张照片，岂知这竟是我为他老人家最后的拍照。

11 月 3 日早晨，突然接到他女儿罗菊香的电话："刘叔叔，我爸已于昨天晚上九时许去世了……"这一噩耗传来使我和我的全家悲痛不已。

11 月 4 日上午我把挽联送到万寿路一号公寓罗家，客厅里已布置好罗贵波同志的灵堂，他老和蔼可亲的遗像已挂在墙上，我含着热泪鞠躬致悼……罗贵波夫人李涵珍老同志要他们把我的挽联挂在遗像两边。这也表达了我对罗贵波同志的感激和怀念的心声。

从我多年的感受中，罗贵波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充满了亲切、诚恳、信任和关怀的态度；对待文化事业充满了热忱、支持、爱护的态度，也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吴有训博士为国“打工”

● 聂 冷

70 年前，太平洋彼岸，世界知名物理学家吴有训，脚步沉毅地踏上归国的旅程。他抛却鲜花美酒，选择荆棘苦胆；放弃坦途捷径，选择崎岖跋涉。他开创了中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培养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操持了中国数理化工程和天文方面科研领域的全部最初规划，原子弹、核动力、半导体、激光器、电子计算机……几乎中国的每一项高科技成果都与他血脉相连。“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两弹”元勋彭桓武、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等都是他的学生。他的一生，是一首科教强国的壮丽史诗。这里只介绍他的两段经历。

为增强抗日国力搞科研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标志着被膨胀的野心鼓动起来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式点起了旨在奴役中国和整个东亚地区人民的第一把战火。战争的警号在中国人民的耳畔呜呜响起。它打乱了所有中国人的工作进程和生活节奏。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重新思索，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这年 9 月 16 日，事变的前两天，清华大学理学院长、物理学系主任吴有训刚向清华大学校务代理人叶企孙交还理学院和物理系的管理职责，准备重新全力投入学术研究。18 日夜，他独自在家研读文献至次日凌晨。忽然电话铃响起，他拿起听筒，原来是协和医院护士向他报喜。他的妻子王立芬女士已在该医院顺利产下一位“胖公子”。但当时夜深无处找车，他只能独自高兴得在屋子里急急踱步。他喜滋滋和衣坐待到天明，当他习惯性地打开无线收音机时，恰巧电台正在广播日军昨夜进攻北大营的消息。这犹如一声晴空霹雳，震得他“蹬”地一下从坐椅上跳了起来。

吴有训赶到医院，女护士们一齐笑嘻嘻地向他要喜糖吃，他却愁容满面地站在妻子的病床前，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弄得妻子惊愕万分，说：“怎么，给你生了位公子还不高兴？”

“日本侵夺我东三省，昨晚 10 点 20 分钟进攻我北大营，如今事态恐正在扩大之中。此时此刻，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都在滴血，你看，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吴有训沉痛地说，在妻子枕畔坐下。接着又转脸对女护士说：“护士小姐，真对不起了！今天的喜糖，就让我们留到哪一天打跑了倭寇再来吃吧！”

几名女护士听说缘由后，也不禁绷紧了

脸。

吴有训看着小家伙那张红嫩嫩、毛绒绒的小胖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小家伙恰生于倭寇侵扰之际，应当让他永远记住这一天，时刻警惕外敌来犯。就把他的名字叫做惕生吧！"

回到学校，整个清华园已是一片哗然。师生个个义愤填膺。结果这一天，几乎每一堂课的教师都把抗日的呼号当作了讲课的开场白，激愤的情绪充满了课堂。9月21日，教职员公会和学生会分头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应付时局对策。全体教职员工紧急大会在清华园后工字厅举行，一致通过推荐吴有训等17人为公会常务委员，组成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负责研究办法、领导民众，以作政府之声援；并决定由每位教职员捐助薪金百分之一，由会计科代扣，作为该委员会的办公经费。此后，吴有训还在清华大礼堂作了多场国防科学讲座，为宣传抗日主张和国防科学知识而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为应抗日救国之急需，他还和叶企孙商定，物理系的课程应向应用方向靠近，要留意指导学生多选修应用物理课，出国留学生的研修课程也要和抗战的需要联系起来考虑。此外，吴有训本人也从这时开始，基本上放弃了纯粹物理学研究，转而致力于探索开辟物理学应用的新路子，准备为增强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拿出一些实际的成果来。

1933年9月，按规定轮到吴有训出国讲学，且时间有一年之久，可携带家属同行。然而吴有训毅然放弃了作为学者携妻儿同行的打算，独自前往美国去打工。因为他要借此次美国之行，去学习抗日所需要的电子管生产技术。他和叶企孙都希望能在清华建立一个电子产品研制基地，生产抗日战争中亟需的无线电通讯和武器遥控等设备。而生产这些设备的关键就是电子管的制造。这就是他向叶企孙提出，并经叶企孙肯定的出国研究项目。

出国讲学，他熟门熟路，可以轻松地得到丰厚的待遇，而要实施这项计划并非易事，他必须去和难以对付的美国的实业界打交道。而当时他对美国实业界的情况并不了解。

1944年吴有训一家在南京寓所

9月中旬，吴有训由上海乘胡佛总统号轮船赴美，先到芝加哥探望他的导师康普顿。五年不见了，康普顿对吴有训的到来非常高兴，并满腔热情地表示非常希望吴有训来和他合作，从事科学研究，或者他自己另选课题研究也行。当吴有训告诉他准备暂时放弃纯学术研究，要学造电子管时，他顿时惊得两眼发直，老半天才回过神来，摇着头说："NO，NO，吴有训，你这是糊涂想法。制造电子管不需要你这样高深的学问，你这是浪费学识，这将使科学感到遗憾。"

"可是，我的祖国现在亟需要电子管，而暂时还不需要宇宙线。"吴有训却顽强地坚持说。

"那你们的国家就应该派技术工人来学习，而不是派你！"康普顿先生反驳说。

"NO，康普顿先生，请原谅，我还得坦率地告诉您，我们不可能通过政府外交或正式贸易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将会涉及到你们美国的专利转让以及出口许可证等许多麻烦的法律问题。而且，我们也买不起美国厂家的全套图

纸和技术资料。我们只是想通过考察，基本了解工艺流程和某些重要的技术参数，然后我们再通过自己的研究，另行设计制造。而这，自然是一般技术工人所无法作到的。”吴有训很坦白地说。

“哈哈，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但是按照美国人的观念，你这就是盗窃。不光是盗窃他们的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盗窃了他们的市场。如果你们能生产电子管，就能生产出电子产品，中国就将减少对美国电子产品的进口，这对美国企业是不利的。所以，你这趟旅行将不会受到美国企业界的欢迎，他们对这一手都防得很严。试试看吧，你将会发现，在美国，没有哪个实业家的门会比我康普顿家的门更好进。”康普顿先生风趣地说。

但是，吴有训仍然不灰心，他在康普顿的毕业同学通讯录里终于找到了一位在波士顿某电子管行业工作的同学名字，立即给这位同学接通了电话。可是，正如康普顿所说，这位同学认为，他顶多只能安排他到这家公司下属的一家真空玻璃管制造厂去打工，学习吹制真空玻璃管，至于其他的地方，他无权作出安排。

吹制真空玻璃管是制造电子管的头道工序，当然也值得一学。于是，他连忙赶往波士顿，干脆换上工装到玻璃管厂来打工。刚进厂时，由于管子吹制得不规则，他的美国师傅还想用钳子把敲他的脑袋。好在他及时瞪圆眼睛用美国俚语咋唬了一声：“你敢动！老子是你们公司老板的客人！”那师傅才忽然记起前几天，确有一位公司白领亲自把这个黄种人送进车间，两人还谈笑风生很亲热的样子，于是信以为真，以后才教得耐心了。

吴有训一直在这里打工四个月。他一边上班干活，一边注意搜集有关资料。他的吹玻璃技术已达到纯熟的水平，能够拉得出很规则的玻璃毛细管，看看再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收获，这才离开波士顿，到其他一些美国同学所在的大学实验室去参观访问，并代为清华大学订购真空玻璃管生产设备，准备回国继续摸索电子管技术。当劳伦斯（E · O · Lowrence）、朴尔（M · L · Pool）、努特森（W · Rutson）等已在科研上显露头角的美国同学听说吴有训在玻璃管厂整整打工四个月时，无不为他的忠诚爱国精神所深深感动。

1934 年 7 月，由于夫人生病，吴有训提前两个月结束了在美国的研修，回到上海。他为学校购买的真空管生产设备已被先期运回了清华。后来，由于他们试图开创中国电子工业科研和生产的计划未能得到国民党政府和中国金融、实业界的重视和支持，这套设备便成了清华无线电研究所的基本科研装备，以及物理系实验技术课的教学设备。中国的电子工业成了一场在国民党时代无法实现的梦。

自从“九 · 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终于看出了国民党政府的懦弱无能，他们迅即把眼光投向了全部中国领土。1937 年 7 月 7 日夜，又进一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随即，日军向北平展开全线进攻，并出动飞机轰炸清华附近的西苑兵营。

而恰于这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一批蒋介石比较赏识的社会名流，正被蒋介石邀至庐山开谈话会。“七七”事变发生后，南北交通中断，梅贻琦无法返校，全部校务只有靠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理学院长吴有训、评议员叶企孙等共同主持。这时，清华大学教授治校的优越性便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没有校长的情况下，吴有训和清华的集体领导班子成员一起临危不惧，沉着应变，迅速分头负责，将全校师生员工疏散进城躲避，立即设法转移学校的重要文件和存款，使之免落敌手，各项紧急行动得以有条不紊地展开。在这兵荒马乱的阵势之下，竟然没有发生一起伤亡或人员失散事故。

7 月 8 日，吴有训安排刚刚分娩尚未足月的妻子带着 4 个孩子疏散到城内浦薛凤教授的家里暂避。而他本人却仍坚守学校岗位，组织当年暑假正在西苑接受军训的本校一二年级部分学生分班轮流护校。每至夜晚，他竟和外文系美籍教授陈福田一起坚持在校内巡查。陈福田仗着他是美国人，身背一支猎枪，一副随时准备上阵厮杀的猛张飞架式，样子煞是可爱。吴有训则布鞋长衫，手执一把蒲扇，飘飘摇

摇恰如诸葛先生之潇洒临阵。这一中一西、一文一“武”两位大教授，就这样一直坚持到8月份，梅贻琦等人已在南京和教育部商定，由清华、北大和南开合并，于长沙原清华大学预备的迁校基地内，设立长沙临时大学，电召师生南下，他们才最终决定解除警戒，放弃所剩的学校全部财产，迅速分头南下长沙。

接电当日，吴有训即潜入刚刚失陷的北平城内，向妻子儿女告别，表示要即刻只身南下，等南边工作安定下来，方能将全家转移出去。而此时，她的夫人刚生下幼女一个多月，四个孩子中最大的才将近六岁，顾了这个顾不上那个，好在浦薛凤太太帮忙，连吃饭都是两家合伙，否则，她就是长了三头六臂，也对付不了这个家。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丈夫又突然宣布要丢下她们独身远去，这怎能不叫她感到有如惊雷轰顶？她此时脸无血色，神情呆滞，脑子里一片空白，唯有两行泪水不知不觉地顺着脸颊流淌。

面对此情此景，吴有训又何尝不是肝肠寸断！然而，他心里明白，科教救国的事业正在召唤着他，他不可能陪着妻子儿女在日寇的铁蹄下苟且偷生。况且，像他这样的著名科学家，若不尽速逃出，一旦被敌人认出，除了到傀儡政府去当伪官，就惟有一死，情势所迫，唯有弃家报国，以图复兴。他给妻子讲有国才有家的道理。

王立芬女士毕竟是知识妇女，她明白大敌当前，丈夫是留不住的，不让他去战斗，他将会憋死；因为他太杰出了，所以世界上不会有他偷生的余地。作为一名妻子，难道不应该以有这样一位丈夫而感到自豪吗？于是，她真的变得坚强起来，泪眼婆娑地抱过襁褓中的婴儿，送到丈夫面前说：“走之前，给女儿起个名吧。要不，这一别多久还不知道，日后我们怎样称呼她？”

“唉——我们的孩子也真可怜，恰恰都生于患难之中。”吴有训从妻子手里接过孩子，轻轻地吻了吻她那红红的小脸蛋，沉吟了片刻说：“这样吧，我正要去长沙办学，湖南简称湘，历史上还有皇娥女英潇湘寻夫的故事；《红楼梦》里林黛玉也号称‘潇湘妃子’。我看我们的孩子也是苦命人，就叫她湘如好了。”（不过，湘如现在是国家民航局试航司司长，她的命运可不是历史上和小说中的‘潇湘妃子’所可比拟的。）

为强国不计职位高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即建立了主管全国科学事业的中国科学院。吴有训被任命为该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首任所长。副所长是他的学生钱三强。当时，科学界对这项任命普遍感到意外。因为大家都认为按照资格和学术地位，吴有训理应出任科学院副院长，当时已就任副院长的竺可桢先生就曾公开表示这一意见，所以许多人都估计吴有训不会去研究所就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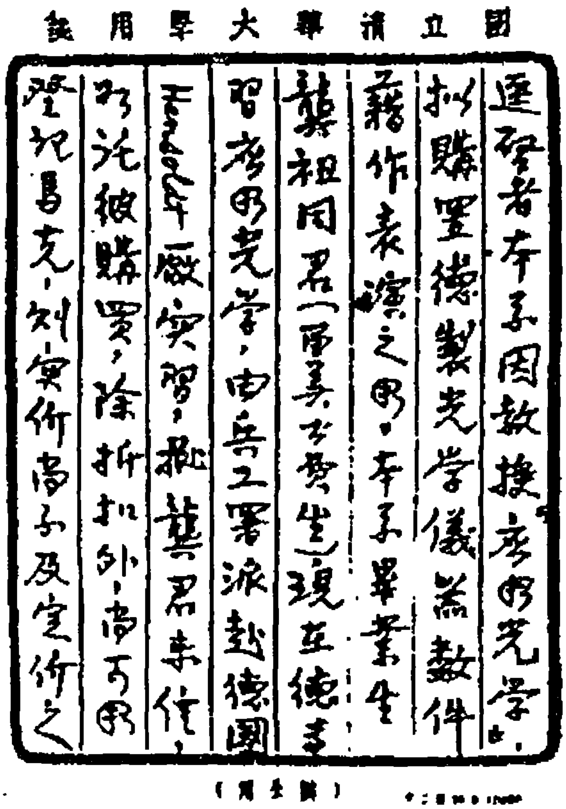
然而，出乎人们预料的是，吴有训经过一番考虑，欣然答应了出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并于1月13日同竺可桢一道去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明确表示了态度。因当时教育部也坚决要留吴有训当华东教育部部长兼交大校长，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并曾向郭沫若当面表示不肯将吴有训调出。但郭沫若出了个“鬼”点子，一面叫竺可桢等人加紧做吴有训的工作，一面对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说，我们双方都不要争，到哪边工作由吴有训先生根据自己的意旨来决定。故吴有训在做出决断之后，有必要去向两个部门的党内共同主管——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表态。

原来，他之所以答应来当这个所长，是因为这个研究所是新中国的第一个综合性核科学研究所，它所担负的任务连着他的一个做了多年的梦——这便是为研制中国的原子弹作准备。这意味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可以重新争取实现自己在国民党时代即已开篇而未能如愿实现的“原子能之梦”。他是一个思想敏锐的人，从政治态势上，他已经看出共产党比国民党的能力强大百倍，在共产党的指挥之下，把全国科研力量集中调配起来，他的“原子能之梦”是完全有指望变成现实的。如此诱人

的科学务实前景，怎能不使他跃跃欲试？当看准某一职位确实有利于自己的理想目标实现时，哪怕这一职位显得比较低下，他还是决意屈就。

1950 年 9 月 12 日，吴有训处理了到任后的第一项重大事件。这一天，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在遵从吴有训的召唤，自美归国途经日本横滨时，被驻日美军扣押，而大体与此同时，正欲归国的钱学森亦在美国被拘禁。这是美国政府禁止中国学人返回祖国大陆的开端。因赵忠尧系原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解放后，原中研院物理所的原子能研究部分与原北平研究院的原子核研究所合并组成新中国科学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因而，可以认为赵忠尧现在已是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赵原于 1946 年受吴有训派遣出国研究时未带家属，其妻子当时还住在南京九华山原中研院和中央大学合建的原子能研究基地。赵忠尧暂不能回国上班，其家属即断绝了新的收入来源。作为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吴有训认为关心其家属生活乃自己应尽之责。因此，在 9 月 30 日，他和首都科学教育界 189 名学者教授联合签署对美国政府的抗议书之后，即与副所长钱三强联合致信郭沫若，说明赵忠尧是本所研究员，现被美军扣押期间，院方应给其家属发放生活补助费；并建议，对钱学森的家属也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郭沫若随即主持院务会议，经讨论决定，认定赵忠尧已是近代物理所研究员，从 9 月 1 日起，按照中国科学院一级研究员的现行工资标准，给其家属按月发放其工资总额 70% 的救济金；从 10 月份开始，新聘任钱学森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也以同一标准给其家属发放救济金。

这项决定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赵忠尧和钱学森实在是太宝贵了。赵忠尧是中国的第一位加速器专家，因上年钱三强试图去法国购买加速器材料未能如愿，现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实验核物理部分工作，就等着他回来唱戏。钱学森则是航空航天技术的国际翘楚，当时的中国空气动力学界找不到第二个能跟他比肩的人物。有了



吴有训手迹

他们二位，就中国的核实验研究和航空航天事业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况且，关怀赵、钱的家属，绝不仅仅是为了惠及他们两家人，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姿态，它表明新中国永远是海外学子们的坚强后盾。

办完这件声援和救济赵忠尧、钱学森的大事之后，吴有训于 10 月 17 日到当时位于北京城内东皇城根 42 号的近代物理所主持了该所的第一次所务会议。这时候，近代物理研究所的重要研究人员有从南京原中研院物理所过来的吴有训、赵忠尧(尚在回归途中)、李寿楠、程兆坚、殷鹏程等，从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所来的钱三强、何泽慧、杨光中等，从清华大学调来的彭桓武、金建中，从浙江大学调来的王淦昌、忻贤杰等，以及刚从国外回来的郭挺章、金星南、肖健、邓稼先、朱洪元、胡宁、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等大约三十多人。这就是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第一批开拓者和学术精英，其中除赵忠尧和金星南等少数几位之外，绝大部分

都是吴有训的学生。因此走进第一次所务会的会议室，大家就像是又回到了当年的清华和中大参加由吴有训先生主持的学生代表会，心里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温暖。

吴有训掩不住内心的激动讲话说："各位贤弟，今天，我们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原子能科学家，聚首一堂，来商议中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和现实规划，这无论是对于我们个人，还是对于中国的核科学事业，都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实足以令在座的每一位都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无尚的光荣！……最令人兴奋的是，恰在你们中间的大多数新博士学成归国之际，正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国家的科学发展打出了一片新天地。这似乎也可以说是天意吧，总之，它是中国原子能事业之大幸！虽然今天我们的人力物力离着制造一颗原子弹或建造一座实用型核反应堆，都还有一定差距，但既然我们今天已经开了头，明天就必定会有实际的收获。正如过去老一辈先生有意识地集中精力培养了在座各位和即将回国的海外各位，今天国家就可得着你们的回报一样。重要的是，我们要脚踏实地、坚定不移地一步一步走下去。这样，实验核物理学就一定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原子能应用的前景就一定会在中国，更确切地说，是在我们的手中实现。"

"哗……"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学生对于老师代表着祖国发出的向核科学进军的号令所作出的热烈响应，许多人的眼里都溢出了激动的泪花。

接着，经过讨论，这次会议确定将本所的研究工作分为理论核物理、实验核物理、宇宙线和放射化学研究四个主要领域。明确办所方向为"以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为中心，充分发展放射化学，为原子能应用准备条件"。由于当年建国伊始，中央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恢复生产和肃清美蒋残余军事势力上，暂时还不可能顾及核能的开发问题，因而，这项工作方针和具体规划，完全是由吴有训等科学家根据自己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和本所的人力物力条件主动制定出来的。应当说，吴有训领导制定的这项工作规划无疑是正确的、切实可行的。按照当时的客观条件，构想也是大胆的，充分体现了积极有为、跳起来摘挑子的主动进取精神。因为就当年的国情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预言共产党无法解决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正等着看中国大陆经济崩溃导致政权崩溃的把戏。在这一情况之下，近代物理所仍然坚持要为原子能应用准备条件，其魄力之大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之坚定即此可见。而就该所的客观条件而言，当年确定的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工作，理论核物理研究虽然人员水平较高，但人数尚嫌不足；实验核物理研究的唯一大型设备，就是赵忠尧根据过去的计划，从美国买回的一台正等安装的质子静电加速器；宇宙线研究方面则仅有王淦昌和赵忠尧二位先生私人各自拥有的一台云雾室，现在全部奉献出来；放射化学研究方面，则仅有杨承宗等人从国外带回的若干探测用品。整个状况确实可以称得上一穷二白。然而，他们也仍然坚持要上。吴有训还特别要求研究人员亲自动手，自己研制仪器设备，以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他坚定不移地相信着中国的原子能开发终有水到渠成之一日。

结果果然不出所望，赵忠尧很快回归，建造起了所里的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和高压倍加器，并立即着手准备进一步建造回旋加速器，实验核物理研究得以迅速开展。钱三强、何泽慧夫妇研制成功了核乳胶，在放射化学领域打开了通道；王淦昌也亲手制造了计数管，焊接了相应的自控电子线路，配上闪光光源，就在一间暗室里拍摄开了宇宙线径迹照片，从而发现了中性介子，并搞清了它的性质。彭桓武等理论物理学家，则大量研究了原子核的裂变性质、规律及数据。近代物理研究所很快成了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摇篮。中国的原子能宝贝正在这摇篮里成长。尽管她当时还很羸弱，但她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她注定了要发育成一名捍卫祖国安全和尊严、造成新的世界战略均势和造福人类的命运女神。

(责任编辑　庄　严)

人权卫士——中国将军

——贺明十年笔耕著华章

● 魏亦青

人说“十年磨一剑”。年届八十的贺明将军，在过去的不足十一年的时光里，不但“磨”就了一柄“剑”——捍卫人的权利、人的尊严的剑，这就是《一笔血淋淋的人权债》，揭露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残酷迫害我方战俘的罪行；还磨出了一面“镜”，名曰《忠诚》，反映了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给后人以鉴戒。前者，1990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后者，199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堪称姊妹篇。

少时投笔从戎的贺明，在60年的军旅生涯中，不乏色彩斑斓的传奇故事，待他秉笔为文时，一而再涉猎的却是朝鲜战俘这一题材，这同他50年代的一段经历和尔后的历史思考是分不开的。

遣返战俘
敌我斗争成焦点

1951年2月，贺明所在部队——志愿军六十三军赴朝鲜作战，7月10日就开始了停战谈判。但随即美军于8月28日对我展开了“夏季攻势作战”，9月29日又相继展开“秋季攻势”。看来确如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9月10日所说：“停战谈判唯一药剂，就是联合国军的胜利”，美国要争取这一“药剂”的“处方权”，通过战场施压，争取谈判桌上得到更多利益。

谈判桌上的更多利益是什么呢？世界舆论关注事态的发展，朝中将士关注事态的发展，此时随部队执行西线防御任务的贺明，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来自谈判桌上的消息：

自1951年12月11日开始关于停战谈判的第四项议程“战俘安排问题的谈判”后，1952年1月2日美方提出“一对一”交换、“自愿遣返”原则；我方强调美方是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签字国，该公约第118条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第7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

4月1日，美方提出一则实际仍然坚持“自愿遣返”的修正条文，并要于4月8日开始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所谓“甄别”。4月6日，我方为解除我被俘人员的疑虑，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合署发表了《四六声明》，声明中说：“朝中方面一向主张……在停止敌对行动后，交战双方应迅速遣返各自收容的全部战俘，这种合理主张，绝不因我方被俘人员在被扣留期间，或有一部分人在臂上刺字，或写下某种文件，或其它类似行为而有所改变。”还说：“我们深知这些行为绝非出自他们自愿，不应由他们负责。”

7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承认194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战俘待遇之公约》等四项公约。

11月17日，印度向联大政委会提出由四个中立国组成遣返委员会来处理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12月1日联合国政委会以53票对5票通过了提案，由五个中立国组成遣返委员会，印度为该委员会的公断人。

看来，谈判一拖再拖，战俘遣返问题难以取

年逾花甲的贺明将军

得一致意见，原来是美方居心叵测，千方百计扣留尽可能多的朝中战俘，既可给兵源匮乏的李承晚集团和蒋介石集团"输血"，又可藉以向全世界宣示："如此众多的战俘向往自由世界，拒绝回到共产主义(国家)去，是遏制共产主义的重大胜利"。我方对策则是：据理相争，寸步不让。遣俘问题，从而成为敌我斗争的焦点。

特殊任务
受命匆忙赴开城

时光进入1953年。朝鲜战争形势发生很大变化。

2月2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伤病战俘。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强调随着伤病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应当使之引导到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

4月双方交换伤病战俘，我志愿军战俘1030人被遣返。

5月13日，我军又发起夏季攻势，这是继去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中朝军队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战之后，又一次对美韩军队的更为凌厉的报复。

6月7日，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竞选中他曾许诺当选后将亲自前往朝鲜结束朝鲜战争)致信李承晚："我们已在一起遭受到成千上万的伤亡。我深深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停战是联合国和韩国所需要的"。果然次日(6月8日)战俘遣返问题便达成了协议。

6月15日，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师政委的贺明，奉命前往朝鲜三八线附近的开城，参加一个对我被俘人员进行消除回国疑虑的"解释代表团"，并担任第一大组组长。

这是一项特殊的任务，急于了解情况的贺明，在组团后的第二天即从介绍战俘情况的通报中得知：

我志愿军被俘人员共二万二千余人，大部为战斗失利，被包围，弹尽粮绝，突围被阻，待援无望的情况下被俘的，其中约有百分之十为丧失抵抗能力的重伤病员。

此时这些被俘人员的思想政治态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五三八团政委赵佐端(化名王芳)为首的六千三百多人，他们在战俘营中，经过一年多反迫害、反控制的残酷斗争，逐步形成了由地下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领导的、坚决要求回国的集体，被敌人称之为"赤色战俘营"；第二类是被一批坚决附敌分子用强迫刺字、写血书、订"连环保"和种种毒打、杀戳等恐怖手段控制的一万四千余人，他们疑虑重重，不是不想回国，而是不敢提出回国；第三类即以王顺清(潜伏在志愿军的原国民党中尉副连长)、李大安为首的一批投敌分子，他们虽是极少数，但在美军的集中营里占据发号施令的统治地位。

显然，解释团的工作对象，主要是上述三类人中的第二类了。

工作的难度，贺明和他的战友们都想到了，但难度之大及工作环境之复杂，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从6月17日(即解释代表团组团的第三天)深夜起，李承晚集团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朝鲜方面被俘人员达两万七千余人(其中有我志愿军被俘人员60名，后被非法运往台湾)，并公然声称要将他们编入韩国武装部队中去。

在关押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集中营里，更不断传来美军与蒋(介石)李(承晚)特务相勾结，严密控制、血腥屠杀我被俘人员的消息，令

人发指。

整理日记
写下笔笔人权债

部队返国后，向有写日记习惯的贺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曾将其中的部分日记加以整理，打印数份，冠以《所谓"自愿遣返"——一个解释代表的日记》之名，送给几位战友，目的仅是看看而已。因为，在战俘遣返谈判的前后，我方媒体对志愿军被俘人员同敌人斗争情况，虽曾报道不少，但朝鲜战争结束后，涉及志愿军战俘问题的宣传便变得讳莫如深了。

1983年，贺明从省军区政委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时有撰写回忆录的念头。特别是王维翰战友将当年贺明所赠部分日记打印稿交还他后，更使他萌动了重整日记的意念和决心。贺明以自己当年的生活日记为经，工作记录为纬，广泛选取报刊资料，秉笔疏理，熬过多少个寒来暑往，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他那近三十万字的日记体的《一笔血淋淋的人权债》书稿。

书稿，多方位记述了对非直接遣返战俘解释工作的全过程，确凿的史料表明：

是美国伙同李承晚集团和蒋介石集团、设置重重障碍，使我方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解释工作，被迫中断五次，解释时间只有规定的九分之一，听解释人数只有百分之十五。直至解释工作无理被中止，一万四千多名战俘被劫持而去。《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最后报告》承认"……仅有一小部分战俘行使了被遣返的权利。而且他们是偷偷摸摸或冒着生命危险这样做的"。

是美国军队与李（承晚）蒋（介石）特务相勾结，在战俘营实行"以俘制俘"政策，网罗我方投敌变节分子，以"维持内部秩序"为名组建警备队，在战俘营中建立起法西斯统治。即使在我被俘人员被移交中立国印度军队看管后，1953年10月初，战俘营中还连续传出了志愿军被俘人员张六泰、张子龙、寇兰清惨遭杀害的消息；12月12日晚，在东场里战俘营又有四名朝鲜人民军战俘被杀害……《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最后报告》中说："所有谋杀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那些被害者希望遣返或被怀疑抱有此种愿望……"

贺明以饱含血与泪的笔，记下了这一段不堪回首又决不能忘却的历史，他说他有责任记下美国和它的帮凶们欠下中朝人民的人权债，并借此告慰为争取人权、捍卫国格惨遭杀害身葬异土的我志愿军战士。

美军士兵毒打我被俘人员的情景（右上角为惨遭镇压的志愿军战俘）

感叹今昔
风尘仆仆万里行

早在 1988 年,《一笔血淋淋的人权债》将要脱稿时,贺明为慎重起见,特找到几位原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核对书稿中的某些时间、地点、人名。他万万没有想到,几乎是每访问一个人,不要几句话,便能勾起他们滔滔的倾诉。

他们倾诉的,都是归来后的种种不幸遭遇,包括在昌图政审后受到的过火的处理,离开军队后的被蔑视与歧视,特别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的诸多作践和迫害。

这些,对于贺明说来,都是未曾想到,也不敢想象的。在贺明看来,我志愿军被俘人员无论是交换伤病战俘时先期回国的 1030 人,还是停战协定签字后冒着生命危险,坚决要求回国的 5640 人,或是在中立国印度军队看管战俘营期间经过自己斗争或是听了我方解释才得以回国的 440 人,都是历尽苦难,参与了不同形式的斗争,最终表达了自己重返祖国强烈愿望的爱国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贺明是接触过的,甚至有的曾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53 年 9 月 6 日上午,应直接遣返的一批我方战俘抵达板门店。在欢迎口号的声浪中,被俘前任志愿军一八 0 师代政委、被俘后受过电刑,坐过水牢,始终坚定不移,威武不屈的吴成德,被人搀扶着从一辆救护车里走下来。他颧骨突出,两眼深陷,头发病态地严重脱落。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他脚上那双同衣服极不相称的千缝百补的绿胶鞋。吴成德所以如此珍惜它,不单是因为它伴他跋山涉水越过了三八线;也不单是因为它伴他在敌后昼伏夜出打过游击;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来自祖国,象征着祖国。他穿着它回归祖国,心情同当年苏武带着杖节回到长安一样豪迈。

另一个给贺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萧达山。1953 年 10 月 15 日 17 时 40 分,他走进听取解释的第三帐蓬时,自称聋子,却格外细心地听取解释;两眼呆滞,却暗含着疑虑和警惕的神色。他曾小声地用"我回去"三个字,试探拘留方、我方和中立国代表的反应。当他断定这天是真解释并非假解释时,便准确无误地大声说"我回国去",并毫不犹豫地从遣返门走了出去。次日早饭后,负责解释工作的同志们去接待站看望他,他的两只手被许多只手重叠握在一起,许久许久。此时大家才知道,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假装耳聋是已经很久的事了。

自从听了这些归来者的倾诉后,这些几十年前的感人镜头,再次浮现眼前时,贺明心里便涌动着一种难以言状的痛楚:他们回到祖国怀抱后,难道还应该再遭受苦难么?进而又想:遭受苦难的究竟是多数还是少数?它占了多少比例?

为了全面反映这段史实,真实地记录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情况,贺明拿定主意,列出了访问提纲,于 1990 年秋开始了他寻访当年归来战俘的万里之行。贺明风尘仆仆,驱车前往,先后到达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天津等省市,访问了二百余位归来者,尔后又从赵佐端、张城垣、张泽石等人那里得到不少归来者的通讯地址,对他们进行了函访。

求真求实
历史写就是与非

七年时光,贺明将军不顾年事已高,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驱车数万里,途中两次遇险,一次负伤,访问了 14 个省市的志愿军被俘人员,收集资料数百万字。

大量的资料和实物表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由于自己不可抗拒的种种原因陷于重围,突围不成而被俘的。其中不少被俘于未冻死、饿死、病死之前无力反抗的时候。在战俘集中营里,为了反对迫害和争取遣返祖国的权利,他们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殊死斗争。其艰苦、惨烈、惊险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以不同艺术形式讴歌过的"上饶集中营"中的斗争。然而,就是他们,就是被贺明在书中多次称之为"无愧也是最可爱的人"的他们,被交换遣返回国后,长期受到误解,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按照他们的说法,这始于返国后近一年的昌图

政审。

1953年11月中旬开始动员，大家对于总部的20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弄清问题，慎重处理，妥善安置"，是拥护的。被俘前任五四0团文化教员、被俘后因参与暴动曾被关进"战犯监狱"的赵国玺在日记中写道："难道组织不应该闹清楚每个同志被俘情况下的坚定程度和种种表现吗?"这确实代表了当时归来人员愿意接受组织审查的心态。动员阶段给大家印象最深刻、最强烈的，是为在战俘营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灵堂内，供奉着三百余名烈士的灵牌。其中包括1952年"四八甄别"前为坚持回国而壮烈牺牲的林学逋、阳文华、戚学堂等；四月下旬在釜山一、三收容所反甄别斗争中牺牲的杨延华、沈××等；10月1日济州岛第七分场升旗、护旗斗争壮烈牺牲的高勇、陈建中、邓鸣斌、岳温武、马如龙等。

追悼会上唱的歌曲，正是在战俘营中为追悼被敌人乱棍打死的王绍琪，由张泽石作词、骆星一作曲的《挽歌》。归来者们流着热泪，仿佛又回到了当时的斗争现场。

在与会的六千名归来者看来，追悼会的召开，既是对死者的追念，又是对生者的慰藉。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死去的烈士，也意味着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曾积极参与这些斗争的生还者。但，追悼会后，归来者明显意识到，组织追悼会的目的在于使他们同烈士的气节相对照，找差距。

在进入交代问题阶段时，则是"面对面"的自我检查、"背靠背"地互相揭发，以"典型"带路"深挖"、"深揭"，筛子筛似地"过关"。被俘与投降的概念混淆；不分情况把被俘视为失节；把在丧失抵抗能力情况下被抓去，说成是"屈服"、"失节"；把在被俘后，以灰色隐蔽方式和敌人斗争，说成是"委曲求全""投机妥协"。

尽管审查是极为严格的，到1954年2月下旬，已经有一大批同志确定了"结论"。"恢复军籍"的、"恢复党籍、团籍"的还是占了大多数，"开除军籍"特别是"双开除"(党籍、军籍)的只是个别人。但三月上旬突然来了"从严"精神，把"恢复军籍"的一部分改为只"承认被俘前军籍"；给党内受轻微处分者，大部分改为"开除党籍"，由80%保留党籍突然改为91.8%开除党籍；营以上者降级转业，连以下人员一律作复员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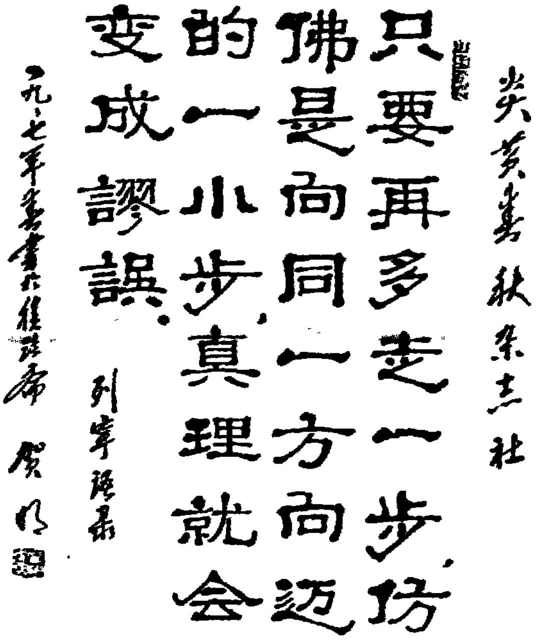
他们带着疑惑，带着委屈，离开了营地；他们带着惆怅，带着羞辱，回到了家门。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更不幸的日子还在等待着他们：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有的甚至被打成"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成为专政对象。

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消息像早来的燕子，也给被俘归来人员带来了春天的希望。他们为"政审"中不公正的处理鸣不平，为此后相继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假案错案而喊冤。他们的不断申诉，引起了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的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曾组织一个调查组，写出《调查报告》，并据此很快有了中央的"红头文件"(1980年9月27日，中发〔80〕74号文件)。文件说，"1954年，对他们在被俘期间的表现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情况基本查清，但在结论处理时，由于对他们的问题具体分析不够，看得过重，因而定性偏高，处理偏重。"文件指出，"对这批被俘归来人员的问题，认真进行复查，是非常必要的"，并就他们的党籍处理、军籍处理以及安置问题，提出了原则意见。

随着〔80〕74号文件的深入贯彻，凡被俘后立场坚定、保持了党员、团员气节的，一律恢复了党籍、团籍，凡始终保持革命军人气节的，一律恢复了军籍，压在归来人员身上28年之久的沉重包袱，终于放了下来。

无信患作
国格人格为至尊

在收集、分析、整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贺明着手撰写他的关于朝鲜战俘题材的第二部著作，即《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



历》。

他充满老战士的激情，以《冒死汇成的"红色战俘营》为题，写下了这些归来人员在敌人集中营中，所作的血与火、生与死的斗争。

他用饱蘸血泪的笔，以《爱、愁与茫然交织在一起》、《风雨中艰难跋涉》为题，记下了归来人员的坎坷境遇。

他又以欣慰的心情，以《春雷一声》与《是真金总会发光》两章的篇幅，写下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归来人员境遇的变化，歌颂了他们中的强者——在蒙受屈辱和歧视时不沉沦，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贺明的这本书终于脱稿了，连他的家人在内，只知道他严冬酷暑甚至有时忍着病痛笔耕的艰辛，却不知道他在写作过程中战胜思想矛盾所作的努力。

例如：书中记下的许多归来人员的种种不堪详述的坎坷遭遇，有的竟不幸为当时敌特败类所言中。现在写出来，被胁迫到台湾的一万多被俘人员和滞留在中立国的一千多被俘人员看到会怎么想？会不会为敌对势力提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炮弹？

又如：昌图政审的 20 字方针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越来越"左"，在归来人员的处理上，竟看不到《四六声明》和《金日成、彭德怀告被俘人员书》精神的体现，但两者，都是当年解释工作中的重要依据。对于这样的历史事实，是该坦诚直书呢，还是"将言而嗫嚅"？

再如：战俘政策，我方对敌人俘虏的政策，是明确的具体的，从井冈山唱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歌就有正确对待俘虏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向来对俘虏实施人道主义，为世界舆论所称赞。但我们的战士，甚至领导干部，对于 1949 年的《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则一无所知，他们不幸被俘后，不知如何据此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同敌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52 年 7 月 13 日，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向世界发表声明，承认《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编者注：中国人大常委会 1956 年 11 月 5 日批准该公约，对其中第 10 条、第 12 条、第 25 条保留意见），但在我们对待自己的归来人员时，是否是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条约精神呢？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难道 1952 年 7 月 13 日的声明，仅仅是为了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吗？

此外，贺明在写作中也曾想到能否出版的问题，但他思想斗争后的结论是：不论出版与否，一定要写。写下来，总比一命呜呼后随着肉体火化强。

贺明将军在谈到《忠诚》这部书的时候说：这里涉及的，不仅关系到七千余名归俘的政治地位问题，还关系到党和国家如何取信于民的问题。古训云："无信患作"。把人格、国格视为至尊的中国人，为了历史的未来，有勇气正视自己过去的历史，记取教训，把我们的国家决心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贺明将军的书不仅写出来了，而且正式出版了。我们感谢作者为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所作的努力；我们庆幸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有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他的书得以面世。

（责任编辑　文贤）

“作民主”与“民作主”源流考

● 丁守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民本思想，而无民主思想。民主这个词是外来的。中国古文献中有“民主”二字，却无“民权”一词。那里的所谓“民主”，并不是“民作主”，而是“作民主”。它与传统的民本思想相通，而与近代民主思想义殊。

据《尚书》载，周王朝建立后，为安抚殷商遗民，周公告之说，在夏代末期，夏王桀“慢神虐民”，“灭德作威”，引起天帝不满，乃更“求民主”，即另求民之主，看到商汤有德，便下召命给汤，诛灭夏桀，“代夏作民主”。但商代到了殷纣王，亦“暴虐无道”、“诛杀不已”、“淫乱不止”。天又赞美周文王有德，“兴我小邦”，由周代商“受命，奄甸百姓”，即以周代商“作民主”，治理百姓。劝说商民安分，这是天命所归。

西周初年很重视夏商灭亡的教训，以为鉴戒。周公、召公都谈到“以水（镜子）为鉴，仅见己身；以民为鉴，可知成败”。夏商虽称“服天命”、“畏天命”，但“惟不敬德，乃早坠厥命”。他们从历史和现实看到“天命靡常”，“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命棐忱，民情大可见”。因而把天与民情结合起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看不见，听不着，只能以民的视听为视听，甚至认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是按民意行事的。他们的结论是尊天、敬德、保民。这里明显反映了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表现得最明确的是《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民本思想之所出，对后世影响很大。其意是说统治者要亲近民，但不要失其身份。君主所以要近民重民，是因为民是立国之本，没有民就不会有邦国和君主。因而君须重民保民，治理好民，邦国社稷才会安宁，即所谓“人君当固民以安国”。

先秦诸子一般均肯定君主制度。但夏商覆灭，周王朝衰落和诸侯变异，有些王侯被逐杀，王冠落地，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民的政治作用，强调民的意义。如《左传》有“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民弃其上，不亡何待？”“《管子》云：“政之所在，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认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进而提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庶民）而为天子。”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其心，则可得天下矣。”荀子也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

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者具而天下归之，三者无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者谓王，天下去之者谓亡。”这都说明民的重要，是民本思想的反映，并有发展。

在传统民本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三句话，即“民惟邦本”、“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何如此重要？《诗·玄鸟》说得清楚：“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有民的地方才有邦国，没有民那来的邦国和君主？因而民最重要，民是邦国存在的基础。但民并不是主体，而是载体。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离不开身体，而身体行为要听心的指使。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孔子家书亦有：“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是君的载体，亦是王朝覆亡的力量。《五子之歌》在提出“民惟邦本”后接着说：“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就是说，君主统治众多之民，就像是用朽绳索驾驭奔驰的车马，必须战战兢兢，谨慎小心，否则就会翻车而亡的。“载舟覆舟”、“朽索驭马”，正是对民本思想的实质性解释，并由此产生诸多治国方策和统治术。由此也可看出民本思想决不是民为主人。

先秦思想家也提出立君为民或为公说。慎到云：“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荀子接受这种说法，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吕氏春秋》则说：昔先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孟子也有这类说法，对君主斥责亦严厉。其实这只是对君与民对立关系的一种调节，其意仍然是告诉君主重民保民利民而得民。

儒家的仁政思想也是基于重民利民得民，以调节君民的对立关系。孔子的《论语》就多次讲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养民也惠，使民也义”；“因民之利而利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

孟子强调仁政，反对暴政，重视民心民意。他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暇日修孝悌忠信，入以事父母，出以事长上，可使制梃以抗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所谓仁政，主要是要求统治者轻徭薄赋，尚德缓刑等；而民则是感恩戴德，叩谢吾皇“万岁”，“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劳而无怨，死而无怨”，当顺民。这既对民有益，更便于君主的统治和驱使，是仁政和民本思想的基本意思。

秦统一后，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君主专制愈演愈烈。秦王朝很快被农民起义浪潮冲垮，以后农民起义或造反也多次推倒腐败王朝。各代思想家对民本思想亦多有阐发。西汉初提出“与民休养生息”。贾谊云：“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董仲舒则谓：“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残害民者，天夺之。”稽康指责司马氏专制，“宰割天下，以为其私。”阮籍指出专制礼法是“束缚下民”，“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威、死亡之术耳。”鲍敬言痛斥统治者“聚玉如林，不足以极其变；积金如山，不足以赡其费”，及其“割人心，破人胫，穷骄淫之恶”的暴行。

唐初统治者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的震荡，仍然心有余悸，对民比较重视。唐太宗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由外来，常由身出。”魏征也说：“怨不在大，其畏惟人。载舟覆舟，此宜深慎；奔马朽索，其可忽乎？”所以，“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柳宗元批判封建专制，指出君主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是承受天命，而是民的自然拥戴，故须以民为本，否则民也可不拥戴。宋代范仲淹、王安石等也发扬民本思想，主张变法除弊。王安石说：“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也。”他实行变法，就是要“起民之病，治国之弊”。苏东坡明确指出：“众而不可欺者，民也。”“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都表示了对民生的关怀。

明清时代，民本思想有进一步发展。海瑞、李三才、田大益等直斥皇帝崇信佛道，重用权臣，横征暴敛，荼毒百姓，总想“黄金遍地，珠玉际天”，弄得“家家皆净”，发出“神人共怒，大难

将作”的呼贼。黄宗羲发挥“立君为公”、“民贵君轻”思想，说：“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治乱，不在一姓兴亡，而在万民忧乐”。王夫之也说“天下非一姓之私也”，认为君主也“可禅、可继、可革”。

在君主专制时代，一些思想家提出“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思想，一些开明官吏和士大夫关怀国事民瘼，抨击暴政和君权，为民请命呼贼，主张重民爱民利民，理应肯定。但也要看到，即使言词最激烈的，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权和君主制度，把民视为主人，没有超越民本思想范围。民本思想把民提得很高很重要，视民为邦国之本，“以民之所好好之，以民之所恶恶之”。但是，一，这种民本思想是与王权思想紧相联系的，而且必将导致皇权主义；二，所谓重民爱民惠民主要不是目的，而是统治方策、手段，正如孔子说“惠足以使人”；三，民虽然重要，但不是主体，而是载体，是恩赐惠施的对象，是载舟工具和覆舟力量；君则是“参天地”、“治世乱”，施恩泽于民的主体，“君者，民之原也”，“民之父母也”；四，从语法看，所谓重民利民恤民等，民字都不是主语，而是宾语，处于被恩赐惠施的地位。民本思想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又是对这种利益和意志的一种限制，看得远些，就是说要统治民，也需要关心民，使民能生活下去，不要“竭泽而渔”，“割肉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以使其江山社稷“长治久安”。

另一方面，生活在落后的小生产自然经济土地上的人民，主要是农民，由于分散孤立、势力单薄，无以自主，而产生依赖和服从心理，迷信“青天”、“救星”和权威。马克思说过，农民分散脆弱的经济地位，使“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正因为这样，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于“圣君贤相”、“真龙天子”，把自己的命运让别人主宰，期望“大救星”拯民于水火，以求能过太平生活。在他们实在生活不下去的时候，也起来造反，进行反抗斗争。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是很多的，并给专制王朝以沉重打击，而自己却不自觉地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即使农民首领当了皇帝，也只能是称孤道寡，如法炮制。这是小生产的限制，不可能产生新的思想和社会制度。

显然，民本思想是统治与被统治两方面共同需要产生的。其基础是小生产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不改变和发展，民本思想及“作民主”的观念总会存在的。在君主专制时代，民本思想及仁民、爱民、重民、为民作主等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诸如“省刑罚，薄税敛”、“博施济众”、“与民休息”及让步政策等，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生产的，对人民生活是有益的。但是，我认为这与近代民主思想是不同的两码事。

在近代中国，“民主、“人权’是外来的。在英文中有 Humanrights 和 Democracy 两词。前者译为“人权”、“人的权利”、“人类的权利”，是“天赋人权”，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后者译为“民主”或“民权”。由于中国的社会情况，却赋予不同的含义，民权是人民的权力，民主是主权在民，由民作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权可大可小，可由君主或国家给予，民主则表明人民的主权不容转让或分割。但两者又多偏重于政治的理解，也有将人权、自由等包括在内的，需要具体分析。然而由民作主则是明确的。

很清楚，古代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想，并无相通之义。经济基础不同，政治和思想内容各异，自主与恩赐，其义至相反。民本的前提是君主主权，君主实行仁政，重民爱民利民，“为民作主”，“爱民如子”，所谓“皇恩浩荡”是也。民主思想则是人权平等、人格独立、政治信仰思想言论自由，国法不得侵犯。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即主权在民，民是主人，执政者是公仆。如果将民本思想当作民主，就只能使公仆成为人民的主人，用权力支配社会，那是非常危险的，有害的。

（责任编辑：洛　松）

我在报上批评省委书记以后

● 李 宾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共和国上空红日高照，给人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

安徽这片苦难的土地，开始复苏，处处显示出生机，同时也充满矛盾的斗争。最明显的是农村大包干的实践与争论，对与错，是与非，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几乎每个人都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

当时，以万里同志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凤阳小岗和肥西山南农民的创造，肯定了实践证明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大包干。但是当时"左"还有很大的市场，不仅持"左"的观点的人为数不少，心有余悸的人更多。恰在此时，《人民日报》加"按语"在头版发表"张浩"斥责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其声势真也吓人。

万里同志离开安徽到中央工作后，由张劲夫同志任安徽省委书记。劲夫同志为人正直、胸怀坦荡，为安徽的拨乱反正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受到上下一致的好评。但是，或许由于他对农村缺乏了解，或许是他偏信了某些干部的片面汇报，对大包干持反对态度。他强调坚持发展所谓集体经济，不准正面宣传大包干的优越性。尽管如此，对报纸、电台、电视台播发的稿件并不予干涉；《安徽日报》上发表支持大包干的文章仍然经常不断；他对提倡、支持、赞扬大包干的同志，既没有批评、批判，更没有压制和迫害，显示出一个优秀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和宽广的胸怀。

对此，我有特殊的感受。1979年我写了《治穷之妙法》、1980年元月又写了《包字何罪》，都是为大包干鼓与呼的。这些文章，作为省委书记的张劲夫，不可能没有看到，但据我观察，在他那里没有明显反映。

1981年8月底，巢湖地委通讯组的老刘告诉我，省委领导同志要去庐江农村了解大包干的情况，事先通知了某公社某生产队，队里派了几位代表去向领导汇报。谁知在会上，几位代表顺着领导的意思，说了大包干的坏话。广大社员听了代表的发言非常气愤，就骂他们是叛徒。代表们也有委屈，说他们也有一家老小，也要吃饭呀，那是不得已。明明是大包干好，却得出大包干坏的结论。我为此感慨万千，忍不住奋笔疾书，连夜写了一篇短文《如此"调查"》，第二天交给了合肥晚报总编辑陈森同志，第三天见报。

文章开头就说："某负责同志下乡，想亲自调查一下包产到户的优劣。人未到，电话先下去了，而且声明'不带框框'。被选中的几个社员，受乡邻之托，准备用一年来工效高、产量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直陈这种生产责任制

对于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好处。哪知道省委负责同志光临茅舍之后，他们却一个个噤若寒蝉了。还是负责同志一再启发，才打破令人不安的沉默。然而从这位负责同志的口中，代表们闻到了气味，找到线头，便顺着往上爬。生产责任制的优越性不敢提起，却大谈起责任制的种种弊病来。调查最后的结论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矛盾重重，不得民心。"

文章接着说:"调查会胜利结束，但事犹未了。当生产队的社员听到广播喇叭里播送他们代表的发言时，一个个义愤填膺，便纷纷指责这几个人的叛卖行径。代表们先是低头挨骂，等骂够了也开了口:责任制的好处，谁不知道?看看各家的粮食就会明白。但不能说，我还有妻儿老小要吃饭呀……一句话把大家说哑了。"

文章最后说:"生产责任制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笔者无须赘述，也不是本文的任务，事实已经作过结论，人大常委会的考察组也作了评价。但令人不解的是，它明明好，为什么事实和结论会颠倒过来?除了极左的阴魂作怪，恐怕与调查者的架势、态度、作风有关。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电话铃、汽车喇叭以及大小干部的叮咛，够老百姓紧张的了。你既无求实之意，他就没有实话相告。这是生活的常理。再加上你的颜色和话头，都划了框定了调，群众只能够'看颜说话'。如果用这样调查得来的材料去指导工作，对人民对国家都是危害极大的。"

张劲夫同志对这样一篇未指名尖锐批评省领导的文章，既没有"对号入座"，说是影射他，从而加害作者，更没有向《合肥晚报》的同志问罪。

这很让我感动，由好感到尊敬。不仅是我，安徽的很多干部都有这种感情经历，大家并不因他对大包干的失误而失去对他的尊敬。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半个月之后，又用浓墨重彩描绘了张劲夫同志在肥东淝河毛巾厂两个小时的现场拍板，就是受这种感情支配的(此文题为《现场拍板记》，刊于 1981 年 9 月 18 日《人民日报》，后被评上 1981 年全国好新闻最高奖)。在我来说，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即对，错即错，不为尊者讳，好的不是一好百好，错的也不是一错百错。但真正做到就太难太难了。

此事已经过去 20 年了，今天回忆起来，仍耐人寻味，提笔写下了这个"向后看"的小故事。窃以为，"向后看"有时也是为了"向前看"。

(责任编辑:文　贤)

《炎黄春秋》增刊
《炎黄文化研究》第五期出版

本刊学术增刊《炎黄文化研究》第五期已于 1998 年 12 月出版。

本期要目有，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新的世纪》、李锦全:《世纪之交对中华文化前景的探索》、耿云志:《古代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瞿林东:《传统史学与未来社会》、董光璧:《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四大难题的思考》、钱易:《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涵初探》、黄石林:《中国古史中的黄帝时代》、余太山:《有虞氏的迁徙——兼说陶唐氏的若干问题(续)》、李斌城:《唐代社会生活的神仙色彩》、谢桂华:《居延简所见秋射及其相关文书考述》、张海瀛:《中华族谱述略》、宁可:《关于区域文化研究》、黄卓越:《公安派与阳明心学》、黄爱平:《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思想界的双峰星座——论戴震和曹雪芹对理学理欲观的批判》、梁景和:《清末国民性批判》、钱逊:《"和"、"中和"与"各得其所"》、韩梅:《刘徽在数学上的贡献》、龚书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述略》、〔英〕鲁惟一:《中华帝国早期史:西方学者的贡献》、〔韩〕于心华:《顾炎武地方官制改革论探析》、郑尔康:《永远的思念——记我的父亲郑振铎》。

本刊 16 开本 201 页，约 30 万字，订价 7.50 元，邮寄每册加邮资 1.50 元。可直接汇款给本社发行部。

上官云珠

我妈妈上官云珠最后的日子

● 韦 然

1969年1月初，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山西省北部的原平县被连日的风雪厚厚地盖上了一层白色，凌厉的北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站不稳脚跟。我从北京到这儿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我想，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于是向北京的奶奶报知我的去向，就爬上火车奔向上海。

火车在北国寒冬的风雪中一路南行，车窗外挂满冰凌的树枝飞速向后面掠去，车轮有节奏地轰响着。17岁的我，趴在小桌上茫然呆望着窗外苍凉冷寂的大地。

(一)

是妈妈病情恶化了？还是别的什么意外？我不敢想下去。

1966年2月，妈妈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借回上海休假的机会进行体检，发现乳房上有肿块，确认为乳腺癌后不久，在华东医院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身体恢复得也很快。但是两个月后，正在术后的恢复期中突然昏倒，检查结果是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这次可是动了大手术，十几个小时，等从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妈妈谁也不认得了，脑子里成了一片空白。术后一个多月，妈妈才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仍旧用她习惯的、向右倾斜的字体和绿色墨水，告诉我，她已经可以认识300个字了。

时隔三十多年后再来追想，我倒宁愿妈妈就这么一直昏迷下去，睡上十年，直睡到浑浊疯狂的世界重新清凉宁静的那一天!

可是，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人，又有谁躲得过这场势如瘟疫一样的劫难呢?

就在妈妈第一次手术时，社会上已经在批判电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了，是医生的干预，才把她留在了医院，没有过早地卷入汹涌的漩涡。她在华山医院动过脑手术，马上转入华东医院，躲过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第一个浪头。但是，到了可怕的“红八月”，诺大个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了。妈妈是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的。这对一个刚刚动了癌切除大手术的病人，哪有半点人道可言!那时候的她，人是半傻的，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竟又被投入到虎口里。

那些日子，我们在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完全不像个

家了，四层楼道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 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一样布满了黑洞。妈妈病弱的身躯倚靠在床上，木然呆望随意进出的红卫兵，心中充满恐惧……。八月酷暑，九月秋阳，蒸人的热浪在神州大地上翻滚，狂躁像瘟疫侵蚀着人心。可怜的妈妈，她实在是什么都不明白啊！一个好好的正常人，面对这“史无前例”的骚乱，尚且如入五里雾中；而妈妈是一个脑子有病的人，一个还没有恢复正常思维的人，一个受不得丝毫精神刺激的人！

……

她到底怎么样了？

到山西插队前，我一直躲在学校半地下的图书馆里，从早到晚画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在延安……，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做什么。直至有一天，我从昏暗的图书馆钻出来，站在刺眼的阳光下，突然看到校门口的黑板上赫然写有我的名字，表扬我积极报名上山下乡?! 先是莫名其妙，再是无可奈何，匆匆打点行装，扛起戴着八角帽的毛主席像，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山西。

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上海的消息了。

(二)

到了上海，我立即赶往音乐学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成了未知数。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这时候，不用再多问什么，我只有紧紧地、紧紧地抱住她。

……

妈妈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可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这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打得很重。

妈妈回到“牛棚”时，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但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身体不住地颤抖。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来。

那是 1968 年 11 月 22 日的凌晨。

那一年妈妈 48 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可是，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

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学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我一直视他为姐夫的人，高大，英俊。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把姐姐送上去部队农场的汽车后就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1970 年 3 月 8 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 24 岁。

我在上海时接到北京姑姑的来信，信中说猜到了我去上海的原因，因为她们早已知道了妈妈去世的消息，是在上海天文台工作的叔叔报的信，她们瞒着没有告诉我。这时我才恍然明白了为办插队手续拿户口本时奶奶那种异样的眼神。

我的叔叔程述铭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为中国天文报时准确性跃居世界前列做出了杰出贡献。1971 年深秋，在天文台的隔离关押地，用最简单的物理方法——触电自杀，

那一年，他42岁。

我的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的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四处奔波，在9月末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全都走了。

(三)

30年前，妈妈被逼迫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是不情愿的。

燕凯和叔叔，我深信，也是不情愿的。

我不知道妈妈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夜，她都想了些什么，也许她对继续自己的艺术生命产生了绝望，也许她对支离破碎的家庭失去了信心，也许她再也不堪忍受政治迫害带给她的无尽屈辱。无论她想了些什么，她都毅然决然地去了。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像妈妈一样义无反顾地辞世而去的人，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老舍、傅雷、田家英、穆宏……以及数不清的燕凯和叔叔们。中国古代的"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从来具有这样的传统——可杀，不可辱！他们用宝贵的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因为，在那个非常时期，人民没有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起码权利。任何一个人，今天给你罗织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明天就可以肆意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其手法之残酷和恶劣，真可谓集世界之大成。面对这种非人性的、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可言的身心羞辱，他(她)们只有以死抗争。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

在这成千上万以自杀来抗争世道不公的人群中，以及为数更多的被各种方式迫害至死的人群中，包含了多少对社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精英！他们的死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有人认真计算过吗？有人追根寻源去究其原因了吗？巴金先生创建"文化革命"纪念馆的倡议，有人理会了吗？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如果把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

妈妈离开我们30年了，30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她，所有热爱她的电影艺术的观众也没有忘记她。1995年纪念世界电影100年、中国电影90年的活动中，妈妈荣幸地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在我心中更为渴望的，是能够把妈妈为什么会遭此恶难的真正原因弄清楚，以告慰她的冤魂。

(责任编辑　舒元璋)

1963年夏，作者(左)与妈妈(上官云珠)和姐姐合影

有官职无官气的邵力子

● 金光群

凡是认识邵力子的人,都会有一个深刻印象:他总是笑容可掬,和蔼可亲。他的官职不小,但无官气;他学问不小,早年在复旦大学做过系主任,他无那种“傲气”。他办过报,很理解记者的甘苦,五十多年前,在国统区南京的记者们,大多喜欢找他,他对记者很照顾,也很爱护,记者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邵老。

我也常去拜访邵老,有时有些新闻很难采访,如国民党的“国务会议”、“和谈”消息等,那时邵老是国民政府国务委员之一,当然了解内情,只要到他府上去坐坐、谈谈,总会有点收获。

由于我同邵老夫妇早年接触较多,深感邵老有些特别,尤其在生活上,十分简朴,这里举几件事,很值得那些拜金主义、挥金如土者深思。

乘三轮车

在解放前的南京,邵老是个大忙人,除开各种会外,还要到参政会办公,像他这样的地位,出门办事,乘公家配备的小汽车,那是工作必需。可是,邵老自己买辆人力三轮车,只要时间允许,他总是坐三轮车前往,悠然自得。有不少机关门岗,看到一辆三轮车上坐着满头白发的老人,都知道是邵老。在停车坪上,一大排小汽车旁,停一辆三轮车,十分显眼。

住简易楼

邵老也算“部级”以上的大官,住舒适的小楼、有较好的家具,都是理所当然的。邵老和夫人傅学文,在南京办了一所力学小学,在学校院内一侧靠墙边,加盖一个红砖简易楼,一楼一底,楼下是不到18平方米的窄长会客室,楼上是卧室。陈设简单,有几张旧沙发。这间会客室,常宾客满坐,邵老总是坐在靠窗户的“老座”上,笑眯眯地同客人谈话。

吃大锅饭

邵老工作忙,年纪大,按常理,伙食应该好一些。可是,他家里不做饭,老夫妇就在小学教师食堂搭伙,到食堂小膳堂用餐。有一天中午,我在他家临告别时看见邵夫人手里拿一只小碗,里面有几片咸肉。邵夫人笑着说,这是给邵老加的菜,看了令人肃然。

翻旧信封

邵老有一个爱好，当他在办公室休息时，或同记者们"聊天"时，经常不停地在翻旧信封，一个一个细心地撕开，翻过来抹平，用浆糊粘好，放在一起备用。照说，像他这样的"秘书长"(参政会)，办公用品决不会匮乏的。为什么花功夫亲手翻旧信封呢?有一天我忍不住问邵老。他笑着说："还可以用，为什么扔掉呢!"

四菜一汤

邵老到北京工作后，受到党和政府照顾，尤其周恩来总理，对他的生活条件非常关怀，亲自来察看他的住宅，配备服务人员。1950 年的一天，我和另一个老记者祝修林到西四砖塔胡同一个四合院内去看望邵老夫妇。邵老很高兴，谈到中午，一定要留我们共进午餐，邵夫人说，现在有条件了。邵老过去极少请客，更难有"家宴"。这天做了两荤两素，一汤，外加一碟小菜，清清爽爽，热气腾腾。邵夫人说：今天特为你们加了两个菜。

关心群众

对老百姓有利的事，邵老总是乐于尽力。1949 年 3 月，当时的邮政总局希望同中共谈判"国共通邮"，托我找邵老同北平联系。我向邵老说了之后，他很愉快地接受了，连说："可以的，可以的。"两天后，叶剑英的秘书就回电要邮政总局派正式代表团去谈。4 月 1 日邮政总局派霍锡祥等五人，随同国民党和谈代表专机去平，还带去两千公斤的邮件，以后达成了"南北通邮通航协议"。

无疾而终

1967 年，邵老已 85 岁高龄。12 月的一天早晨迟迟没有起床，邵夫人到卧室去看望，一边还说："不早了。"走近床边，看邵老侧卧，一手托头，面带微笑，邵夫人以为他还未醒，摇摇，仍无动静，一摸头，怎么冰凉?这时邵老早停止呼吸，急送医院，经检查、化验、解剖，结论是："老死"，没有任何症状。真正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

(责任编辑　舒元璋)

1945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右一)由重庆返延安。邵力子(左二)和夫人(左三)同重庆各界人士到机场送行

勇于“造命”的女教授

陈衡哲

● 吴继路

公元 1967 年 1 月 7 日，中国大上海正演出浩劫中一场不小的闹剧，当时夸称“一月风暴”。宣称“夺了权”的造反派气焰熏天，甚嚣尘上。遑遑中的黎民谁也没有留意，一位老人，老祖母，在市广慈医院的病榻上孤独地、平静地溘然长逝。老人走过了 86 年的人生历程，她留给人间的最后一个念头，或者一句遗言，当是这样几个字：“我不希罕那个。”

她鄙弃和“不希罕”的“那个”是什么？是别人赐的命，那种“成也由人，毁也由人”的命。她所信奉的是生命的奋斗——“造命”。她在 34 岁时写过一篇奇文《运河与扬子江》：

“扬子江与运河相遇于十字路口。

河：你从哪里来？

江：我从蜀山来。

河：听说蜀山险峻，峭岩如壁，尖石如刀，你是怎样来的？

江：我是把他们凿穿了，打平了，奋斗着下来的。

河：哈哈！

江：你笑什么？

河：我笑你的谎话说得太希奇了。看呵！似你这样软弱的身体，微细的流动，能与蜀山奋斗么？

江：但我确是奋斗过来的，况且我从前并不是这个样子，我这个软弱的生命，便是那个奋斗的纪念。

河：真的吗？可怜的江！那你又何苦奋斗呢？

江：何苦奋斗？我为的是造命呀！

河：造命？我不懂。

江：你难道不曾造过命吗？

河：我的生命是人们给我的。

江：你以为心足吗？

河：何故不心足？

江：我不羡慕你。

河：可怜的苦儿！你竟没有一个人来替你造一个命吗？

江：我不希罕那个……”

这个奋斗的生命——造命的主人叫陈衡哲。

陈衡哲，祖籍湖南衡山，她的名字便是为了纪念那片南岳故土而取的吧？1890 年 7 月 20 日，她诞生于古城常州，那是一个颇为知名的诗书家庭，祖父钟英（字槐庭），伯父范（叔畴），父亲韬（字季略），都是颇有造诣的学者、诗人。她母亲名叫庄曜孚（字苣史），又是一位杰出画家。衡哲共有姐妹六人，兄弟二人，她行二。自幼在书香环境中受熏陶，年岁很小就从父母习读四书五经，尤爱古典诗词。她父亲感到偌多子女中，衡哲更具深慧，所以给她加学国学文典《尔雅》。由于这样的早期修习，她打下了比较牢实的传统文化基础。后来又有机会接触与深研西方思想学问，所以她名世的成就重点在学术上思想上。中国远近历史上极罕见女学者、女思想家，陈衡哲则早在中年时便给后人留下了具有独到见解和卓异风格的学术著作——《西洋史》，她成为中国 20 世纪第一位女教授。

陈衡哲从早期便热衷学习知识，探究新思想，自我奋斗，不屈不挠，她的成长与成就都受益于一种观念、一个宗旨，那便是“造命”。赋予她“造命”思想，并且提

携鼓励她走上“造命”道路的，是她母亲的胞弟，她的三舅父庄蕴宽(字思缄)先生。

衡哲幼时，舅父思缄先生在两广担任官职，因为陈家住在庄家的大宅子西院，舅父每次回家省亲小住，衡哲总跑到舅父房里，听他说外面的见闻。舅父他在风气趋新的通商口岸生活，接触新式学校、医院以及外国教堂的新知识，都是孩子们闻所未闻的：原来我们住的地球是圆球形的呀，原来中国以外还有别的大洲，还有许多国家呀，那些国家点电灯、坐火车，使大机器织布，女孩子也上学校，做种种事情。舅父还特别以佩服的语气说起那些来到中国服务的美国女子。看甥女张着惊奇、神往的大眼睛，思缄先生说：“你是个有志气的女孩！”

“我怎样学习她们呀?”衡哲认真地急切地问。

舅父抚着她的头，说：“先得进学校呀！”略停顿一下接着说：“广州有一所女医学校。你愿意去学医么?”

在晚辈子女里，舅父显出特别钟爱衡哲，希望她能学到科学知识，也能领悟妇女的新使命。他说，做个有出息的人，不是永远亦步亦趋跟着父母尊长走，而要胜过、超过他们！每一次这类的谈话，在衡哲心胸中累积起来，炼成了她一个最大的美梦，最强烈期盼实现的美梦，那便是进学校。

衡哲 13 岁那年，父亲被调到西南一个僻远的地方去作官，她提出要跟舅父到广州去进学校，慈蔼贤明的母亲理解和支持女儿的心愿。

待冬天到来，母亲要带孩子们离开常州经上海到父亲任职的地方去的时候，终于同意她跟一个亲戚去广州找舅父。临分别，母亲含泪对衡哲说：“哲儿，你是个有上进心的孩子，将来会有成就。不过你到底还是个孩子哟，到了那边，一切要听舅父舅母的话，一切小心。你记住，每星期给我们写封信来，告诉你的情况，也叫我们放心……”

衡哲向母亲跪下磕了个头，流着激动的眼泪，毅然告别母亲到了广州舅父家。衡哲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人们习惯呼她“大二小姐”，因为表妹中有一个“二小姐”，表妹表弟管她叫“大二姊”，舅父待她如亲生孩子。

到舅父家不久，衡哲就提出进学校的要求；舅母也曾带了她到医学校去报名，但学生必须年满 18 岁才行，又没有其他学校可上，舅父只好先收他为入室弟子。舅父诲人不倦，除了给甥女讲不少新时代知识，包括卫生知识、做人处世的道理外，还为她请来一个杭州人任数学先生。衡哲对舅父更敬爱、更感激。几个月以后，舅父调到廉州任职，全家随往。此后尽管舅父公务多么繁忙，每天下午仍然骑了马赶回家，给甥女上一小时课，来去匆匆，有时连舅母准备好的丰盛点心也来不及吃。舅母也感动地说：“看看你舅舅多么希望你成才，你可要努力呵！”

经过这一年的家教补习，衡哲感觉受益匪浅。

又一年冬天，舅父听说蔡子民(元培)先生办了一所新式的爱国女校，便乘舅母回乡省亲之机，把甥女带到上海，并写了一封信给蔡先生，希望他帮助甥女入学。临别舅父语重心长给甥女做了许多嘱咐。特别要她留心改掉两个毛病，一是爱哭，一是不能忍耐。女子要做大事，这样的弊病必须坚决克服。他说：“我愿下次再见你时候，你已经是一个具有坚忍力，能够自制自励的大人了。别的我倒用不着操心，你是一个能‘造命’的女孩子。”

“造命”是舅父传播给衡哲的最重要人生观念和立身要旨。他经常说，世上的人都说命，但对命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安命”，第二种是“怨命”，第三种才是高超的、有价值的态度，那便是“造命”。

“希望你造命，我也相信你能造命——与一切恶劣的命运奋斗。”

到了上海，衡哲先碰到一个考验。舅母把她交托给一个熟人就回家了。衡哲揣了舅父的信去爱国女校，原来蔡元培先生已经不在那里了。

从此，在人生搏斗场，在时时狂旋着险风恶雨的大上海，离开父母、离开舅父、只身奋斗的少女陈衡哲，抱了“造命”的宗旨与信念经风雨，见世面，迎受了种种困苦挫折，有时则是生死考验，前后拼搏了近十年。她进了另外一所学校，别的课程无所获，可幸一位教英语的女老师，帮助她打下了很坚实的英文基础。她披荆斩棘地“造命”，也包括她抵制了父亲为她包办的婚姻，推开了别人赐她做一个官场后补少奶奶的命运，而争取了自主的美满婚姻。在生活困窘乃至走投无路的关头，她得到了另一位长辈的体贴支持，那是她的姑母。姑母住在苏州附近一个小城，人明达而豪爽，全心全力支持侄女衡哲的“造命”精神。她的这种坚韧抗争、自主命运的精神终于得到了好报应，1914 年，衡哲 24 岁时，清华大学在上海招收留学生，姑母鼓励她报考。衡哲被录取后，她又为自己造了一个出洋深造的命。舅父从北京来信，热诚炙人，他说：“吾甥积求学之愿于今得偿，舅氏之喜慰可知矣。”

陈衡哲造命，终于造出了中国一位成就卓著的女教授，女学者。

(责任编辑　洛　松)

我们以八个页码的篇幅发表这样一篇资料性的长文，目的是昭示国人：在我们欢庆今日的成功时，切勿忘记我们曾有过的屈辱历史；在我们致力于“地球村”的邻里相睦时，切勿无视这样的事实：为军国主义招魂者有之，为谋求霸权欲践踏他国主权者有之。

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知多少

● 赵友慈

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中，由于国势日趋衰弱，统治者腐败无能，与外国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是在武力威胁、政治讹诈或经济施压的形势下签订的。这些条约的签订，使我国丢掉大片领土，付出巨额赔款，丧失很多主权，人民遭受极大苦难，严重阻碍和破坏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近代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

以史为鉴，温故知新。今天对这些不平等条约举其要者予以述评，是很有意义的。

(一)

在侵略者炮火威逼下，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1840 年，英国为了倾销鸦片，发动侵华战争，攻占广州，军舰进人长江口，直抵江宁(今南京)。在炮口威逼下，清政府屈膝求和，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8 月 29 日，钦差大臣耆英与英代表璞鼎查在江宁江面英国“汗华丽”号战舰上签订和约。此约是英国炮制的，本无名称，后称《江宁条约》，今称《南京条约》。此约签订后，英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在广州附近虎门签订)，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

三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赔偿英国洋银 2100 万元，另付广州赎城费洋银 600 万元。开放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可在每处驻守一艘军舰和派驻领事；准英人在五处租地建屋，永久居住。税率与英共同议定。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英人在中国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英国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将来清朝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一体均沾”。

《南京条约》是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马克思说，《南京条约》是在英国炮舰的威逼下签订的。它破坏了中国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关税、司法主权，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影响。

更“完备”的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中英订约后，美国接踵而至，效法英国，1844 年(道光二十四年)7 月 3 日，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与清政府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通称《望厦条约》。美除取得英得到的一切特权外，还获得了洋货转口免税、派兵船到沿海港口“巡查贸易”、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的权利，并扩大了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协定权。

《望厦条约》的不平等性更为广泛，对中国主权造成更大危害。签订

此约的美国特使顾圣说:“美国及其它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江宁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是现在英国和其它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开得更宽阔了。”

法国紧步英、美后尘,1844年10月24日,与清政府在广州附近的黄埔签订了《五口贸易章程》,通称《黄埔条约》。法国获得了英、美得到的所有特权,还迫使清政府废除了实行一百多年的不准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禁令,为列强利用传教进行侵略开了方便之门。

列强在中国建立租界,形成“国中之国”

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驻上海领事援引《虎门条约》准英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条款,与上海道台交涉,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11月29日签订了《上海租地章程》,又称《上海第一次地皮章程》。划定外滩一带830亩(后扩大至2000亩)土地给英,这是在上海的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即后来的英租界。该章程规定了“永租”、“洋华分居”制度,还容许租地内的外商以简单市政设施管理居留地。据此,外商成立了“道路码头委员会”,负责征税和建设,这是租界政权机构的雏形。

1846年,美国在上海苏州河北岸置地建房。1863年,上海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1849年,法国在上海租地近千亩,是为法租界。

1854年(咸丰四年),英、美、法驻上海领事自行拟定第二次《土地章程》,在租地人会上通过并实施后,才通知上海道追认。章程规定了租地办法、惩罚华人办法、设置巡捕、建立工部局等。工部局是租界的政权机关,设有警察、法院、监狱、市政、税收等部门。英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毫不隐讳地说:租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殖民者在租界内走私鸦片、洋货,贩卖华人,在公园大门口挂“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牌子。洋人还与中国反动政府勾结,镇压人民革命。民主革命先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有的身陷租界监狱,有的惨死于租界囹圄中。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就是在租界内被捕移交反动政府后遭杀害的。

19世纪后期,德、俄、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等十几个国家与清政府签订条约,在几十个城市建立租界。广州英、法租界占地2600亩;九江英租界“镌石立桩”,上刻“大英国地基”;厦门公共租界称为“万国公地”。日本一次就在苏州、杭州、上海等八处建立了租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签订了七个不平等条约

英国为了攫取更多特权,1856年10月发动侵华战争。法国出于同一目的,也制造借口,派兵侵华。这次战争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故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称“英法联军”之役。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北上津、京。1858年(咸丰八年)5月20日攻陷大沽炮台,26日侵占天津。清政府急派全权代表赴津乞和,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美、俄趁火打劫,不费一枪一弹,也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四个《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汉口、九江、镇江、琼州、台南等十处为通商口岸,外国兵船可在各口岸停泊。开放长江各口,外国商船可在各口往来。外国人可在中国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分别向英、法赔偿白银400万两和200万两。

该年11月,清政府又与英国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承认鸦片贸易合法;洋货运销内地只加征2.5%的子口税;中国海关聘用英人管理。据此,1861年聘英国人李泰国任海关总税务司(官职);1863年后由英国人赫德继任,长达48年,直至他逝世。还规定各关税务司及外国帮办人员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中国海关大权完全落人洋人手中。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于1860年2月再次联合侵华。8月24日,攻占天津。北京危急,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命其弟奕䜣留守,主持议和。10月6日,侵略军闯进北京西郊圆明园,野蛮洗劫,纵火焚烧,这座具有极高科学和艺术价值的“万园之园”化为瓦砾。对此种毁灭文化的行为,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严厉谴责:“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他把英、法称作“贼运享通”的“强盗”。13日,联军攻人北京,吓破了胆的奕䜣屈膝求和,答应英、法的全部要求,1860年(咸丰十年)10月24日、25日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准许法传教士在各处租地、建教堂。给英、法赔款均增至白银800万两,另分付英、法恤金白银50万两和20万两。

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夺了相当于12个福建省的中国领土

俄国与中国毗邻,对中国一直抱有领土野心。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俄以武力相威胁,1858年5月8日,在黑龙江省瑷珲城与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规定:将中国

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 60 多万平方公里划归俄国；乌苏里江以东 40 多万平方公里由中、俄"共管"。中国内河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船只航行。对此，恩格斯说：俄"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由于沙俄的胃口太大，清政府当时未敢批准这个条约。

1860 年 6 月，沙俄强占我国重要港口海参崴，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

沙俄对《瑷珲条约》悬案并不死心。两年后，借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攻占北京之机，扬言要炮轰北京城、捣毁清皇宫。惊魂未定的清谈判代表奕䜣任人宰割，1860 年 11 月 14 日与俄签订了《北京条约》，不仅确认了在《瑷珲条约》中俄强占的 60 多万平方公里，而且将该约关于中、俄"共管"的 40 多万平方公里也割让给俄国。1864 年(同治三年)10 月，沙俄又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强占我国新疆地区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 44 万平方公里。以上，沙俄共侵占我国领土达 144 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 12 个福建省，或两个德国、一个波兰的总和。如此大规模地侵吞邻国领土，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的其它不平等条约

英国通过签订《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等，规定列强船只进入长江由各国领事批准，外国商船在长江可武装航行，这就使长江主权落入外国人手中。

俄国通过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获得了如下特权：俄商在中国边境百里之内贸易和前往蒙古贸易概不纳税；俄人可携带武器在华经商；俄可任便在张家口销售俄货，使张家口成为沙俄侵略华北的据点，控制了中国北方市场。

日本于 1871 年(同治十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中、日近代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该约表面平等，貌似公允，实则日本只享受权益，不履行义务，日还通过武力威胁，强迫清政府修约，不断扩大权益。1878 年(光绪四年)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又称《台事专条》，迫使清政府承认日本 1874 年对台湾的武装侵犯是"保民义举"，由中国赔偿军费白银 50 万两。1875 年，日本强阻中国属邦琉球王国(在日九州岛和我国台湾岛之间)向清"入贡"；1879 年日将琉球并入本国版图，改称冲绳县。

德国通过签订《中德通商条约》等，获得了英、法、美等国所享有的自由通商、减免关税、建立租界、自由传教、领事裁判、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切特权，成为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角色。

在镇南关大捷声中，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和约》

长期以来，中国与越南有宗藩关系。1882 年，法军进犯越南。翌年 12 月，法军向中国军队寻衅，挑起了中法战争。清军屡战屡败，与法签订了《简明条款》，对法、越间"所有已定及未定各条约"中国概不追问，中国驻越军队"调回边界"，战争终止。1884 年 6 月，战事又起，法舰轰击台湾基隆和福州的中国船舰。此后，在北越、台湾澎湖地区多次发生战斗。1885 年 3 月，清军在老将冯子材率领下，大败法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此时，清朝握有内政外交大权的李鸿章认为：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众口皆守"，一旦小胜，还会引来更大报复。因此，清政府极力求和。1885 年(光绪十一年)6 月 9 日，签订了《中法和约》，又称《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或《李巴条约》(因是李鸿章与法公使巴特纳签订的)。

条约主要内容：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中国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法在此设领事，法商人有居住权。降低中越边境的进出口税率。中国修筑铁路须与法"商办"。镇南关大捷，中国军队沉重打击了侵略者。中国军民浴血奋战取得的胜利，换来的却是一纸丧权辱国的条约。

《中法和约》签订后，中、法又签订了《越南边界通商章程》、《续议界务专约》、《续议商务专约》等。上述

1841 年 9 月 25 日英军炮击我舟山岛

条约进一步确立了法国的侵略权益，打开了中国西南大门，使中国西南地区逐渐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得势刺激了其它列强的侵略野心，清政府又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

英国：通过《中英会议缅甸条款》，清政府承认英对缅甸的殖民统治，规定藏印边界通商。通过《中英续议滇缅边界商务条款》，确定由中、英勘定中缅边界。英军可随意通过中国一段边界。滇缅贸易减免税等。通过《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等，清政府承认锡金完全脱离中国，由英国"保护"。规定了西藏与锡金的边界。西藏与锡金通商，开亚东为商埠，英可派员驻扎。五年内藏、印贸易免税。通过这些条约，英国打开了云南、西藏的门户，为进一步侵入中国腹地和西南地区开辟了通道。

在此期间，葡萄牙与清政府签订了关于澳门的条约。澳门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葡殖民者贿赂广东地方官员，借口曝晒水潜货，强行登岸，在澳门居住，向地方政府缴纳地租。清政府在澳门设关征税。1849年，葡方擅自封闭海关，赶走地方政府和海关官员，停付租金，强占澳门。1887年(光绪十三年)12月1日，清政府与葡萄牙在北京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又称《北京条约》。规定：允许葡"永驻和管理澳门"。但清政府曾声明，澳门"决非正式割让。"葡派公使驻北京，派领事驻各通商口岸。葡人可在各口岸租地建屋、建立教堂、在各地自由传教。葡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葡萄牙这样小的、迟到的殖民国家，得到了列强在华的各种特权；它长期占领澳门，使中国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害。

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也使中国人大梦初醒的《马关条约》

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极力向外开拓疆土，陆上西进的目标是朝鲜和中国。1894年春，日制造借口，挑起甲午战争。中、日在黄海大战，陆上日军进抵奉天，占领牛庄、营口，北京受到严重威胁。清政府无心抵抗，急于求和，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本马关谈判。谈判中，日极为蛮横，要中国接受它提出的条款。日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说：对此条款，"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答："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李鸿章屈膝接受日的条款，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

1894年，日本在旅顺的暴行

《马关条约》主要内容：废除中朝宗藩关系，实为承认日对朝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杭州、沙市、苏州、重庆为商埠。日人可在各口岸建立工厂，输入机器。日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免征各种杂税。由于割让辽东半岛影响了其它列强利益，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为"酬报"，赎回了辽东半岛。

《马关条约》是一个条件极为刻毒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主权造成极大破坏，给全国人民造成极大痛苦。这次巨额赔款，相当于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日得到这批赔款，大大增强了实力，为扩军备战、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重要条件。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给中国极大震动，促使人们觉醒，努力寻求救亡图存之路。梁启超说："我国四千余年之大梦初醒，实始于甲午战败，割让台湾、赔偿二百兆之后也。"此条约签订几年后，就发生了戊戌维新变法和义和团爱国反帝运动。

甲午战后列强掀起新一轮瓜分中国浪潮，清政府又签订一批不平等条约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彻底

暴露了它的软弱、腐败和无能，引起列强加剧侵略，出现了瓜分中国的新浪潮。

法国捷足先登。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签订了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开放龙州、蒙自、河口、思茅为通商口岸。关税减四征收。法获得在云、粤、桂三省开矿筑路的优先权。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签订了《广州租界条约》：将广州湾租与法，租期99年。在租地内法有权驻军、修建炮台和各种军事设施。中国船只驶入广州湾要交纳各种税钞。允许法修筑广州湾至安铺的铁路。云、粤、桂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一直想在中国拥有一个港湾，作为侵略扩张的基地。1897年，它寻找借口，派舰队驶入山东胶州湾，占领胶州城。在武力胁迫下，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与其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胶州湾 及湾内各岛租与德国，租期99年。租期内该湾完全由德管辖，德有权在租地内驻军、修筑炮台、整顿水道、调动军队。在租地内德可约束它国（包括中国）船只往来。胶州湾沿岸平潮一百里内为中立区，德军自由通行，中国"派驻兵营、筹办兵法"须与德会商。允许德在山东修筑两条铁路，德有权开采铁路沿线30里内矿产。山东任何工程须用外国人员、资本和器材，应与德商办。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又签订了《山东华德矿务章程》：公司由德经理。中国派兵保护。德开矿区域15里内华人不得开新矿，已开者要废止。铁路沿线华人不得用机器开矿。上述条约使山东省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1898年，英国提出租借威海卫。为达此目的，它一方面与其它列强进行幕后交易，另一方面对清政府施以军事恫吓，从而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威海卫及其附近海面租与英国，租期25年。所租之地归英国管辖，英可驻军、修筑炮台和另设防护之法。此约使中国内海渤海湾为英占踞，成为它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战略要地。1898年，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将九龙司属地（包括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区及大小二百多个岛屿，总面积975.1平方公里，今天统称"新界"）作为"租借地"，大鹏湾、深圳湾等海域也被强租，租期99年。条约规定，中国政府保留九龙司衙门，以行使对九龙城及其附近码头的管辖权。1899年5月，英殖民者出动军队强占九龙城，驱赶守城官员和城内百姓，全部占领了九龙半岛。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想与俄国结盟，以抵制日本。俄提出苛刻条件，进行讹诈。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中、俄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通称《中俄密约》。规定：如日入侵俄国远东和中国、朝鲜，中、俄应以军队、军火、粮食相互援助。战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向俄兵船开放。中允许俄接造由黑龙江、吉林至海参崴的铁路，战时、平时俄均有权使用该铁路运送兵员、军械和粮食。俄不费一枪一弹，我国东北就成了它的势力范围。沙俄一直想在太平洋占有一个不冻港。它积极活动，以得到列强的支持。同时，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向旅顺口增派军舰。1898年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条约规定：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俄在租地内享有治理地方和调动军队的全权，中国无权驻军。租地以北划一块"隙地"（几乎包括整个辽东半岛），未经俄允许，中国军队不得进入。中同意俄从中东铁路修一支线到旅顺、大连，此支线经过之地，中国不将铁路利益让与别国。强租旅大后的第二年，俄国擅自将租借地改为"关东省"，设总督于旅顺，实行军政合一统治。大连海关由俄人任税务司。辽东半岛实际上成了沙俄的殖民地。

俄国在上述《旅大租地条约》中攫取的特权，后来大部分转让给日本。情况是：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1904年在我国土地上厮杀，俄战败，日、俄在美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俄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让与日本；将由长春至旅顺口铁路及一切支线及该铁路内一切权利、财产、煤矿让与日本。为确认上述事项，1905年中、日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日还得到新的利益：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森林；在东北开辟16处商埠；在奉天、营口、安东设立租界等。由此，日本进一步扩大了在东北的权益，东北实际上成了它独占的势力范围。

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签订几乎使主权丧失殆尽的《辛丑条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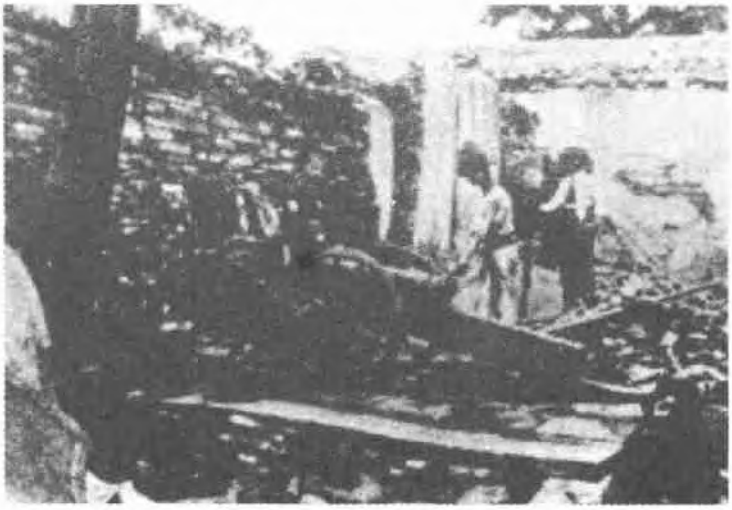
甲午战争推动了全国反帝斗争，逐渐形成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它遍及北方，进入京、津。以"保护使馆"为借口，1900年6月，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军侵略中国。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14日进犯北京。义和团与中国军队奋勇抵抗，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清朝统治者惊慌失措，西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和王公大臣逃离北京，清军统帅荣禄临阵逃跑。8月17日，北京陷于敌手。侵略军在京、津烧杀抢掠，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联军统帅瓦德西承认："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损失，其详数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北京沦陷，清廷竭力求和。侵略者增兵10万，向山海关、保定、山西、张家口等地进犯，扩大侵略战果。此时，比利时、西班牙、荷兰趁火

打劫，挤进"胜利者"行列。十一国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声称"无可更改"。留京议和的李鸿章"毫无异议"，立即报给流亡西安的西太后。西太后求降心切，即回电李鸿章"立即照允"，并指示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9月7日，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与十一国签订了《辛丑各国条约》，简称《辛丑条约》。

条约主要内容：中国赔偿白银4.5亿两，39年还清，本息9.8亿两。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各国派兵驻守，中国人不得居住。拆除大沽及北京至大沽沿线各炮台。中国不得在天津周围20里内驻军。外国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地方驻军。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仇敌"的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必须保证外国人安全，否则，立予革职，永不叙用。发生反对列强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惩办附合过义和团的官员(被监禁、流放、处死的高级官员达一百多人)。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此条约空前丧权辱国，中国主权几乎丧失殆尽，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人民陷于更深的苦难中。



1990年，在东交民巷列强使馆区德国的大炮准备向清军射击

(二)

袁世凯为当皇帝，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

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还想当皇帝。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共5号)，作为支持袁称帝的条件。日的要求刻毒，用心险恶，妄图独占中国。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除第5号(中央政府须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了日的要求。5月25日与日签订了《民四条约》(1915年是民国四年)，又称《中日北京条约》。

条约的主要内容：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日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为借口)。中国允诺山东内地和沿海岛屿不租让与他国。将旅顺、大连和南满(哈尔滨至旅大)、安奉(安东至奉天)铁路租借期延长至99年。日人在南满和东蒙任便居住、往来、筑路、采矿和经营农工商业。汉冶萍公司与日合办；其附近矿山不准让与他人；中国不得将该公司充公或借他国资本。不准它国在福建沿海建造船所、贮煤所、海军基地，中国也不得借它国资本自办。

此条约使日本的侵略势力在满、蒙、山东得到巩固、扩展，在华中、华南也进一步增强。

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准其在中国驻军和日军自由出入东北的协定

俄国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支持日本出兵西伯利亚，1918年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在中国"作战区域"修筑军事工程。日可使用中东铁路进行军事运输。可在沿海军事行动区设置谍报机构。允许日派联络人员驻中国军事机关。中国驻黑龙江和贝加尔湖地区军队由日本指挥，等等。使日本取得了在北满、蒙古驻军和进行军事活动的特权。此后日军七八万人开进我国东北，为发动侵华战争作准备。

北洋政府为一己私利，与外国签订严重损害主权的借款合同

袁世凯控制的北洋政府，为筹集对国民党用兵经费，1913年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约合1.5亿两白银)的《善后借款合同》，这是《辛丑条约》后中国最大的一笔外债。规定47年还清，本息共6785万英镑。除掉利息和赔偿辛亥革命期间各国侨民的"损失"等，实际到手的仅760万英镑，只是借款的1/3。这笔借款以盐税作抵押，盐税由外国人征收。中国盐税主权完全落入列强手中。

段祺瑞当总理时的北洋政府，以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修铁

路、开采矿业森林等为名，1917年、1918年与日本签订了《交通借款合同》等，借款近5亿日元。段祺瑞用这些借款，编练"参战军"三个师和四个混成旅，扩大了皖系实力。日本则通过提供借款，攫取了东北、蒙古的铁路修筑权，森林、矿藏开采权，军队训练权，电讯管理权，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

（三）南京政府初期的屈辱外交：签订《宁案照会》和《济案协定》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美、英等国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炮击南京城，中国军民伤亡两千余人。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谈判，3月互换《中美解决宁案交涉照会》，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杀害中国军民的罪行只字不提，中国却表示"道歉"、"赔偿"、"惩凶"，甚至下令通缉所谓的"肇事者"、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共产党员林伯渠。之后，南京政府又与参加制造此案的英、法、日、意等国互换了内容相似的照会。

1928年4月，蒋介石打着"完成统一大业"的旗号，进行"北伐"。5月1日攻占济南。日本为阻止"以美元为背景的南军北上"，借口"保护侨民"，公然出兵山东，攻入济南，烧杀抢掠，很多繁华地区成为废墟，中国军民伤亡五千余人。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捆绑毒打，割去耳鼻，挖眼断舌，惨遭杀害。外交公署官员16人亦被枪杀。1929年3月，中日签订《济案协定》，规定双方调查"两国所受之损害"，中国政府"以全责保障在华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还说，"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把侵略者杀害中国数千军民的罪行一笔勾销。

"九一八"后对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步步退让，签订种种"停战"协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在上海寻衅，1932年1月28日挑起"一·二八"事变。中国第十九路军等英勇奋战，给敌以沉重打击。日不断增兵，三易主帅。中国最高当局无抗战决心和勇气，5月5日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实际上承认日军可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军、设防。还规定取缔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等。

1933年，日本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关内，占领热河，进犯长城。中国军队奋勇抗击，由于孤立无援，腹背受敌，日军攻陷冀东22县，平、津受到严重威胁。此时，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日妥协退让，5月31日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河北滦东19县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不得逾越双方商定的界线。这个协定南京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使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随时进攻冀、察。

1935年日本加快了对华侵略。5月29日，以中国军队进攻"非军事区"，破坏《塘沽协定》等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调关东军入关。6月9日，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所有国民党党部。撤退河北省的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取缔一切排日抗日团体和活动。次日，何应钦告知日方："全面承诺日方要求"。日草拟一"备忘录"要何签字。对此南京政府颇有顾虑。但在日施压下，7月6日，何致函梅津：6月9日所提各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这就是人们说的《何梅协定》。虽然蒋介石、何应钦否认有此协定，但他们在此次事件中对日本妥协的历史事实是否认不了的。

在《何梅协定》前后，日关东军特务长土肥原贤二制造借口，调动军队驻屯察哈尔省边境，派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南京政府屈服于压力，命察省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谈判，6月27日签订了《秦土协

1900年沙俄军队屠杀义和团的暴行

定》，又称《察哈尔协定》。主要内容：向日道歉，撤换与此事有关的中国军官。保证日人在察省自由出入。划察东为"和平区"，中国军队从该区撤出。取消察省所有国民党机关。禁止反日组织及活动。此协定使冀、察大部主权丧失，日控制了两省，进而直逼平、津。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得到美国支持打内战，与美签订新"二十一条"

抗战胜利后，为得到美国支持打内战，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与美国签订条约、协定，危害最大的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名为商约，实则政治、经济、军事无所不包。如规定：美国人在中国享有租地、建屋、办厂、经商的权利。有从事教育、科学、宗教、慈善事业的自由。美商品输入中国不受任何禁止和限制。美一切船舶，包括军舰可在中国开放口岸、地方及领水"自由航行"；即使进入不开放口岸、地方及领水，也"应获得友好之待遇及协助"。条约虽标榜"平等"、"互惠"，但落后的中国不可能像美国在中国那样，到美国从事各种活动。此条约的实质，就是中国对美开放一切，美在中国可为所欲为。中国人民将它斥之为新"二十一条"。此后，国民党政府还与美国签订了许多"协定"，作为《中美商约》的补充。如：《航空协定》、《青岛海军秘密协定》、《滇越铁路管理与川滇铁路修筑协定》、《美国武装部队驻扎中国领土换文》等。美在中国得到了领土、领海、领空、铁路交通、内河航行、海关、商业等特权。

面对上述种种丧权辱国条约，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但由于历史原因或当政者的一己私利，人民的愿望未能实现。中华民国成立伊始，《临时大总统宣言》虽说："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务一洗而去之"，但《告友邦书》又表示：清政府所借之外债，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所让与各国之种种权利，"亦照旧尊重之"。1928 年 6 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提出"改订新约"，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经多次谈判，虽签订了一些新约，有关国家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关税收入有所增加，但由于有很多限制，且海关总税务司和很多海关负责人是外国人，中国关税不可能真正独立。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在新的条约中，一些国家虽承认废除，但又附加很多条件，加之南京政府妥协退让，废除日期一再拖延，终致不了了之。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承认：此事"阻隔甚多，断无成就"。国民党吹嘘的改订新约"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纪元"，纯系自欺欺人的宣传。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使离开祖 国半个世纪的台湾回到了祖 国的怀抱。抗战胜利应由中国军队接收香港。国民党政府为得到帝国主义支持打内战，不敢得罪英、美，竟丧失了这次收回香港的大好时机。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一成立，就庄严宣告：对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订立的条约和协定，"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那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当然在废除之列。令人欣慰的是，香港已回归祖国；与祖国分离四百多年的澳门也将回到母亲的怀抱。

百年屈辱史，终于得洗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

〔作者注：

1. 按中国历史分期，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作为近代史一部分，也可称现代史，本文采前说。

2.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汇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中国近代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史实举要》，北京高校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会编。〕

愤怒的人们用漫画形式，揭露列强利用铁路借款掠夺中国路权

云南历史上的第一个“省长”
赛典赤

● 张永杰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雄才大略的开国明君，还是承先启后的中兴英主，其彪炳史册的文治武功，总是和一大批德才兼备、清正廉洁、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文臣武将的忠心辅弼和效力分不开。元朝初年，被忽必烈拜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赛典赤可谓其中之一。他在治理云南的六年间，励精图治，刷新政治，建行省，置郡县，兴水利，定赋税，办教育，改善民族政策，使云南民族和谐，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巩固了元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对于赛典赤的政绩，元朝廷曾用“于是置郡县、置守令、行赋税、施教化，与中州等”的评语加以肯定。至元十六年(1279 年)，赛典赤亡故，忽必烈痛惜不已。为纪念他的功绩，追赠他为“咸阳王”，谥“忠惠”，并“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云南人民对他感恩怀德，十分悲痛，到处有“百姓巷哭”。他死后，建庙宇，勒石颂功，每当节日前往致祭，寄托怀仰。

不负重托，屡建军功政绩

赛典赤(全名赛典赤・儋思丁)，回族，西域布哈拉(前苏联东部边境)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成吉思汗西征时，他率领千余人马迎降。由于他为人正直无私，待人诚恳仁厚，而且能征善战，机智勇敢，深得成吉思汗的器重，留在身边卫队，随同征讨。随后的几十年间，赛典赤跟随元太宗、宪宗和元世祖忽必烈辗转征战，他屡立战功，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1234 年蒙古军征服金国，我国中原地区为蒙古所占领。这时，赛典赤先后被任命为山西北部地区的达鲁花赤(掌印官)和燕京路断事官(相当于法院院长)及燕京路总管。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建立元朝后，旋任中书平章政事。后又调陕西、四川等地任行省平章。赛典赤是一个比较聪明而讲求实际的人，他每到一地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因俗因地，因各民族不同的特点而治，政绩卓然，颇有建树，显示出其善于理政的政治才干。

受命危难，安定云南局势

1253 年，忽必烈统率十万蒙古大军平定大理，旋即班师北还，留大将兀良合台继续征讨未附者，次年蒙古军平定大理国属全境，并按蒙古军制设立万户、千户、百户，实行军事管制。到 1273 年(至元十年)，二十年间由于“委任非人，政令屡变”，“使远人不安”，“往往复叛”，阶级矛盾和民族关系十分紧张。另一方面，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很激烈，政令不能统一。因此，云南各族人民聚众抗官，围城捆吏，攻杀蒙古官吏和守军的事件不断发生。其中最大的一次是至元元年(1264 年)发生在昆明、楚雄、玉溪三十七部众达三十余万人的

各族联合大起义，时间持续十年之久。虽然各民族人民的抗暴斗争终被镇压下去，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蒙古贵族的残酷统治，迫使元王朝不得不改变对云南的统治方针。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面对云南局势长期得不到稳定的严重性，决心着手解决云南问题。于是，他在亲信大臣中挑选了回回人赛典赤来治理云南。忽必烈召见他说："云南是我亲自到过的地方，现因用人失宜，使远人不安，需要一个谨慎厚重的人去治理，我想也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了。"于是，委他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嘱他以"谨慎宽仁"的方针，把云南的局势稳定下来。赛典赤受命后，马上寻访知云南地理山川、风俗民情、城郭、驿舍、险夷，远近等情况者，准备前往云南上任。至元十一年(1274年)，他率领着一支由回回人组成的队伍不远万里从北京向云南进发。赛典赤还未入云南，就遭到分封云南王的脱忽鲁的猜忌，认为赛典赤一到，"将夺其权"，作了武装戒备。赛典赤知道这一情况后，派他的长子纳速剌丁先前到达云南，向脱忽鲁说明世祖皇帝派他来云南的用意，解除脱忽鲁的猜疑。赛典赤到大理后，一路了解民情、人民负担，"询父老诸生利国便民之道，博采而力行之"。首先，他就如何治理云南的问题，开诚布公，坦率诚恳地和宗王脱忽鲁交换意见。宗王听了赛典赤的意见后认为，赛典赤所说的话"皆忠君泽民之道"，"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由于赛典赤妥善处理行中书省与宗王的关系，很快建立起行省。第二年，又呈报忽必烈批准，将都元帅府和宣慰司纳入行省职权范围。"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同时，安排宗王的几位亲信大臣在行省里担任适当的职务，使他们各得其所，听命于行省的节制。当时一些对赛典赤心怀不满的地方官员联名上京诬告他。元世祖未听，斥责说，"赛典赤忧国爱民，朕洞知之……"将原告解送回云南交赛典赤处理。可赛典赤不但不加以追究，还官复原职，要他们好生为朝廷效力。诬告者为之感动，叩首拜谢说："某有死罪，平章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报"。因此，为云南的局势稳定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

因俗而治，改善民族政策

至元十三年(1276年)，赛典赤开始组建行省以下各级行政机构，设置郡县，把军事统治时期的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改置为路、府、州、县，使省以下地方各级行政纳入正轨。同时，根据云南民族繁多，风俗习惯各异的特点以及各个朝代治理云南的历史经验，改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实行土官制。任命当地民族首领为路、府、州、县长官，准其世袭(即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没有子、弟的还许其妻、女承袭)，让其各领自己的民族听命于元王朝中央的统治。这样做的结果既维持了各民族首领的传统地位，因俗而治；又符合各民族人民的愿望。行省的建立和土官制的施行，云南成为一个名副其实隶属元王朝中央政府的省区。省府也由大理迁至昆明。从此，结束了由彝族先民建立的南诏国和由白族先民建立的大理国长达五百多年独立王国的历史。

赛典赤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始终采取团结的方针。对少数顽梗不服者，主张"以德服之"，待之以诚，谕之以理，宣布恩信，抚而治之，反对轻意用武力征服。如罗磐甸(元江、新平一带)阿僰王不服蒙古统治，他知道后，亲自带兵前往，包围罗磐甸城，采取围而不打，攻心为上的方针，力主以德谕降。但时过三日仍不见有降附的动向。随从诸将见状，纷纷请命攻城，以武力迫其降附。赛典赤不准。这时其子纳速剌丁乘赛典赤不在，率部分官兵擅自攻城，赛典赤发现后严令停止，并严肃指责说："族分三教，各有根本，阿僰之叛，变有苦衷，云南战乱方定，贵在安抚，若稍启衅，他族附从，势必永难相安，汝无主将令而擅攻，乱吾抚滇大计，多年教诲，竟若罔闻，家中纵有骨肉之伦，军前奈无父子之情，于军法当诛"。骂完，命军士推出斩首。后经随从诸将说情，幸免伏诛。阿僰知道后说："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说罢，下令打开城门，举城降附，欢迎赛典赤入城。赛典赤等入城后，驻军数

日，与阿僰结拜为兄弟。班师之日，阿僰率全城百姓倾城出动，欢送数十里方回。其他尚有一些地区不服者，闻赛典赤“忠厚之风，洋洋盈耳”，主动“翕然款附”，心悦诚服地前来上表，表示愿意听命于行省节制，不再反叛。

开拓创新，发展社会经济

云南局势稳定后，赛典赤针对过去云南长期处于战乱，人民流亡，田地荒芜，赋税繁重，水利不便，交通阻隔，财物大量被搜刮以充军资，“民苦无极”的实际，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经济，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的积极举措。

首先，招散亡，恤鳏寡，抚孤贫，减赋税，建立街市，改善治安。使饥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抚绥。在减轻赋税方面，采取“薄粮税以厚民，广屯田以积谷”的政策。对商人则采取“薄抽税，广商旅”的办法，开辟市场，建立街市(照地支命名街市)，整顿货币(当时云南人民以贝为货币，赛典赤依俗报请朝廷批准使贝和钞币同在云南通用)，搞活货币流通；社会治安方面，视地理山川，关隘险阻，道路交通等情况，置镇巡防，并普遍设立驿馆、军堡、关哨，星罗棋布，脉络通达。这样不仅使军令、政令，上下通达，朝令夕至，而且利于查奸宄，戒不虞，便邮传，利行军，广商旅。行者遇劫掠，“则罪之”，使各民族人民安居乐业。

其次，设劝农官，兴修水利，屯田垦荒，传授农耕技术和养殖技术。赛典赤一向注重调查研究，访问知云南省情者，询利国利民之策。云南素称“四季如春三月里，花枝不断四时开”。气候宜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十分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但却苦于水患旱涝之灾，旱不能栽种，涝不能收获，尤其是滇池周围，每到秋夏，雨集水溢，泛滥成灾。赛典赤针对这一情况设立劝农官，任命熟悉云南情况的张立道为巡行劝农使，佩金符，给予很大的权力专事管理农业，传播耕作技术，兴修水利，以利农桑。他和张立道在对云南水利情况作充分调查研究后认为：“筹水利莫急于滇，而筹滇之水利莫急于滇池之海口”。随即调集二千余民工开始治理滇池，疏浚海口，筑松花坝，开通金汁河。经过三年治理，洪水季节不泛滥成灾，冬季可以关坝蓄水，使之水高田低，以供春灌，得灌溉田地数十万亩，农业“五谷茂盛”。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张立道还劝农民改进耕作方法，传播种养桑蚕技术和畜牧渔的要领，发展手工业作坊及矿产业，“云南由是溢富”。在解决了水利条件的基础上，赛典赤又令各地清理漏籍民户“万余”，以四千户屯田垦荒。在他任上的六年中，垦荒置田二十多万亩。这些措施的实施，对缓和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起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

兴学化俗，提高民族文化

云南兴办学校，始自赛典赤和其总管张立道。赛典赤为了改变云南各族人民文化落后的状况，培养一批行政人才，以适应发展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1278 年(至元十五年)，赛典赤使张立道主管在昆明兴修孔庙，并拨给一部分公田作为学田，维持学校的经费开支。同时，从省外四川等地聘请一些有知识的人来云南充当教师，教授士民子弟读书。赛典赤说：“纲常风化，刑政军旅，未有不自文学始。”

到 1314 年，元朝在云南“开科取士”，一些士民子弟开始进入元王朝统治集团。除了开科取士之外，注意从实际中培养提拔少数民族人材，使“内地之人与土著豪杰，参伍而杂处”。由是“华夏之风”在云南“灿然可观”。

历史的尘埃早已被流水般的岁月抹净。但是，不论任何时代，也不论任何人，只要真正为国家和人民作过有益的事情，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责任编辑：赵友慈)

台湾人在北京

● 何 标

古都北京，一向为台湾同胞所尊崇和向往，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吸引、凝聚着来访、暂居以至长期定居的台胞。从清代康熙年间至今，台湾人同北京城结下了三百余年的不解之缘，台胞在北京大致经历了赴京赶考、民国留学、沦陷岁月、日降之后、新中国成立以来和台海两岸开放交流等六个时期。

赴京赶考时期

清朝政府从 1687 年起，在台湾推行全国统一的考举制。考入县学成为生员（秀才）的，可到省参加乡试考举人，进而到京师参加会试考贡士，再经殿试考进士。清代台湾汉人考上文、武进士的共 29 人；文、武举人共 535 人。清政府采取回避本籍的任官制度，台湾士子到福建省考取举人后，往往回祖籍建祖祠，修族谱，置祠堂和学田；再进京赶考，在北京置产设邸。台湾的举人、贡士、进士大都被分派到全国各地任官治事，除少数学官（教育主管）和地区武官外，一般不在台湾本地任职。

清代台湾举子进京，由福建省公车派送，到京后暂住于福建省籍会馆。1885 年台湾单独建省后，于 1893 年，由在朝为官的台湾进士施士洁出资，经旅京福建同乡会协助，在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兴建全台会馆。三年后又卖旧置新，在地处闹市的前门外大蒋家胡同（现改名为大江胡同）建台湾会馆，由前后两座四合院组成，面积 529 平方米，有大小平房 23 间。

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4 月，在清政府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前夕，台湾举人“会试在都，上书力争”。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联合台籍官员叶题雁、李清琦上书“都察院”代奏光绪，表示“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要“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汪等又参加康有为倡导的“反对割地，主张迁都抗战”的“公车上书”。当时，年逾七十的高山族胡盛兴，毅然投笔从戎，返回台湾，深入高山族地区，组织民众“诱击倭兵，半年杀过百”。有人写诗赞他：“抗日援台莫笑狂，万言万里（笔者按：指“公车上书”万言及台湾北京相距万里）两非常。上书投笔从戎起，不入考场入战场。”

割台后，台湾一些知识分子不甘遭受日人奴役，陆续迁返福建、广东祖籍，其中贡士陈睿芝、举人黄彦鸿、举人汪春源等，在大陆参加考试，分别于 1898 年和 1903 年中进士，当时他们报的都是台湾籍贯，仍以台湾为中国国土，表示“不忘台土”之志。日军侵台时，曾奋力抗击而失败的许南英，也被迫离台定居大陆。他在割台前曾三次从台湾到北京应试科举，最后才中进士。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许南英重访北京台湾会馆，面对不幸失火后的会馆房舍无限感慨，曾赋诗：“故土遗黎祖国来，伤心会馆纪全台，天公妒尔名无实，一炬三椽付劫灰。”借失火事讥讽台湾会馆已名不副实，再次流露出对清政府割台的强烈不满，表现老一辈大陆台胞思乡忧国的深厚情怀。

清代在北京定居的台湾人，也有同赴京赶考无关者。如台南人陈顺龙，在香港师从美国医师学牙医，清末到北京廊房头条开牙医

馆，曾进宫为西太后医牙，家里藏有西太后的赐物。据说曾一次受赐赏银 500 两。

民国留学时期

1919 年，我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直接投身于这一运动的台湾人，是日本侵台时随父亲许南英逃到大陆定居的许地山先生。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在北京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的许地山，被选为学生代表，组织集会，反对封建礼教，争取民主自由，曾发表著名散文《落花生》，被誉为“落花生精神”。他与瞿秋白、谢冰心等交往密切。1921 年，同茅盾、郑振铎、王统照等共同发起成立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文学团体，对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罪恶和社会黑暗，促进社会改革，起过进步作用。许地山于 1917 年入燕京大学，毕业后历任本校助教、副教授和教授，直至 1935 年赴香港，前后在北京居住过 18 年。

到达北京的台湾青年，当时多以福建或广东祖籍身份，免费寄居在城南的漳州、泉郡、永春、龙溪、晋江、蕉岭等会馆，正式就读或旁听于北京各大专院校。据在北京住过二十多年的台胞洪炎秋回忆，在北平读书的台湾学生，最多时四、五十人，平时有二十人左右。最早来京的是 1916 年入北大预科读书的台湾举人李飞熊，其后是 1921 年到达的台中人刘锦堂(后改名王悦之)，他也是第一位考入北京大学的台湾生；第二位是嘉义人范本梁，在北大哲学系旁听。

刘锦堂在二、三十年代曾活跃于北京油画界，两年前北京办过纪念他百岁的画展。范本梁是 1922 年 8 月从东京来到北京不久即参加无政府主义组织“北京安社”，后又自行组建“新台湾安社”，主张“驱逐日本强盗”，“透过不断的暗杀与反复暴动，期以台湾民众革命之成功”。因支持者很少，加之 1926 年 3 月奉军占领北京后，对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屠杀镇压，范本梁遂离京返台，为日本当局逮捕判刑，抗日战争时期死于台湾狱中。

来到北京的台湾青年，有些是 1921 年在台北成立的进步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如蔡惠如和石焕长为“文协”理事；郑明禄(北大学生)、谢廉清(北京朝阳大学学生，曾于 1925 年春潜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四个月)、谢文达等为“文协”会员。1922 年 1 月，旅居北京的三十来名台湾青年，以“谋求相互理解，奖励中国文化研究”为主旨，成立“北京台湾青年会”，办事处设在崇文门约耳胡同 14 号，出版会刊并向台湾岛内散发宣传品。经该会争取，改变了当时教育部门限制台湾学生只能以旁听生入学的不合理规定；又同台湾岛内的“文化协会”密切联系，声援“文协”开展“台湾议会请愿运动”。于 1922 年底召开“华北台湾人大会”，发表宣言抗议“台湾民选议会请愿团”被台湾“总督府”拘禁和起诉。该会还争取到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原“财政总长”梁启超、北大教务长胡适、教授李石曾等人为“名誉会员”。但 1924 年后，即未见有该会活动的记载。

1924 年，在北京读书的台湾青年张我军，投书台湾新文学刊物《台湾民报》，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和《糟糕的台湾文学界》等文，推动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展。1925 年他在台湾出版了以自己在北京经历而写成的《乱都之恋》，这本书成为台湾第一部白话文诗集。1926 年 8 月，张我军到阜城门内西三条胡同，向大文豪鲁迅先生登门求教，寻求反对日本占领台湾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并赠送四份《台湾民报》。此事载入《鲁迅日记》，并在鲁迅《而已集》的《写在“劳动问题”之前》文中叙及两人交谈内容。鲁迅先生对当时的台湾青年做了很高的评价和赞扬。张我军赠送的四份《台湾民报》，现珍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1927 年初，几位在北京读书的台湾青年创办了《少年台湾》月刊。先后由北师大学生张我军、北京大学学生宋文瑞(宋斐如)主编，执笔者有苏乡雨和洪炎秋(均在北京大学)、吴敦礼(北平大学)。创刊目的是“把祖国时时所发生的情状，介绍给岛内同胞”；“又把岛内时时所发生的事实，介绍给祖国的人士”。这就在日本占领的台湾同封建军阀盘踞下的北京之间，架起一座沟通两岸同胞思想的文字桥梁。出了几期后，因缺乏经费濒于停刊，当时正值文化协会评议员施至善从台湾到京旅游，闻讯后即捐赠大洋百元，使刊物起死回生。但终因筹资困难，而且刊物寄到台湾常遭日本当局没收，最后只好任其夭折了。

20 年代到北京留学的台湾学生，有的学习一段时间或学成后，陆续返回台湾，有些就地定居。当时在北京定居的台胞有些并非留学生，如林焕文，曾任北平市邮政总局日本课长，其弟林炳文与朝鲜抗日分子有联系。“九·一八”事变前后，林炳文策划抗日行动事机不密，在大连被日本特务逮捕，毒死狱中。林焕文前往收尸返京后，也悲愤病故。其长女为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她的名作《城南旧事》，就是以他们一家在京生活为背景叙写的动人故事。

旅京台胞一向爱国爱乡，乡亲情谊十分深厚，遇有困难彼此肯于慷概相助。从 20 年代初起，就有“台湾旅京(平)同乡会”，至 1949 年建国后为止，历时近三十年，是常住北京的台湾乡亲自行组织的民间团体，为促进同乡情谊，谋求乡亲福利

和彼此相帮照应起过一定作用。历届被推选的会长或主事人有谢廉清、林焕文、林少英、张深切、洪炎秋、梁永禄、林铿生等。

沦陷时期

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台湾岛内和在日本留学的一些台湾役龄人，纷纷来到沦陷后的北京，以避服日军兵役。在沦陷区的台湾人受日本使领馆管辖，当时定居北京的台湾人究竟有多少户，没有确切数字。但日本投降后 25 天(即 1945 年 9 月 9 日)在西单大光明电影院(现今西单剧场)，召开过"台湾省旅平同乡会"结成典礼，据参加者目睹，会场上座无虚席。经查，大光明影院那时可容纳观众 740 人，据此推算，沦陷后期北京的台胞包括家属在内，至少有两千人以上。

沦陷时期在京台胞，除行商和行医者外，多任教于伪政权统辖下的高等院校。当时有自命为"八仙"的一批台籍教授，即原在北京教书的柯政和(北师大音乐系)，洪炎秋(北大农学院)和张我军(北师大文学院)，加上沦陷后来京的张深切(艺专训育主任)、江文也(艺专和北师大音乐系)、郭柏川(艺专美术系)、张秋海(北师大美术系)和林朝权(北师大体育系)。他们既是乡亲，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志趣相投，因此经常聚饮叙谈。除"八仙"外，沦陷后到北京从事高校教职的还有林朝棨(北师大地质系，林朝权之弟)，郭德钦(艺专)、王庆勋(北师大，口琴家，中华口琴会创始人)、肖正谊(燕京大学)、苏子蘅(北京大学)和徐牧生(北大法学院)等。

北平沦陷期间，有些台湾人供职于日本机构或任伪政权官职，混饭吃的居多，虽也有助纣为虐的，但在我地下工作的影响下，有的也为抗战做了好事。日本投降后，其中一些人曾被国民党政府关押，以汉奸论罪。台湾旅平同乡会和天津台湾同乡会曾共同代为向国民党政府申述，说明沦陷时期台湾人是日本国民，受日本政府 1938 年颁布的《总动员法》和 1939 年颁布的《国民征用令》的约制，为日本人干事有"不得已"的一面，请求宽大处理。北平解放前，这些被关押者均已先后释放出狱。

抗日战争时期，有不少在平台胞投身于我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抗战前夕，台南人杨诚，从印尼来大陆读书。1935 年在北平大学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分队长和区队、总队干部，后参加"平津南下宣传队"宣传抗日，1937 年 7 月侵华战争爆发后，从北平到延安参加抗战。北平沦陷期间，台籍青年文英(陈定澜)、何标(张光正)等在中共地下工作影响下，在学生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后秘密离京到晋察冀根据地参加抗战。老台胞曾明如(曾昌明)、苏子蘅和甘莹夫妇，于日降前夕同抗日根据地城市工作组织取得联系，投身于革命队伍。台湾青年李子秀和林思平、卢莉夫妇，白凤洋，黄永仁等，寻找革命道路，从外地来到北平，经苏子蘅先生介绍，于日降后从北平进入解放区。李子秀在八路军任军事教员，教学时不幸触雷牺牲，年仅 28 岁。1944 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医学专门学校的李河民等台籍青年，也于日降后经北平到达张家口，参加解放区医务工作。

1926 年
台湾同胞摄于
"蕉岭会馆"

日降之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旅平同乡会立即重组活动。首先，主办遣送沦陷期间被日军征召到华北的台湾役工，从日本驻军处接回百人左右，经天津、上海乘船返台。随后，旅平台胞大都陆续举家南迁，至1946年底，只剩下三、四十户。但1946年11月，有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郭炤烈、方舵、吕平、尤宽仁等13人，到北京大学读书；1948年10月又有来自台湾的自费生曾重郎、蔡铭熹、彭克巽、曾祥发等5人到北大、清华和北师大读书。这些青年学生的到来，不仅增多了北平台湾同乡的数量，而且大大加强了旅平台湾同乡会的活力。

1947年初台湾发生官逼民反的"二·二八"起义，3月12日台湾旅平同乡会同长春、沈阳、天津、青岛的同乡会和刚刚成立的北平台湾同学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阐明事件真相，支持岛内同胞的正义要求，警告国民党当局要尊重民意，不得派兵镇压。旅平台湾同学会同时发表言词更加强烈的《敬告全国同学书》。3月19日，台湾旅平同乡会和同学会在王府井大街京华酒家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到会的有美国新闻处、合众社、联合社及英、法、瑞士记者七人。由台湾旅平同乡会会长梁永禄、常务理事王碧光和学生代表，向外国记者说明"二·二八"事件经过，回答了有关事件的原由、背景、性质、前途等提问，驳斥了造谣和污蔑。

1947年4月初，国民党政府悍然出兵对台湾同胞血腥镇压，台湾旅平同乡会闻讯后，立即致电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提出抗议。以后，又与旅平、沪的台胞六团体共同发表《关于台湾事件报告书》，详细揭露国民党政府屠杀台胞罪行，要求查处主要负责者，提出善后处理建议，并严正表明反对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或脱离中国的荒谬主张。此外，台湾旅平同乡会还编印了《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秘密送往台湾。

"二·二八"起义失败后，1947年11月谢雪红等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制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草案"。"纲领草案"传到北平后，旅平台胞曾明如、王碧光、刘成发、王康绪等曾集议酝酿，并联络了一些乡亲，为解放后正式组建北京市的台盟组织做了准备。当时，台湾乡亲曾明如、王碧光、郭炤烈等均已同解放区建立工作关系，受领任务，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推翻蒋家王朝，迎接北平和平解放，进行革命活动。他们曾以设在前任会长梁永禄及继任会长林铿生家中的台湾同乡会会址为掩护，从事秘密工作。1948年2月，台湾旅平同乡会召开了"二·二八"起义周年纪念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

1949年，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55年2月台盟总部由上海迁回北京，台盟华北总支部撤销，成立了台盟北京支部（现改为台盟北京市委）。由于建国工作的需要，一批有影响和有专长的台胞，被陆续调集到首都定居任职。当时在中央机关担任职务的有：杨诚（共青团中央委员）、杨春松（在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务院外办工作）、谢南光（人大常委会委员）、庄希泉（全国侨联副主席）、谢雪红（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田富达（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

50年代，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数千名旅日台胞，包括众多科技、医务人员，响应周总理号召，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70年代前后，从台湾到美欧留学的一些青年学者，也先后来大陆参加祖国建设事业。这些台胞很多都留在北京，服务于科研和教学单位。80年代初，在京成立了大陆台胞的群众团体——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和北京市台胞联谊会，还成立了台湾同学会。大陆台胞的工作和作用的发挥，从此迈进了新的阶段。建国以来，大陆台胞实现了祖祖辈辈要求当家做主"出头天"的愿望，台湾省籍25名全国人大代表、数十名全国政协委员，每年都要云集北京参政议政，参与重大国策的讨论和决定。北京市、区、县台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市、区、县的参政议政。在北京的台湾人出现历史上空前繁盛活跃的景象。

目前，居住在北京市的台胞有八百多户，约1300人（其中高山族同胞28户，50多人），连同家属共1800人左右。在大陆各省区中，北京市台胞人数虽仅居第5位，但荟萃了一大批大陆台胞的精英人物，其中包括原任的人大副委员长，现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政府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和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以及医生、记者、作家、导演、演员、演奏家、书法家、画家、雕塑家、乐队指挥和球队教练等。北京市台胞中现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妇联委员、青联委员、侨联委员等有百余人；历年来荣获各级先进称号的北京台胞亦有百余名。其中有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和优秀教师

台海两岸开放交流的新时期

1987年底，台湾当局被迫开放两岸探亲交流。11年来岛内已有约1200万人次到过大陆，其中至少有1/3人次在特有魅力吸引下，来过北京。他们在参观北京名胜古迹市容面貌和了解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后，澄清了对大陆的误解，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在此期间，全国台联和北京市台联，台盟中央和北京市台盟以及台湾同学会，分别邀请、接待了大批岛内的乡亲。全国台联历年来举办过15届青年台胞夏令营和5届冬令营，积极推动了两岸乡亲之间的来往和交流。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重要地位，科研机构和科技人才的富有，内销市场的巨大吸纳力以及市属区县拥有的土地、人力资源，这些特有的优势对台资具有一定吸引力。目前全市已有台资企业1500多家，协议金额20多亿美元。早在1990年3月，就建立了北京市台资企业协会。现常住北京的台商与来自台湾的台商家属和雇员达2000余人，加上正在北京各大专院校读书的300余名来自台湾的青年学生，这些北京台湾人的新成员，在数量上已经超过定居北京的大陆台胞。北京台湾人的生态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这对沟通两岸各方面的交流，将发挥越来越大和难以取代的桥梁纽带作用。

1988年初，背井离乡四十余载的北京老台胞，终于看到了返乡探亲的曙光，近几年来，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突破了台湾当局的种种设限，已有二百余名第一代北京老台胞偿还了返乡探亲同亲人团聚的宿愿，有的已返台定居。一些第二代大陆台胞，通过申请探亲和进行交流，也首次到了本籍，见到了没见过面的亲人。

北京，已成为旅京台胞的第二故乡，有些老一辈定居北京的台胞，繁衍了三、四代子孙。已还乡的北京台胞也时常怀念自己的第二故乡，著名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在60年代写下过一段充满深情的心愿："台湾是我的故乡，北平是我成长的地方。总希望有一天，喷射机把两个地方连接起来，像台北到台中那样，朝发而午至，那时就不会有心悬两地的苦恼了。"江文也、谢雪红、杨克煌、苏新、陈文彬、王万得、蔡啸、李纯青、张秋海等一大批大陆老台胞，都怀着不能终老还乡的遗憾，走完自己人生之路，而长眠于北京地下。

三百年来，历经沧桑的北京台湾人，一脉相承和代代相传的，是既爱祖国又爱家乡的情愫。已故台盟中央主席蔡啸，生前在从北京到杭州西湖疗养时，写过一首诗："塔底江山眼底收，南眺海峡寄怀由。风云苍桑半世纪，我以许我报瀛州。"南眺台湾海峡，不忘家乡父老；以身相许，报效瀛州祖国。这不就是具有三百年历史的北京台湾人的本色和伟大胸怀么？

（1998年11月修订稿）

（责任编辑 文　贤）

1994年，北京台湾会馆举行修复揭幕仪式

浮光掠影看新加坡的成功

● 王东哈

12月份，祖国的北方还是冰天雪地，我们一行来到了终年都是夏季的新加坡。它是一个海岛型的城市国家，阳光明媚，雨水充足。到处绽放着斑烂的花朵，海风摇曳着翠绿的树草。在这里一朵花、一棵树、一片草坪，一座座不同色彩、风格迥异的建筑物，一切好像是经过精心的构思，和谐的融人在一起，呈现出令人陶醉的温馨、安静、祥和。

绿化于细微处见精神

早有所闻，新加坡的绿化在世界上堪称一绝。百闻不如一见，新加坡政府环境发展局高度重视美化环境，从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泰国招聘了3200多名园林工人进行绿化工程。他们的月薪待遇从900—1000多新加坡元(1元新加坡币=6元人民币)，这比当地的劳力要便宜得多。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不同肤色的园林工人出现在大街、公园、住宅花园里，他们顶着烈日打扫落叶、剪枝喷药，为新加坡的绿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环境发展局有六个专门学习林业方面的博士生，从事规划、设计全国的植树、种花、种草。他们在树种、花种的选配、树与花的距离，各种植物不同生长期的维护管理上，都有相当的研究。新加坡的法律对树木、花草的受护都有极严格的规定，堪称世界之最。如采摘一朵花要罚款500元坡币，砍一株树要判刑三个月。陪同我们的王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件事："在新加坡还有没有砍树的人呢？也有。"去年有一个青年驾车速度过快，不小心撞倒了路边一棵树。到了法庭上，法官不听任何解释，以树倒为事实，判决那青年服刑三个月。此事由新闻披露后，家喻户晓。所以，在新加坡如果有人采摘街头公园的花草，哪怕是刚懂事的儿童都会被认为是有神经病。

新加坡政府策划每一件事情创意很高，以战略眼光透视未来，从细微处着手。一旦决定做事，就要用铁的纪律来维护和监督实施，所以管理每一件事都是井井有条，认认真真。从绿化管理这件事情，可看出新加坡政府对整个国家的管理力度。

新加坡是一个好地方

在新加坡我们发现众多的公共场所，都竖有警告牌并标有罚款的价码，时刻提醒着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公共场合要处处谨慎小心。如上公共厕所不冲水，罚款1000元新加坡币。又如在大街上，几个小伙子勾肩搭背在马路上行走，行为不雅观，马上就可能遭来警察的盘问。所以黑社会的现象在新加坡基本上被消灭了。

新加坡的大大小小公司、商店在生意场上是不敢有欺诈和随意拖欠款行为的。对违法的事，一旦被投诉，政府必然要管。这使我们感到在新加坡珠宝店购买较贵重的首饰是最放心的。以后一路到了其它几个国家的珠宝店，把新加坡买来的首饰做比较，无论是价格还是品质，大家都反映在新加坡购物的选择是最正确的。

在新加坡流行着这样一句双关语："Singapore is a fineplace"，它是一方面说新加坡是一个好地方，另一方面则指新加坡是一个罚款的地方，从一定意义上讲，它的良好秩序是被罚出来的。新加坡政府正是以其立法的严密，执法的严格，为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法制化的环境，也为其经济高速发展铺平了道路。

中央政府办公楼
不追求虚饰的浮华

新加坡中央政府办公楼座落在市内一片宽阔的绿色草坪前，显得古朴庄重。其前身是新加坡总督府，当地人称之为全国行政管理中心，与其毗邻的是高等法院。所有几座楼均建于1850年，距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了。身后远处则矗立着一座座华丽的摩天大楼，它们都是国际上著名金融机构和洋行的办公室，两者相比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我忍不住问："国务院办公楼为什么不盖得好一点？难道政府没有财力吗？"陪同我们的王先生说："新加坡在亚洲首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政府当然有钱盖一所办公楼，但是新加坡政府自有其考虑，一是不愿追求表面的浮华，而注重于办实事的效率；二是保护历史文物。"我们听到这里心中为之一震，感触良多。我想新加坡政府廉洁务实、忠实于人

民的形象在全体国民的心目中应该会比它身后矗立的摩天大楼高大得多。

三大"限制"提倡节俭文明

新加坡有三大"限制"：私人汽车与烟、酒。国家对这三项消费要征收高额的税款，这一政策对保证社会秩序和提倡节俭风气起了重要作用。新加坡全国至少有60万辆汽车，大多数家庭都有2~3辆汽车，但只有200多名公路巡警，我们观察到市内很少有堵车的现象。每个路口上装有电子监视仪和电子指挥设备。在相邻的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堵车情况已达到坐汽车不如走路快的程度。在泰国曼谷这种现象更为严重。新加坡采取的政策是买一辆汽车要上200%的税，还要办理一个拥车证，再交20%的费用。政府征用这些高额税款用以有计划地扩建道路和停车场，因此修建交通设施与汽车增长是同步发展的。政府还规定每辆汽车的寿命仅为10年，到时候即便汽车还是完好无损的，也要强行报废。所以路面上跑的车从外观上看都是新车，车况很好，很少发生抛锚情况，而且每个人只能同时拥有一辆车，报废了旧车才能买新车。

由于征高税，在新加坡有抽烟习惯的人要花高昂的代价买烟。"三五"牌香烟在中国20支一盒人民币12元左右，在这里14支一盒却要花人民币40多元。在新加坡一切室内的公共场所都严禁抽烟，违者要罚款400元新加坡币(合2400元人民币)。但室外的公共场所都允许抽烟，在路边、公园、体育场等许多公共场所，都随处可见精致的清洁箱和装有沙土的烟灰桶，扔烟蒂非常方便。

在新加坡餐馆里，含酒精的饮料特别贵，喝酒的嗜好在这里是得不到培养的。一次我们逛街后在一家餐馆吃饭，炎热的天气使我们个个口渴难忍，我们听说酒贵，每人只要了一两杯啤酒，但结账时竟发现酒钱和菜钱各占一半，使我们个个目瞪口呆。顺便提一下，我们在点菜时发现服务员非常有礼貌地向你建议先少点几样菜，吃完后再加。店主人不是一味为自己赢利，而是按政府的规定替客人把关，因为在餐馆里浪费食物是要被罚款的。

作者在新加坡中央政府办公楼前

晚上沿街而行，到处都闪耀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餐厅里不时传出悠扬的轻音乐使人心旷神怡。新加坡百姓生活的富足已达到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此情况下，政府提出"清廉而节俭"、"平等而礼让"的口号，希望引导全体国民崇尚文明、务实、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对私车、烟、酒限制只是新加坡政府一系列措施中的几项。但仅从这几项限制就可以看出政府把握的政策，对这个国家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

法律上面没有权威

李光耀先生早年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系，是一位高材生，他以自己精通专业的优势，以勇猛刚强的气魄，在新加坡建立了法制社会。新加坡政府在执法面前没有丝毫的柔弱和怯懦，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同时政府注意提高维护法官、法庭的威信和权威，保护执法人员的权益，法官一旦当选即为终身职务，除非失职。这就促使执法人员大胆公正的执法，保证了执法的力度。

在新加坡不管职务多高，即使是与李光耀一起建国创有重大政绩的人，胆敢以身试法，一律以法论处。有一位部长和李光耀私交甚好，是当年与李光耀开创新加坡的功臣元老，由于他在经济方面触犯了法律，将受到法庭的判决。他找李光耀总理说情，李光耀却无能为力，他只好以自杀了结。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前主席陈家彦、环境发展部前政务部长黄循文、国家发展部前部长郑章远、商业事务局前局长格林，都因触犯法律而受到应有制裁。

李光耀和他的儿子李显龙，几年前以130万新加坡元购买了一套私人住宅。这套住宅如此便宜，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李光耀对此问题没有回避，而是公开对群众做解释说：他购买这套房子时房地产价格还没有上涨，同时买房的还有五六户，都是以同样价格购买的，他向公众承诺，如果他与他的儿子在这个问题上与房地产公司有任何勾结，他愿负法律责任。新加坡国民对李资政的勇气十分钦佩。他为新加坡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70多岁了，不以自己显赫的身份而自居，敢于面对群众澄清疑问，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李光耀以执政党的领袖来教育人民行动党党员，以国家行政长官

来教育公务员，他本人是严以律己的模范，在新加坡人民中受到普遍的称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选民物色
廉洁正直的人才

我们在新加坡时，正赶上新加坡大选。大选的情况和竞选人的辩论演说每天都见诸于报纸和电视。竞选议员们信誓旦旦地向公众许下诺言，当选后如何改建扩大老百姓住房面积，如何提高住房装修标准，如何修建马路、花园、图书馆等非常具体的措施。同时选民们也检查上一届议员的工作情况，是否履行了当初的承诺。

李光耀资政亲自到选区为行动党的竞选议员助阵，他在演说中批评反对党的一个华人候选人宣扬华人文化沙文主义，批评这种沙文主义会破坏新加坡的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影响到与少数民族的团结及邻近国家的关系。

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陈庆炎博士说："如果选民选了不诚实的政治家进入国会，只要国会里有几个空谈而不做事的人，新加坡的政治就会面目全非。"他要求选民千万别让有偏激看法的人进入国会捣乱和制造麻烦。李资政说："行动党面对问题是物色最好的人才，这些人才必须具备才干，正直廉洁及敢做敢为才行。"

李光耀领导人民行动党连续几届都以绝对多数获得胜利。他们在群众监督下，通过激烈的选拔，大浪淘沙，对一批批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专业训练、道德高尚、具有献身精神的杰出人才委以重任，组成了一届又一届的政府群体，保证了国家机器长期高效能的运转。

以人才科技立国

新加坡是一个资源贫乏，没有宽广领土的小国。根据自身国情，1979 年新加坡政府做出重组经济结构或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大决策，提出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以促进各部门实行机械化、自动化、电脑化。以人才、科技立国，在全世界延揽高层专业人才，联络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在欧美的留学生，以高额薪俸待遇吸引他们到新加坡工作。在建国初期，李光耀总理就以惊人的魄力，大胆启用人才。1959 年新加坡第一届政府九名部长里，只有两位是当地出生的，其他全是英、美名牌大学毕业的外籍人。几十年后，政府中的部长已都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政府采取向科技倾斜的经济政策，凡是投资科技工业而持续三年亏损的企业，可以获得 50% 的投资补贴；着手实现机械化、电脑化设备的工厂，可以持续三年享受税收优惠。正是这一系列明智的决策，产生了新加坡举世瞩目的经济现代化和高度文明。

新加坡政府除了注重人才之外，注重各民族团结，平等对待各种肤色、不同血缘的少数民族。它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华人占 70% 多，其余的是马来人、印度人和欧洲人后裔。乘坐新加坡航空公司飞机，就可以惊奇地发现，空中小姐里有黑头发、黄皮肤的新加坡华人，有金黄头发、高鼻子欧洲血统的小姐，还有黑皮肤、大眼睛的马来族姑娘。有一个像中国血统的空中小姐，她只会讲一点中文，我与她聊起来，才知道她是一个日本姑娘，家在大阪。我问她："日本的生活水平和工资都很高，你一个人在新加坡工作不寂寞吗？"她告诉我，她很喜欢新加坡，新加坡航空公司工资很高，这里雇用了很多外国人，他们都能够和睦相处，生活工作都很愉快。

优越的福利制度
铸就了国泰民安

新加坡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以中央公积金制度为主体的，它已发展了 40 年，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体系。公积金的内容：新加坡的每个公民要拿出自己工资中的 20%，分别强制性储蓄到个人公积金中。公积金涵盖了养老金，保障公民安度晚年；住房公积金，解决购房问题；医疗保健储蓄，提供所需医疗费用；家庭保证金，解决家庭发生意外伤亡事故；以及教育基金，提供子女上大学所需昂贵的学费。公积金的制度促进了公民对国家制度的认同，民族之间的和谐，提高了人口素质，减缓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为保证新加坡社会的国泰民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种制度的科学性要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世界半数以上国家都曾派团到新加坡为此进行考察。

另外中央公积金制度，还为大大小小执掌权力的公务员、行政长官建有一笔逐年增长的储蓄金，工作越长，储蓄越高，一般退休时都在六位数以上，也就是几十万元，如果本人违法，将会被全部取消。所以在这种政策驱使下，经济贿赂是不容易使政府公务人员动心的。

说到住房公积金，我们一行对新加坡国民住房问题都特别感兴趣。在乘坐大巴士观光中，可以看见都市里一座座高耸的塔楼。这些都是政府住屋，新加坡人称"公房"或"国民住宅"。这种住房，工薪族中低水平收入者都可以买到，很便宜。刚结婚的夫妇可以优先享受这种待遇。陪同我的王先生指着擦窗而过的大楼用自己的经历向我们介绍：16 年前，他刚结婚，以五万新加坡元的价格买下三房两厅住宅，第一次付款一万元，剩下四万元可以在 20 年内分期付清，每月只付几百元。当然，必须是新加坡的公民，还必须要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才能够享受这种待遇。如今他已付清这三房两厅的款，这个单元的公寓房也就全部归他所有了。

新加坡，你真是一个值得让人称赞的国家。

（责任编辑　杜　晋）

炎黄春秋

1928年台湾同胞摄于燕岭会馆

1963年夏，上官云珠和她的子女

台湾人在北京■

人权卫士——贺明将军■

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知多少■

我在报上批评省委书记以后■

『作民主』与『民作主』源流考■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

炎黄春秋
刊号：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中华……文化研究会主办